

# 甘肃史志



2015.1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 夏红民副省长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调研



夏红民副省长查看近几年全省地方志编研成果



夏红民副省长向省志办捐赠旧志



夏红民副省长与省史志办干部职工座谈

2014年12月16日下午，副省长夏红民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调研时指出，要靠实责任，将“质量第一”的要求贯穿志书编修的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传世佳志。

夏红民指出，要强化措施，着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要按照省委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任务细化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要逐级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约谈，层层传导压力，层层传递责任。

夏红民强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要做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不断强化依法修志意识；地方志是为党为国为民立言的重要历史传承，要着力提升志书质量；资政是地方史志工作的主要功能之一，要进一步强化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开发利用好地方史志资源，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 抓住时间

九 日

以为,是时间抛弃了我  
其实,是我抛弃了时间

因为抛弃了时间,就没有抓住  
水里的浪花,天上的云团  
因为抛弃了时间,就没有留住  
春天的鲜花,冬天的雪片

现在,我要把时间抓住  
尽管,剩余的时间有限

只有抓住时间,才能抓住  
历史的灵魂,诗歌的灵感  
只有抓住时间,才能留住  
眼前的笑容,心底的情感





#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5 年第 1 期  
(总第 21 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 卷首语

## 政策法规

嘉峪关市地方志工作规定 .....(4)

## 经验交流

甘肃会宁《王家坪王氏家谱》跋 .....车安宁(6)  
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  
——以甘肃省 1959 年修志资料为例 .....李拾良(8)  
地情信息网创建的实践与思考 .....王 超(10)

## 史地研究

由陇南麻纸看中国造纸的历史 .....赵逵夫(13)  
横贯西北的汉代中西交通 .....刘光华(27)  
陇右地名考(续) .....薛仰敬(38)

## 理论研究

“陈云一贯右倾”考辨  
——从抵制“左”倾错误角度切入 .....王 杰(47)

# 录

## 旧志整理

甘肃历代方志目录整理情况研究……………马新建(56)

## 篇目选登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志》(1949—2010)目录……………(62)

## 陇原人物

阴铿:动荡离乱时代的悲情诗人……………程对山(66)

陇上名人牛载坤……………马晓春(71)

## 历史回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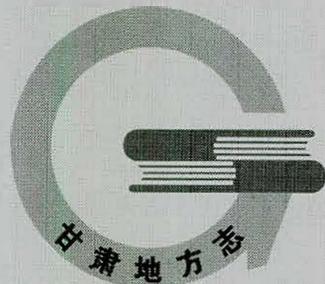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正宁历史“十个之最”……………王立明(72)

## 乡土民俗

甘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杰(76)

岷州火神庙里的火神爷小考……………潘硕珍(78)

浅议崇信县地方饮食习俗……………张涛(79)



##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李虎

副主任:车安宁 钱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张正斌 李拾良

贺红梅 石为怀

主办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编:李虎

副主编:钱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任编辑:梁兴明 陈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旭

本期责编:陈谦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51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编:730000

电话:0931-8960622

电子邮箱:gsdfz911@163.com

印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话:0931-8960384

2014年12月5日,《嘉峪关市地方志工作规定》经嘉峪关市人民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自2015年1月1日起颁布实行。

# 嘉峪关市地方志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嘉峪关市行政区域内地方志编纂、管理、开发利用工作,适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地方志指嘉峪关市行政区域内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第四条**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市志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地方志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组织、指导、监督检查本辖区的地方志工

作;

(三)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制定业务规范;

(四)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五)收集保存地方志文献资料,整理旧志,推动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开展学术交流;

(六)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推动地方志成果。

**第六条** 本规定适用于嘉峪关市行政区域内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所涉及的各种资料。

(一)建置、自然环境、资源、人口等;

(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交通、邮电信息、公用事业等;

(三)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经济管理

等;

(四)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组织、公检法司、军事等;

(五)教育、民生、就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和计划生育、体育等;

(六)人民生活、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风俗、方言等;

**第七条**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志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规划,并报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备案。

**第八条** 地方志资料责任单位为嘉峪关市行政区域内的市属各单位党委(党组)、市委各部门、

市政府各部门和各驻嘉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第九条** 地方志资料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部门、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

地方志资料要坚持志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

地方志资料应观点正确,体例科学、规范、严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资料翔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打印规范。

**第十条** 编纂地方志书所需资料由市志办公室向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地方志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市志办公室可以对涉密规定允许的有关资料进行查阅、摘抄、复制,有法律规定的除外。

资料持有人或者所有人提供资料被采用的,由市志办公室支付相应报酬,具体标准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地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不得故意提供虚假资料。

**第十一条** 地方志资料是重要的地情信息资料 and 基础性修志材料,各责任单位要全面收集、认真整理、妥善保管、按时报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遗失、损毁、拒绝接受检查和收集。

**第十二条** 以本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由市志办公室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

**第十三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地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专职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第十四条** 地方志书实行评议和初审、复审、终审制度。以本行政区域名称冠名、列入规划的地方志书经审查验收,方可以公开出版。

对地方志书的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凡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法律、法规及政策未作规定的,由主管部门审查把关。凡涉及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的内容,以

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为准。

(一)地方志书在进入审定程序之前,应当召开有关领导、专家和相关人士参加的志稿评议会进行评议。未经评议的志稿不得提交审定。

(二)市志分编由承编单位组织初审,市志办公室复审。

(三)市志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初审,市人民政府复审,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终审通过后方可出版。

**第十五条** 审查地方志书,除重点审查地方志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外,还应当审查是否符合下列业务标准:

(一)志书体例:正确运用志书体式体裁,符合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做到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分类准确,归属得当。

(二)资料内容:全面系统、取舍得当,准确翔实,纵不断主线,横不缺主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行业特色。

(三)行文规范:地方志运用语体文记述,表述准确、文笔流畅,语言文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和数字的使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四)地方志书翻译成外文出版时,需报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备案。

**第十六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资料翔实、准确,地方特色突出,体例科学严谨,审校、装帧、印刷符合出版要求的质量标准。

**第十七条** 嘉峪关市地方综合年鉴,由市志办公室组织编辑,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参与审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出版社审定后出版。

地方综合年鉴各承编单位应于每年4月底前向市志办报送上年度资料,资料以专题形式分类整理,以书面和电子版形式报市志办公室审查、验收、采用,市志办公室负责书面和电子版资料的保存工作。

**第十八条** 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收集到的各种文字资料、图表、照片、音像资料、实物等由市志办公室集中统一管理,不得损毁。编纂工(转75页)

# 甘肃会宁《王家坪王氏家谱》跋

车安宁

曾经有人问我：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比，有哪些相同与不同？

我个人的看法是，相同之处在于以上三者都是对一定社会范围内的人和事的历史过程的真实记载。其不同之处在于：1.记载的层次不同。国史是站在国家之视野，宏观地记载一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大事，而方志虽也涉及国家背景，但面对的是一方一域社会的中观视野。家谱则可看作是微观层面的家族史，是对社会细胞的记载；2.记载范围的不同。国史的记载范围限定在一国之内，方志也有“越境不述”的传统。而家谱则可能因为族人分布的远近不同，迁徙变化而跨区跨省，甚至跨国记载；3.记载的内容不同。家谱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记录具体家族的血脉关系的延伸，兼涉记事，一般不专门记述地理、物候、交通、民俗方言等自然和社会背景，政治色彩尽量淡化。

有人说，家谱只是给家人看的。这句话我不大赞成。因为如同此书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规律，也可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引自1957年在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许某一家谱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千千万万的家谱便构成了一部特定时代的巨幅画卷。如果运用我们现在所讲的大数据概念来做分析，在中国历代浩繁的家谱中，我们不仅肯定可以找出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有价值的人类学信息。

当然，这只是家谱客观上的作用和功能，实际上人们在不同的地域和时代修家谱时，并不是自

觉地为了提供什么“人类社会发规律的资料”，仅仅只是为了本家族人都能够知晓自己的宗室沿袭和承传而已，为着使每一个家族中的成员能够在纷繁交错的谱中找到自己的传宗位置，并使自己在亲近远疏的辈分关系中有一个适当的定位。同时把优良的家风家训传承下去，以正后人。

那么，家谱怎样写？尤其是现代的家谱应当怎样写？

我认为，中国人虽然写了几千年的家谱，但对于现代家谱的写法，还是应当做认真研究的。每一时代的家谱都会留下时代的印痕，当今时代科技发达、经济发展、社会开放、观念多元、生活丰富，这些特点，需要在家谱中有所体现。譬如穿插记述一点当代族人的科技贡献、经济创业、海外留学、工作业绩情况，以及生活起居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等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家谱是严肃而神圣的，作为一种史料性文献，首先应当真实，切忌推测、臆想与夸张。其次是，每一种族谱都有自己特有的文体风格，当今的续修一定要注意既要创新，又有继承。

过去的家谱见得少，我个人更没有什么研究。但如今却见个别家谱修的有些离谱，成了主要为家族中少数成员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谱”。我认为，家谱除了为家族中人厘清自己的辈分层次，亲疏关系，知道自己的世族来源外，顺便附带一些功德性的文字，既是常情，也非不可。但这种文字都是以弘扬正面的家风为主旨的，因为家谱与传记毕竟是有区别的。传记虽然也是纪实性文体，是对个人人生轨迹的回顾与总结，说白了也是免不了要夸大其词，避讳缺陷，颂扬功德的。但家谱却绝

非是对族人是非功过的记载和评价。过分突出个人,就难免会变味,借用一句近年流行的话说,就是“不靠谱”。

还有,家谱虽说要淡化政治色彩,但是也绝非是不讲政治。譬如我们在现代家谱中也要提倡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导引,鼓励族人去学习,去奋斗,去创业。同时去除一些不科学、不文明、不健康的東西。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王家坪王氏家谱》(1938—2013),是由甘肃会宁的王家坪王氏宗亲们编写的。在我看来,这是近年来我所见到的最具时代感、特色感,也最编纂比较规范的一本家谱。不仅文字规范,编排有序,开篇附有图腾、族徽、篆刻、题字、图片,文中还有名人谈家谱、姓氏探源、家族文物鉴考、家传故事传说等,末了还专设“史鉴经典”一编,辑录传统的孝道、家训、格言警句、现代歌词等,可谓内容丰富。不仅可以成为他人修谱的参照范本,同时也是一本极好的社会学读物和教材。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我觉得,涉及家庭日常生活的历史照片还是嫌少。这些照片可以是族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婚丧嫁娶等,也可以是一些过去的古旧书迹、契约、证书、用品等,甚至可以是宅院中的一棵树、一根桩、一块石,因为这些东西都能勾起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和联想。古代做家谱没有这个条件,现在不同了,照片的直观性、客观性、解读性、记载性都很强,有些照片甚至不加文字说明,就能使人一目了然,即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中国人的姓氏,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计有万种以上。姓氏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家族符号,也是国人基因传承的一个图谱,它清晰地反映出从远古部落到诸侯割据,再从封建宗室到现今社会的血脉沿革,以及人口的不断变化、迁徙、融和与分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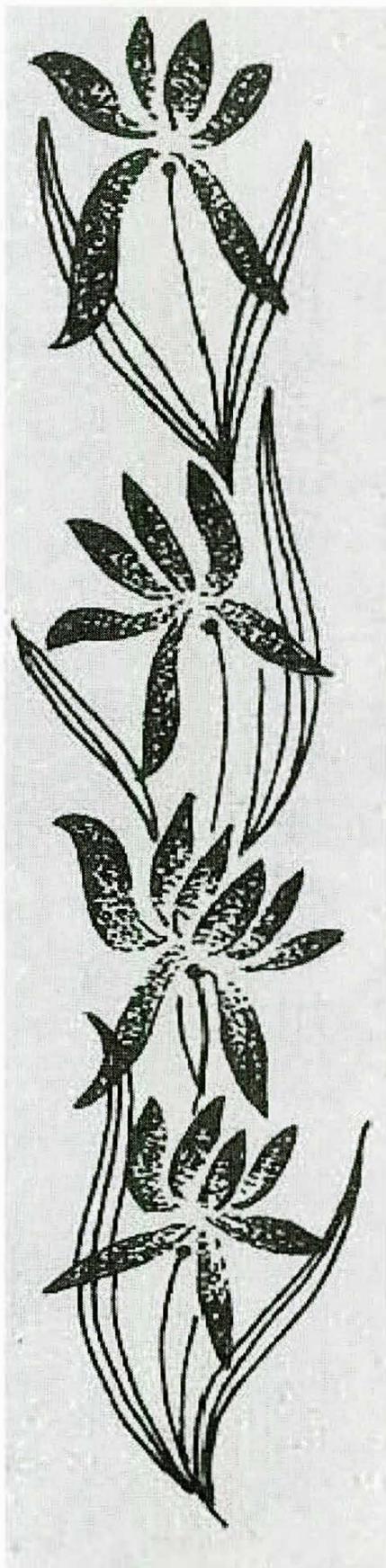
王姓,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是最大的姓氏集群之一,对于这个姓氏集群的产生、沿袭、分布和变迁的研究,应当是一件既复杂又有意义的事情。这本家谱的面世,虽然记载的只是王氏集群的一缕细细的支脉,但是对于整个姓氏的研究也是颇有裨益的。

此谱的执行编辑王平,与我因工作关系相识、相交,由于同在地方志系统共同修志,因而我们称得上是真正的“同志”。王平同志为此书付出的心血以及在书中的诸多创新都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祝王家坪王氏家族人丁兴旺,英才辈出,族人和睦,生活幸福!

以上拙字,谨奉为跋。

(作者系甘肃省政府参事、省地方志志办公室副主任)



# 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

——以甘肃省一九五九年修志资料为例

李拾良

自清康熙年间陕甘分治以后,在甘肃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省级志书的编纂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般人只知道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大规模的并且延续至今的修志活动,而不知道在1959年曾组织编纂的一次修志。即是知道,也会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可以忽略不计的修志实践。原因有三:一是半途而废,仅形成一些初稿,形式有草稿、油印本和铅印本。二是认为在大跃进、浮夸风的严重影响下,记述不实,失去存史价值。三是这次修志的历史背景以及留给人们难以忘怀而又不便言说的伤疼,使人们不愿提及。由于上述原因,对于这次修志所形成的资料,自然会认为其价值不高,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

就修志而言,我虽然也是半道出家,但在有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社会阅历之后,专业从事志书编纂,自然也有一定的优势和自信,但对于1959年的这一次修志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并不十分清楚。而在此后的十多年中,虽然也多次听说修志人员在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查阅过这些资料,也对有关资料在整理、考证之后,有所参考和利用,但并没有引起我对这批资料的特别重视。直到2013年,省卫生厅在组织编纂第二轮《甘肃省志·卫生志》的过程中,由编纂人员收集整理印刷了《甘肃卫生史料》一书。

该史料在名为《甘肃卫生志》旧志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约35万字,下限为1960年,记述略古详今。资料来源:由原甘肃省肿瘤医院院长张宗久在兰州市皇庙旧书市场购得,共一套6册。其中无编纂机构和编纂人

员署名,但有甘肃省档案馆收藏印签及编号。经该院同仁仇杰、郭汉彪看后,认为具有收藏价值。张宗久于2000年因工作变动调离兰州时,将其交由仇杰保存。经查实,这一套6册的《甘肃卫生志》旧志稿,即为1959年由中共甘肃省委组织编纂的《甘肃新志·卫生志》志稿,从省档案馆流出。追踪调查从省档案馆了解到,该志稿不知何种原因于1980年7月退回到省卫生厅。之后又不知何种原因散失,流传到社会,幸被有心人购得并妥善保存,后又得到荐举并获得支持,最终得以成书。此志稿虽然历经波折,命运多舛,但最终得以留存,传承下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成为甘肃方志界的一段佳话。

经查阅有关资料,此次修志的情况逐渐明晰,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59年3月7日,中共甘肃省委下发《同意省委宣传部关于编写“甘肃新志”的意见》,提出“这是一项富有政治意义的重大工作,希各主管部门立即组织人力,作好具体的安排部署,使此项工作迅速进行起来。”

省委宣传部《关于编写“甘肃新志”的意见》,明确编写《甘肃新志》的内容、原则和方法。内容包括:地理志(包括生物)民族志(包括宗教)、革命(农民)运动志(包括人物)、公社志、工业志、交通志、农业志、林业志、水利志、畜牧志、财贸志、教育志、文化艺术志、卫生志、科学技术志、近百年大事志,共16部。编纂时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以解放后10年为重点,对解放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也要作应有的叙述,并且要结合庆祝建国10周年的总结工作进行。文字一定要精练、准确,一律

用语体文。并且成立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主任委员,以省委书记处书记霍维德、高健君为副主任委员的《甘肃新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若干编辑小组。要求省委各主管部门提出编辑小组名单,审定编辑小组撰写的初稿,在当年7月份递交编委会审查定稿,争取国庆节前部分开始出版。

随着工作的进展,成立以阮迪民为总编辑的总编辑部,专门进行新志的研究、汇编和审定工作。新志的审查实行三审终审制:由各编辑小组进行初审,各大口复审,由总编辑部负责终审。复审的要求是:从观点、政策、资料、体例和各志相互联系等方面审查,达到正确无误。

新志编纂未能如期完成任务。截至1961年4月,除公社志外,完成初稿15部,而志稿审查工作实际上已陷入停顿。根据这种情况,省委宣传部提出关于暂停《甘肃新志》编审工作的意见,“待以后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是非界限划清,思想认识提高,力量也能够来及时,再继续进行。”至此《甘肃新志》编纂工作正式宣告结束。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1959年修志虽生不逢时,半途而废,但是组织严密,高效运作,工作严谨,成就斐然。省档案馆资料目录所载的此次修志资料,可谓全面系统,百科俱备,具有鲜明特色。从《甘肃卫生史料》篇目来看,大体做到了结构合理,脉络清晰,基本上符合志书的规范和要求。从内容来看,主要反映了甘肃民国时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个10年卫生事业的大事大略,突出了卫生防疫、医疗预防、中医中药、妇幼保健等。从记述来看,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印迹和感情色彩,但从中也能明显感受到编纂者的坚持和追求,大体做到了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用事实说话,基本事实准确。《甘肃卫生史料》虽然没有通过最后的编审,缺乏后期的修改、加工、润色,属于志

书编纂的阶段性成果,但是能够达到初稿的水平,具有一定的资料性和参考价值。

“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历史事实是通过资料来展现的。资料是历史研究的依据,留存和掌握的资料越多,在相互比较和印证中,就越能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客观公正。各种历史资料都可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正确认识这种局限性,而不带有任何偏见,也是尊重历史的一种表现。资料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有时残缺的只言片语却能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因此,无论是谁主持编纂的志书,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编纂的志书,无论这个年代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记忆,无论它是否最后成书,只要它有一定的资料性和参考价值,都应把它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王秉祥:《甘肃省志·序言》),使它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笔者十分赞赏卫生界有识之士慧眼识珠,使《甘肃卫生史料》得以成书,使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关注《甘肃新志》编纂留存的这一批志稿。但愿《甘肃新志》开发利用的成果不断涌现,为甘肃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巡视员、省志编纂处处长)

# 地情信息网创建的实践与思考

王超

地情信息网建设,是地方志事业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网络时代,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需要地情信息网服务,地方志事业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融入信息网络世界,以信息网络为手段,增强自身优势,提高地方志科学发展水平和为社会提供地情信息服务的公共服务能力,在信息化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2014年我办根据酒泉市史志办要求着手建设瓜州地情信息网站,通过一年的学习和网站建设,谈谈自己的看法。

## 一、地情信息网建设的用途和意义

地情信息网能有效拓展地方志信息资源库,是最便捷、最先进、最有效的服务平台,服务工作不受时空限制。创建地情信息网是创新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新突破口,是实现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古老传统地方志相结合的新生事物,是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地情信息网站、资料库建设与办公自动化建设相结合,将给地方志事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一是可以促进地方志工作的现代化。地情信息网可促使传统手工操作工作模式的改变,给编纂指导、编辑实务、行政管理等工作手段带来新的工作模式,实现组稿、写稿、评稿、指导改稿、编稿、统稿等工作的电子化和公无纸化,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还可以与系统内部之间、有关部门之间和全国各地同行之间建立联系沟通、交流学习、互动提高。二是可以改变传统修志手段和传播方式。地情

信息网兼用多媒体技术生动形象地展示、还原志书、年鉴及其他地情书的内容,尤其是将建筑风貌、城市地标、山水风光、戏曲民歌、服饰方言等难以用文字充分表达的内容表现得淋漓尽致,弥补纸质书籍表现形式的不足,增强地情资料的传播效果。三是可以改变传统的“存史”模式。建立数字化网络资料库,把新编志书、古籍旧志、年鉴及其他地情书形成电子信息永远保存,改变传统纸质资料单一保模式。同时实现了图片资料、光盘资料、影视音像资料等多元并存方式,开拓了地方志“存史”工作的新局面。四是促进队伍结构转变。网站建设与开通运行、规范管理,将促进地方志人力资源的不断整合和优化,改善知识结构,促进信息网络人才的培养和训练,使地方志队伍综合素质得到整体提高。

## 二、网站名称应该统一为地情信息网

就目前已经发布正式开通的各地地情信息网站情况来看,大部分都没有统一的命名,有的叫地情信息网,有的叫地方史志网,还有的叫地方志鉴网等等,五花八门,什么样的叫法都有。而从地情信息网站的主要功能和用途考虑出发,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命名规则,就我个人的意见,应该命名为:地域名称+地情信息网,比如瓜州县的就可以命名为瓜州地情信息网,这样命名的主要好处是让人们一目了然,知道网站介绍的是什么地方的地域情况,其二是地情信息网虽然主办方是地方史志办,但它所展现的内容和功能定位已不仅仅只限于一个部门,而是整个地域特色、文化和社会

事业发展等全方位的问题,因此,地情信息网的定位要准,目标要高,是地方整体形象展示的门户网站。

对于地情信息网站的域名命名规则,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要求,按照惯例,作为地方政府主办对外推介和公益宣传的网站,域名命名的二级域名和顶级域名分别是.gov和.cn,这样命名有很强的可信度和公信力,目的性很明确,便于用户查询和浏览。如果用户对该地方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旅游等情况感兴趣,就可以直接去访问。而目前我省好多县级地情信息网的命名是五花八门,顶级域名有.com的,也有.net的等,不能明确显示网站的归属和用途,给用户造成很多不便,同样也会影响网站的访问量。

### 三、网站功能确定要准确到位

地情信息网应根据地方志的宗旨来确定网站的功能定位。主要以提供地方志资料为主体的公益性地情信息服务为主体的地方性门户网站。两个功能相结合,合理分配,使网站既为地方志系统服务,更为广大用户服务。如果定位不准,就难以立足,甚至被淘汰出局,任何一个信息服务机构都不可能把整个信息市场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盲目追求新、快、宽、泛、全,这样反而容易丧失竞争力。地情信息网必须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来准确定位信息服务的基础目标市场。

地情信息网资源优势是拥有古今志书、年鉴及相关地情资料,同时拥有涵盖范围广、时间跨度大、资料齐全、权威、可信度高的信息资料宝库,是传承地方自然与人文遗产的宝贵财富。而就一个县来说,拥有几本志书、年鉴,信息资源保障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实现了省、市和兄弟县市资源共享,形成地情资料库的整体规模,就能强化资源优势,同时随年鉴编纂工作不断进行,又源源不断地充实信息量。因此网站的功能定位应该是以志书、年鉴及相关地情书构成的地方志资料为主导的信息产品和提供公益性信息服务。

### 四、网站栏目设置应紧扣网站功能

网站栏目是网站功能的实现形式,网站功能一旦确定,就紧紧围绕网站功能来设计栏目内容,

一级栏目不宜过多,但也不能太少,大概是8—10个为宜,栏目名称要有高度的概括性,一般以4个字为宜,并能充分体现网站功能。就瓜州地情信息网来说,依据网站功能特点,我们设置了史志工作、政区概况、历史回眸、自然资源、县域经济、人文荟萃、社会发展、名胜旅游、基础设施和乡镇概览10个一级栏目,充分体现出网站以志书、年鉴、地情书和历史资料为重点,兼顾瓜州经济社会发展、地情地貌、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等资源信息,有力推介和宣传瓜州县的整体发展概况,使网络用户通过浏览瓜州地情信息网,就能实现对瓜州整体概况较为全面了解,真正体现了地情信息网的宗旨和功能特点,有效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和访问量。不但能服务广大网络用户,同时也能大力宣传了瓜州这片热土,更进一步吸引大批有志之士来瓜州旅游观光和投资兴业,使网站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五、网站顶部内容要展现地方特色风情

地情信息网一般都是除地方政务网之外的唯一一个具有地方综合特色的政府主办的门户网,信息资源、服务内容、地方文化习俗等涵盖内容极为广泛,因此,在网站的设计过程中,要特别重视网站顶部内容设计和页面总体规划,顶部内容是网站整体设计的一部分,从网站整体页面布局、背景设置和美化入手,注重色调搭配,要用能够体现当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民俗风情等图像或影像资料来制作顶部内容。顶部内容相当于网站的眼睛,在网站整体设计中特别重要,通过顶部内容的展示,直接体现出网站的主要功能和服务内容,还能体现出地方特色、地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信息。

瓜州地情信息网顶部内容的制作,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动画背景图片的合成,另一部分是动画内容制作。背景图主要由瓜州锁阳城遗址、榆林窟外观、瓜州高铁、高速公路、瓜州风电场、750变电站、瓜州蜜瓜、瓜州枸杞、瓜州甘草等多张图片素材加工处理而成,充分体现了瓜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民俗风情;动画是“世界风电之都、中国蜜瓜之乡、能源战略通道、西部文化重

镇、陇上药材基地”几个大字反复滚动出现,充分展示了瓜州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六、网站要有强大的兼容性和扩充性

地情信息网的规划和设计要有足够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兼容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旅游资源开发和民俗文化挖掘,为了进一步突出的地方特色,宣传县域经济社会、人文历史发展等,在规划和设计网站时特别注重网站的科学性和可兼容性,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可以随时扩充网站功能、扩大网站容量。

网站后台管理和维护应设有不同的管理权限,一般设计为三级管理权限,增强网站的安全

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分别为:超级用户管理员、网络用户管理员、普通用户管理员。名称不同则管理权限不同,超级用户管理员不但具有网站的后台管理的所有权限,而且还可以增加或删除网络用户管理员和普通用户管理员及它们的管理权限;网络管理员的权限主要是对网站管理和维护,那些内容可以发布、那些内容不能发布,主要由网络管理员进行决定,同时也可以对网站栏目进行扩充或删减;普通用户管理员就是通过网站后台,上传各类信息资料,丰富网站内容。

(作者单位:瓜州县史志办)

(接 26 页)

③ 赵建新《陇东南影子戏初编》一书《陇东南影子戏的形成和发展》部分说:“已故西礼县(今分西和、礼县两治)文化馆馆长牛仰儒(遼夫按:西和县人)搜集到一批明末皮影体和清初的十七种戏书抄本,当地作家黄英先生还记得此事。这批珍贵的影子戏史料不幸于‘文革’中毁佚,仅能从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王佑平编西礼文化馆油印的小册子《西礼戏曲》看到《唐僧取经》、《反天堂》、《蟠桃会》、《槐荫记》、《玉麟图》五个剧名和《玉麟图》中‘七七七七七七七五’式的一段唱词。”(台北《民俗曲艺丛书》之一,1995年初版第11页)2014年10月23日、25日本文作者两次与黄英(甘肃师大中文系1963年毕业,西和县人,退休前任西和县政协副主席。曾在西和县文化馆工作。)通话,言他当时所见剧本全为麻纸抄成。又罗卫东主编《陇南史话》于《古迹文物》部分说:“1959年3月,‘西礼戏调查研究委员会’从西和稍峪乡马家河村马富魁处发现明清时期手抄影子腔剧本54部,戏折一幅。手抄剧本年限上至明万历年间,下至清光绪年间,可证早在400年前陇南影子腔就在西和一带

流传了。据考,这些剧本大多都是西和县稍峪乡白杨树村杨鼎(字海山)抄录并保存下来的。1940年被其后裔杨二盘卖给了兴隆乡冉家村李阴阳家,不久又被马家河村马如意赎回,传至第四代孙马富魁手中。1959年搜集整理民间文艺资料时将其中的17部拿去存放于西礼县作协,不幸于‘文化大革命’中遗失,其中有注明‘明万历年抄’的珍本《玉麟图》以及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抄写的《风云驹》、《天竺国》、《竹节山》、《铁弓图》、《铁叉山》、《坐西凉》、《反天堂》、《槐荫令》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第180页。)看来被收去17种是时间最早、文化价值最高的17本。

④ 刊《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48年(19),489—498页。

# 由陇南麻纸看中国造纸的历史

赵逵夫

## 一、从地理位置和历史 看陇南麻纸的制作地

甘肃陇南的西和、礼县、成县交界之处的西汉水流域,自古为产麻纸之地。这有其地理、历史方面的诸多原因。

(一)陇南、天水一带历史上盛产大麻,不但一些地方专门种大麻,而且所有的包谷地边都要种大麻,成了一个传统。大麻一则籽可以榨油,二则皮可以捻线、织布。因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乡下人主要穿麻布,麻绳、麻布口袋等用处也十分广泛。同时这一带又山上多林木,构树也很多。麻、构树皮都是古代生产纸最重要的原料。

(二)这一带在古代从东西交通来说处于丝绸之路东段,其北距秦州(天水)不是很远。汉唐时期是古都长安人力、物质资源供给地,《汉书·地理志下》言“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翰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即言此。

(三)从南北交通来说,这一带为蜀道西线的北端,诸葛亮六出祁山曾走此路,魏晋南北朝时期氏人的南北迁徙,仇池国的联络、作战经由此路,杜甫入川也由此路。从西和的洛峪向南经成县、康县,又是古代的茶马古道,蜀陇经济交流也在这一带进行。西和县石峡乡坦途关双石寺北崖上发现的唐代开元年间《新路颂》摩崖石刻就反映出历代对这一条路的不断经营<sup>①</sup>。所以说,这一带正处于丝绸之路和茶马大道即古蜀道的交叉点上。

(四)从地理形势上说,地处西汉水上游,西高山、大桥、蒿林、太石河、石峡一带距西和、礼县、成县的县城中心都比较远,在历史上有时属西和,有时属礼县,有时属成县。在近几年中被看做最偏

僻之地。但在陆路交通不十分方便的古代,西汉水在仇池山西南转而东流,由武都、康县与成县之间入陕西,在略阳汇嘉陵江南流,至四川流入长江,这几个乡镇或在西汉水边上,或西汉水支流从中穿过,从同外县的交通来说,水上交通是比较方便的。

(五)唐代以前在汉族之外人数最多、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氏族从东汉末年起即以这里为中心建仇池国,疆域最广时东至今陕西汉中,南至川北平武一带。其延续时间,不计其后续的武都国、阴平国、武兴国,仅前后仇池国 234 年<sup>②</sup>。而且在几次战乱中,这里成了关中人士避难之地。西晋初年杨茂搜率部落四千家还保仇池,“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茂搜近纳抚接。欲去者,则卫护资遣之。”<sup>③</sup>至一百三十来年之后的刘宋初年,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丰实,多所依附。”<sup>④</sup>此时仇池国“改元建义,立妻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sup>⑤</sup>仇池国立国期间一直军事活动频繁,先后与西晋、东晋各朝及北魏、刘宋朝廷联系也多,其首领先后被封为“百顷王”“仇池王”“武都王”等。仇池山一带在一个时期中竟成了相当范围中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

(六)汉唐时上禄县在这一片地方的东北部的六巷河边上。《后汉书·党锢列传》载:“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言:……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唐李贤注:“上禄,县,属武都,今成州也。”唐代成州之州治在上禄<sup>⑥</sup>,关于上禄其地,《水经注》卷二十《漾水》部分说,西汉水与洛谷水(今洛峪河)汇合后,东南流与洛溪水(今六巷河)汇合。洛溪水北发洛谷,西南与龙门水合。龙门水即六巷河的支流石峡河。龙门水“出西北龙门谷

……又南迳龙门戍东,又东南入洛溪水,又东南迳上禄县故城西……”据此,则上禄县故城正在西高山东南侧山下的六巷河东岸。但上禄县的建置从西汉至东汉一直存在,三国时罢,其后西晋又建上禄县,前后秦(350—417)也建上禄县。酈道元(446?—527)所记上禄故城应是后秦上禄县遗址。隋代又设上禄县,至唐代仍在。上禄县城之最后遗址,应在西和县六巷乡的上六巷。“上六”之“六”旧读“陆”,与“禄”音同,民间取其简捷而写作“六”。言其为“巷”者,既非城镇,而留有街巷旧迹,因而称为“上六巷”。其地有中元寺、上元寺、下元寺旧址,至今存木构彩桥一座,上有廊房,建筑颇为精致,当地父老言是“接官桥”。则这一带在古代也曾是一个文化的中心。

由于以上这些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使以西汉水为纽带、以仇池山为中心、以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即蜀道为依托、先后以上禄县城和纸坊镇为门户的几个地方,从很早起形成麻纸生产之地。

## 二、西和麻纸制作点的分布

陇南西汉水上游目前还在生产纸的地方有西和康县的几个乡镇。康县李家山的造纸工艺流程已有张永权的《康县大堡镇李家山手工制造构树皮纸工艺探访》、孟小为的《蔡伦造纸活化石——陇南麻纸》一文加以介绍<sup>①</sup>,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孟子为同志并且作了91分钟的《李家山》纪录片播出。同时康县目前所产不是麻纸,而主要生产二连纸、四才纸、经版纸、改良纸,用料也以竹篾、构树皮、稻草几种为主。属混合料纸,与唐代的麻沙纸(后演变为呈文纸)同类。所以这里主要介绍西和的麻纸生产情况。

西和历史上生产麻纸的地方集中在其南部西汉水流域、以仇池山为中心的大桥、西高山、蒿林、太石河、石峡这五个乡镇。下面对这几个乡镇作一简要介绍。

(一)西高山乡,地处西和县最南部的东侧,东与成县的纸坊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属西和)相邻。山上土地平旷,水土丰饶,有多个村庄。民国

时属天石镇,1949年设上寨、成集两乡。四面陡绝,三面环水,山顶丘陵地带,地势平缓,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名符其实的“百顷山”。山上有古城堡,有泰山庙,出土过“晋归义氏王”和“晋义羌侯”金印。唐代以后很长时间中由同谷县(今成县)管辖,地处成县以西,故称“西高山”。值得注意者是山上有成起寨,山上多姓“成”者(姓氏、地名“成”当地读如“申”)。成纪古邑曾设于此。古人建都邑多在能避水患、又土壤丰饶的高平之地。成书于汉代的《遁甲开山图》中说:“仇夷山,四面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又说:“伏羲生成起。”(《路史·后纪一》罗莘注引)。“成起”即文献中所说“成纪”,“起”“纪”声旁均从“已”,为一音之转。它与仇池山相距甚近,故文献中将二地混而同之。又《路史》中说伏羲“生于仇池,长于成起”。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言华胥“生伏羲于成纪”,应是说的此成起。<sup>②</sup>从这里出土过氏王、羌王的印这一点来看,西高山在古代很早的时候曾经成为区域性政治中心。西高山造纸的地方主要在其西南山脚下六巷河边。

(二)大桥乡。因镇上有铁索桥架西汉水上,因以为名。民国时设大桥镇,1949年设大桥区,下设几个乡。地当西高山的西南面,在西和县最南,西汉水从西北由蒿林乡流入,经大桥镇在仇池山西侧南流,在仇池山西南角折而向东,在仇池山东南角合洛谷水东南流入成县与武都、康县交界处,东至陕西。山大沟深,气候温暖,无霜期较长,物产丰富,森林茂密。窑孔峡留有古代栈道孔。在马集村发现过汉墓。大桥历史上制作麻纸历史较早的地方有其西南部的龙凤(上世纪五十年代为龙凤乡)。1959年西和中学学生往龙凤搞校办工厂,学生住黑沟坝农民家,本文作者和几个同学住的那家房背后即有制麻纸的捣浆池和纸槽,房檐下挂有抄纸所用网框、簾子等工具。房东一次来取东西,我问那些工具是干啥的,他说是造麻纸用的,并简单地说了制麻纸的过程。他说那些工具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大桥西汉水边上的其他地方过去也造麻纸。

(三)蒿林乡,在大桥乡以西,骆峪乡以南,西

与礼县接壤,西汉水由礼县流入,西南流入大桥。西汉水两岸为大山,与大桥一样山上多林木。南宋之时已有蒿林寺之名,当地有“榄桥”“桥头”等地名,看来古代不是很偏僻的地方。古代在交通上又由于西汉水而相对比较方便。

(四)太石河乡,在西和县西南角,当大桥西南,蒿林以南,西与礼县接壤,南与武都接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叫银杏乡,其自然条件与大桥、蒿林相近,森林茂密。太石河西面由礼县流入,贯其境,东至大桥流入西汉水,水流资源丰富,为造纸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和交通条件。

(五)石峡,在西高山以北,正在古代蜀道上,有石峡河,两岸悬崖上有古栈道凿孔痕迹。其东六巷乡,有上六巷,为古上禄城旧址。上禄城在前秦之时当迁于今西高山下朱刘河以东。其西北有坦途关,即古之龙门镇,杜甫入川过此有《龙门镇》一诗。其开头二句说:“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吴玠守蜀”条作“潭毒关”,以为“控扼之地”。可见这一带为川陇交通要道。其地过去同样多林木,也产大麻。其东南与今成县纸坊镇相邻,是西和走纸坊镇和成县的必经之路。

以上这五处地方均在西和县城最南处,是西和、礼县地理纬度的最南和境内海拔最低之处,当西和、礼县、成县、武都交界的地方,与成县、武都比也是海拔较低之地。首先,全年偏南风,基本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降水量在600毫米左右,无霜期在200天以上。唐宋以来属地广人稀之地,山大,水源丰富,多成片的森林,植被好。其次,全在西汉水流域,有着靠山依水的地理特征。不仅采集生产原料方便,原料运送也方便。再次,在两县或三县相邻处,虽距西和城、礼县城较远,但处于陇南几个县城邑镇中间;水路沿汉水而下至略阳、汉中,陆路沿蜀道而上至天水、宝鸡,均较方便。可以说具备取料、造纸和销售的最佳条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合作化运动以后要求农民全心种地,未认识到发展手工业、尤其发展传统工艺对于改变农村面貌的意义,农民不能作副业生产,后来竟把个体生产麻纸看作资本主义因素严加取缔。“文革”结束后,陇南的麻纸生产逐渐有

人做起来,但已没有四十年代以前普遍,产量很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西高山乡政府曾成立麻纸厂,但由于经营和管理中的很多问题,后来停产。改革开放以后西和首先恢复了麻纸生产的是西高山朱刘河村,目前又在县上的支持下修建了规模可观的麻纸厂。

“朱刘河”是今朱河村与刘河村两个行政村的合称,位于西高山乡东南的山下。六巷河流至石峡乡的东北角,从此成为西和与成县的分界,流至崖房下一段其西侧之地又称“朱家河”,流至马家坝一段其西侧之地又称“刘家河”,因以为村名。朱刘河与成县的二郎乡接壤。由朱河与刘河东北走成县纸坊镇二十多里路,也极便利。其南临西汉水,与武都接壤,是二水相交、三县交界之处。其地靠山依水,植被茂盛,1958年以前森林覆盖率在80%以上。

历史上朱家河、刘家河一带制作麻纸的作坊较为集中,延续时间也长。2009年,朱刘河手工麻纸制作被列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又命名了胡凤钰、尹涛、刘伯芳、尹芳东为西和麻纸传承人。他们几家只从有记载有名字的上辈数起,也已是第六代或第五代。<sup>⑨</sup>现朱河村有居民61户,370余人,刘河村有居民99户,436人。村中除种地以外,造纸属家庭副业,多是一家一户的家庭作坊。2014年全村人均收入1400元。

虽然麻纸生产中断了二十多年,但由于这些地方仍然是属于偏僻地带,受近代工业化的影响少,生产工艺的改良进程缓慢,所以西高山朱刘河村的麻纸生产仍保留了手工制作的较原始的制作工艺。所生产的麻纸是典型的“手工纸”。古纸研究专家说:“所谓手工纸(handmade paper),就是指使用手工方式抄造而成的纸。”<sup>⑩</sup>自我国发明造纸术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所用的纸都是采用手工来完成的。

### 三、古老的制作方式

西和麻纸的制作,从原料和工艺两方面显示着它制作的原始性。

(一)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破旧麻制品和构树皮为原料,现在全部以构树皮为原料。

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有的作坊用破麻布、烂麻鞋为原料,故当时西和、礼县、成县、徽县、天水一带城乡常有收烂麻布、烂麻鞋、麻绳者,给主人少许钱或针线之类物品。近几十年中因为再没有人穿麻布衫,也很少有人穿麻鞋,用麻绳、麻布口袋(骡马身上搭的装东西袋子)等日用品的人也越来越少,再没有人收这些东西,所以现在造麻纸原料全用构树皮。东汉班固、刘珍等编《东观汉记》中说:“伦(按指蔡伦)典尚方造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穀纸,鱼网名网纸。”三国时魏董巴的《大汉舆服志》中说,蔡伦“后所造纸,用麻,故曰麻纸;用木皮,曰穀纸”。范曄《后汉书·蔡伦传》中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纸。”敝布指麻布,因为棉花是在七世纪才由印度引进我国。鱼网、绳索自然也是麻的。因此,蔡伦当年所造,也即今日的手工麻纸。《后汉书》中说的“树肤”即树皮,但未说是什么树皮。联系《东观汉记》说的用木皮所制名“穀纸”看,指穀(今多写作“构”)树皮无疑。由以上这些文献所载看,蔡伦当年造纸所用的树皮即构树皮。西和麻纸用料与之完全一样。

“穀”(gǔ),从“木”。<sup>①</sup>旧读音同“构”,故后来



也写作“构”。写作“枸杞”的“枸”是错的。又有的人写作“谷浆树”,这是将“穀”误认为“穀”,又简化为“谷”,亦误。

构树是落叶乔木,叶子卵形,先端尖,边缘具粗锯齿,似桑叶。表面暗绿色,互生,柄长。叶子和枝上有硬毛,花淡绿色,雌雄异株。果实称楮实子,

球形,与根俱可入药,有补肾利尿、强筋骨的作用。嫩叶可以喂猪,木材可以制作器具。构树的树皮蝉灰色,平滑。内皮层纤维较长而柔软,吸湿性较强。枝条粗壮而平展。茎皮自古为造纸的原料。构树喜暖速生,耐旱、耐贫瘠,对土壤要求不高。西和县大桥、太石河、蒿林、石峡及西高山朱刘河一带山上山下都很多。现朱刘河一带有大面积种植。

构树习惯上又称作“楮”(chǔ)。《山海经·西山经》中说“鸟危之山,其阳多磬石,其阴多檀、楮。”郭璞注:“楮即穀木。”袁珂校注:“即构木。”其实二者同属异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三·楮》:“按许慎《说文》言,楮穀乃一种也,不必分别,惟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叶无桠枝,三月开花成长穗,如柳花状,不结实,歉年人采花食之。雄者皮白而叶有桠枝,亦开碎花,结实如杨梅,丰熟时水澡去子,蜜煎作果食。二种树并易生,叶多涩毛,南人剥皮捣煮造纸;亦缉练为布,不坚易朽。”一般人看作同一种树,无论说穀(或“构”),还是说楮,都兼指二者。

陇南几个制造麻纸的地方,老百姓在附近山上多种构树,连房前屋后也都是构树连片。过去西和麻纸用构树皮和所收烂麻织物两类原料制作。东汉时蔡伦改良造纸之法,其材料也是构树皮和麻头、破麻布都用。西和麻纸也是如此。现西和全部用构树皮,只是名称沿袭历史上的叫法,还叫“麻纸”。

(二)至今保留着一套手工制作的工艺流程。

西和制造麻纸的流程体现了古代造纸的主要特征。据《天工开物》等书记载,古人造纸通过浸泡及和上石灰以去其原料中的果胶质、色素及半纤维素,和以草木灰使木素发生降解。这是在现代化学兴起之前中国古代造纸术中的重大发现,从而使古纸脱离了丝絮自然挤压成片的粗糙状况,而成为一套完整的科学生产工艺。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二云:“但伦(按指蔡伦)始煮树皮、麻头、敝布、鱼网,捣以成纸,故纸始良耳。”应该说,蔡伦在造纸上的贡献就在使这些严格操作规程的完善上。

过去西和麻纸制作地一些老人说,自古来老

人们都说：做麻纸有七十二道工序。我们分析这应是就每一道大的工序中将操作规程细分为若干环节而说的。麻纸的原料处理起来工序多，很烦，所以人们常说“麻烦”。

现在不用烂麻鞋、烂麻布了，都用构树皮，也同样工序很多。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十六道工序：1、采料、晒料；2、浸泡；3、蒸煮；4、浆灰；5、再蒸煮；6、漂洗；7、踩踏；8、打片；9、切穰；10、捣浆；11、入槽；12、抄纸；13、压榨；14、上墙；15、晒纸；16、削整、揭纸。这十六道工序按其操作关联度，可以合并为八个阶段，即八个大的工序。下面作一概括介绍。

1.采料、晒料。每年春天构树发芽时，砍下两年生枝条，剥下皮来，把这些树皮捆绑成小捆悬空晒干，以利于其中粗纤维与细纤维的分离。

2.浸泡、蒸煮。将已晒干的构树皮在水池中浸泡六个时辰左右，使其柔软，捞出后放入自制蒸窑蒸六个时辰，再熄火焖一至两天，取出，再重新放入水池，浸泡六个时辰。主要是为了除去其中可溶性杂质。

3.浆灰、蒸煮。将浸泡好的构树皮捞出，放入石灰水池搅拌均匀。然后再二次入窑蒸十二个时辰，然后熄火覆盖焖二至三天。这也是为了进一步除去其中的果胶、木素。

4.漂洗、踩踏。取出蒸好的构树皮放入河水中漂洗，并用脚踩踏，以洗尽石灰。然后堆擦起来干踩。再放入水池中浸泡十八个时辰，用脚踩踏除去粗皮。凉散后用手抖掉树皮中的杂质，晒干；再放入水池浸泡十二个时辰。

以上2、3、4这三道大的工序，都是为了除去构树皮中的胶质等，并使粗纤维同细纤维分离开

来，提取其中的精细部分作为原料。

5.打片、切穰。将浸泡了十二个时辰的构树皮捞出，拧干水分，分成小把，用石碓将小把构树皮砸成片状，堆擦到长木凳（俗称瓢床）上用绳固定，用铡刀切成二寸来长的碎料，这种碎料就叫“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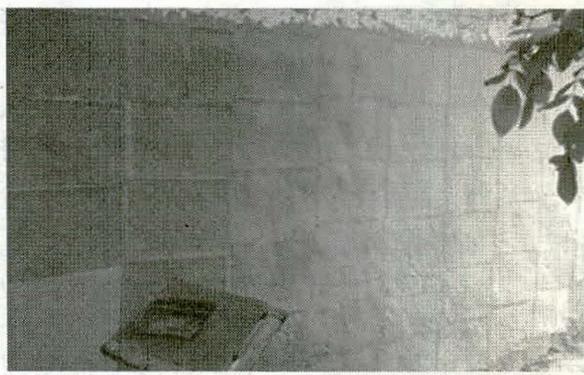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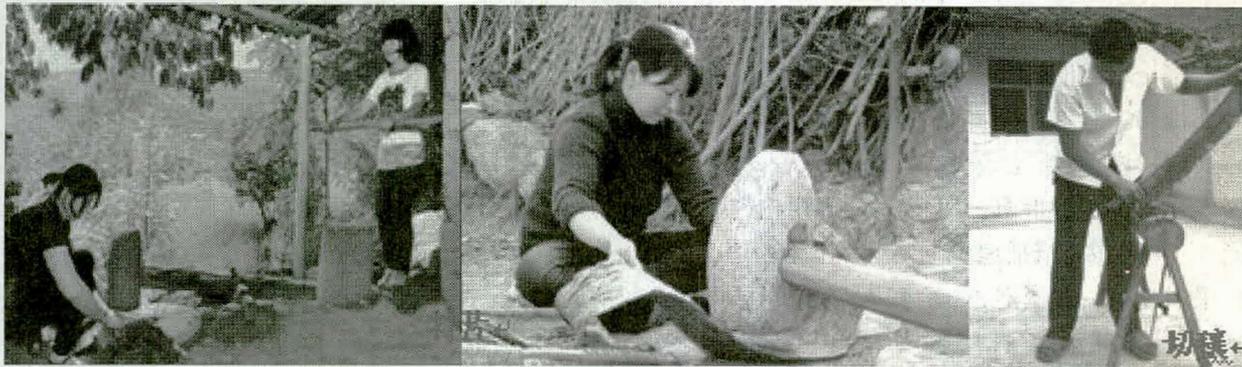
6.捣浆、入槽。将瓢放入捣浆池搅和成泥状，按每天抄纸数量多少投瓢入槽，搅拌均匀，沉淀六个时辰。

7.抄纸、压榨。抄纸者手执纸帘、约尺（条形木尺，一对）及帘床组合而成的器具（帘床承托纸帘，纸帘用于分离纸浆中纤维和水，约尺放在纸帘两边阻挡纸浆流出），在纸浆池中捞纸，术语叫抄纸。每抄好一帘纸，反扣到纸槽旁边的木板上，够五十张时，上加木板，再用木杠一头坠上重石压榨半个时辰左右，以去掉多余水分。

以上所述，为小幅纸张的情况。若要造规格较大的麻纸，因纸张中还有水分，尺幅又长，揭纸上墙时容易断裂，压榨去水这一环节就派不上用场，只能用尺寸较大的纸帘，一帘一帘抄，一张一张地晒。

8.上墙、揭纸、削整。将压去太多水分的纸从压榨机上取下，一张一张用扫帚扫在平整光滑的土墙上，扫的时候吹一口气以助其尽快贴上墙面。晒干





后,又从墙上揭下来,按数打捆。至此,麻纸制作就完成了。

这种工艺同文献中记载的古代造纸方法基本一样。明代陆容(1436-1494)的《菽园杂记》卷一三讲到用楮树皮造纸的方法:“其造法,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掺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桌状,圪以石灰而厝(放置)火下也。”这应反映着蔡伦以来造纸的大体工序。西和造麻纸的工序与此大体相同,只有

使之变干的方法,此用烘干,而西和过去用日晒,显得更原始。再看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称用竹子造纸的图:

两相比较,西和麻纸的制作方式在有的环节上显得更原始。这对我们了解、研究我国古代造纸的方式都是有意义的。

由于大桥、西高山等地近数百年来处在几个县交界处,文化不发达,历史上又时属成县,时属礼县、时属西和,故史书、地方志关于其造纸的情形记载不多,也很少受到学者、文人的关注。当然,另一方面也正由于它的闭塞,使其较原始的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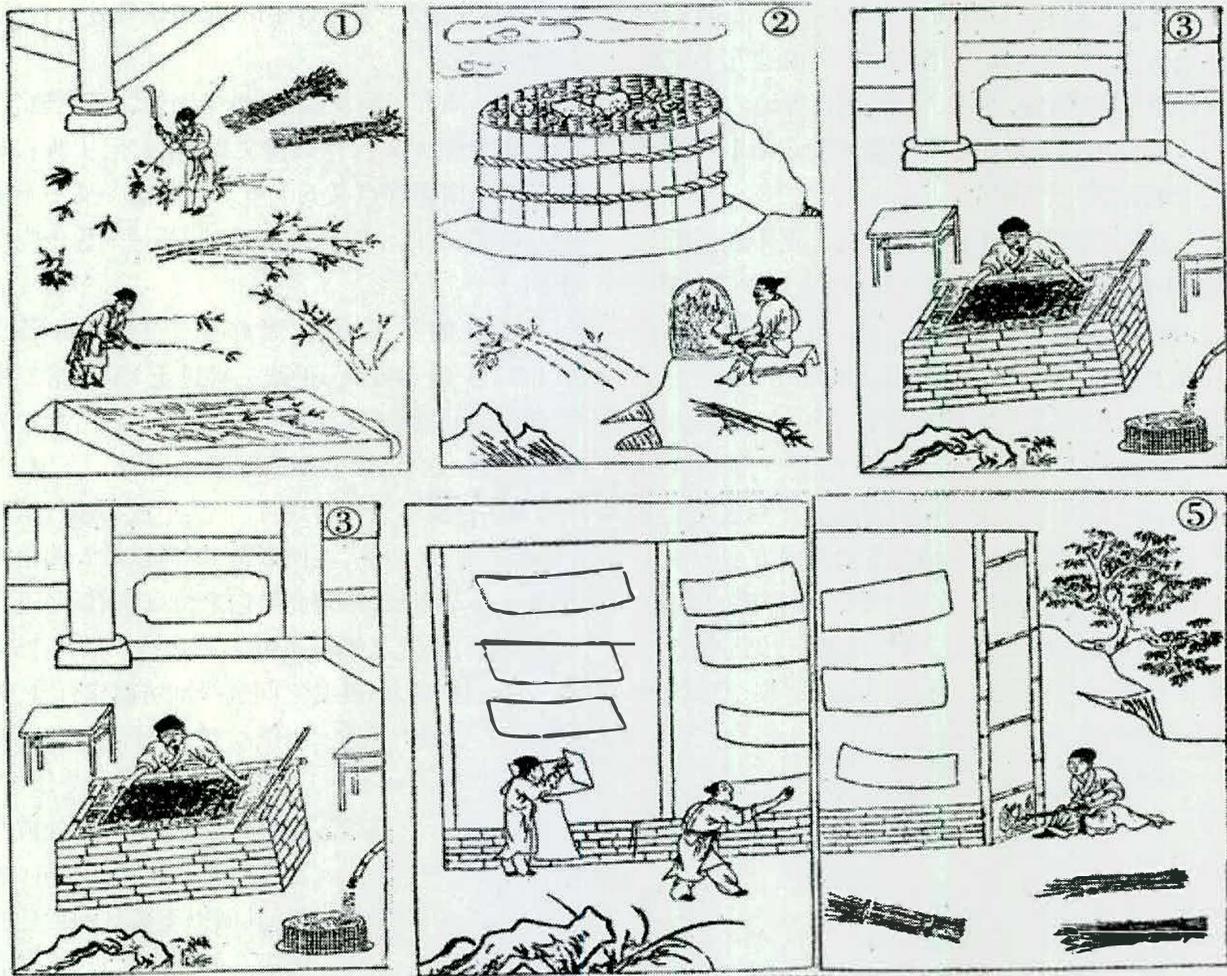


图1-5 天工开物图

①泡料（斩竹漂塘）；②煮料（煮徨足火）；③捞纸（荡料入帘）；④榨干（覆帘压纸）；⑤焙纸（透火焙干）

一直保存至今。今天，我们由一些历史线索，仍可以看出其它的历史及其在古代文化传播史上的地位。

#### 四、西汉水、纸坊镇与麻纸制造

西和麻纸传统的几个生产地，西汉水从蒿林、大桥穿过，太石河与六巷河又是西汉水的支流。总之，这些地方都是靠山、近水，属山林地带，而且全在西汉水流域。沿西汉水向东南武都县龙坝乡（紧靠西和大桥乡）、康县境内的太石乡昌河坝，也是历史上以造纸出名的地方。这些全都是在西汉水流域，或者就在西汉水边上。同样以产纸出名的康

县大堡镇李家山也紧靠西汉水一条支流。原因很简单：西汉水是陇南最大的一条河，而且向东贯穿几个省的地方（汉代以前西汉水与东汉水相连为汉水，大约在汉代之时由于地震的原因其上游部分流至略阳而堰塞受阻，改而东流入嘉陵江），又汇集了众多支流，于取材、运输都方便。

首先，西汉水养育了大片林木，为造纸提供了原料。这些地方，漫山遍野的构树可以去采二年的嫩枝以取皮，人们的居住地也宽大，房前屋后可以种很多构树。

其次，它与它的大小支流也为造纸原料的浸泡、蒸煮、淘洗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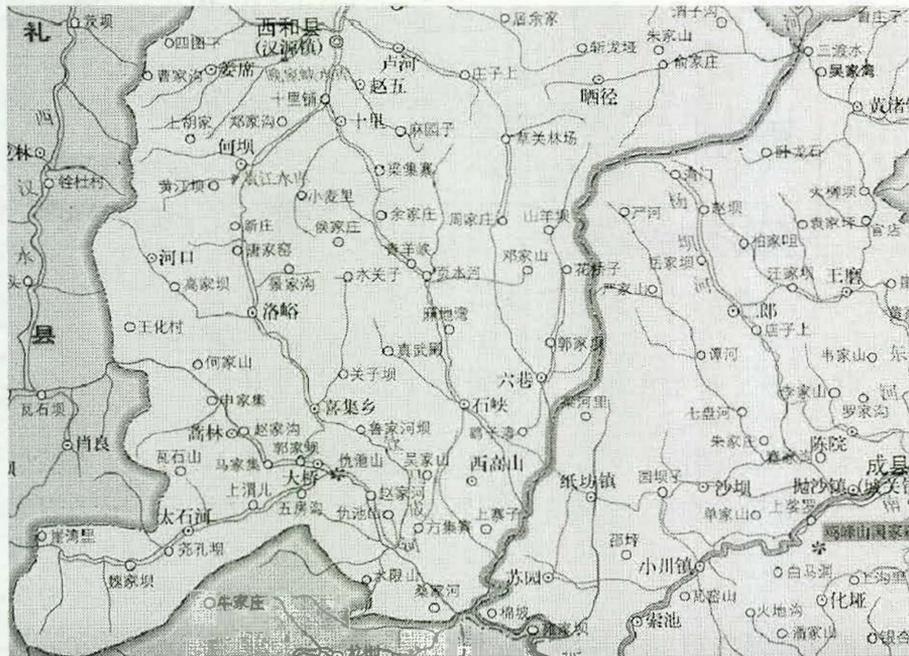
再次，为原料的收集、运送及麻纸成品的外销

运输提供了便利。以纸坊镇为中心的麻纸销售点，北至天水，西到兰州，东至汉中，又由这几个城市远销至宝鸡、西安、西宁、宁夏、四川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片地方的东面不远处有一个地方叫“纸坊镇”。

麻纸的消费区并不是在农村，更不在山野之地，而在城市：写字、糊墙，商人用来给顾客包茶、盐、调料、点心、丝绸等商品。所以，当地生产麻纸基本上全部外销。但麻纸的生产又很分散。因为民国以前麻纸制造主要是家族式组织的小作坊，只有个别大户人家雇长工、师傅组织生产，所以在当地形成不了销售点。这样，就必然会在距这几个生产地都近、且运送和外销也方便的地方形成集中的销售城镇。这便是其东面的纸坊镇形成的原因。

纸坊镇原归西和县，为纸坊区。1955年5月始将纸坊区所辖纸坊、府城、卢陈、赵坝、草坎、罗



汉、大营、宁康、下巷、建华 10 个乡划归成县<sup>⑫</sup>。1958 年将下巷、建华两乡又划归西和，但纸坊镇此后属成县辖区。

就今天所能见到的史料看陇南“纸坊镇”这个地名的产生在明代中期以前，其上限不可考。

乾隆年修《西和县志》卷一《里图村庄》于“阶州屯”下云：“自县起……东南纸坊镇一百一十里，分十二旗。”同卷《桥梁》下记“纸坊镇板桥（长建）”

<sup>⑬</sup>。同卷《市集》一节与石堡镇、长道镇等并列有“纸坊镇，府城镇”。

再前康熙年间文献中，也见到纸坊镇之地名。清代学者储大文（《存砚楼文集》卷七记从西和县城起向东南路程：“又五十里至青羊镇，又三十里至石峡关，又四十里至纸坊镇。”<sup>⑭</sup>所记里程也完全正确。

更早的是明代甘肃作家、学者胡纘宗（1480-1560，秦安人，正德三年进士）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撰《纸坊建行台记》一文。行台为地方官吏上任、返京、因公出差等路途居所。文中言：“间有郡县程不能一日致者，于其中道必建行馆”，“夫邮舍陋，民舍褻，上何以莅，下何以承？弗便有年矣。嘉靖甲辰，参知高君白之侍御朱君，乃下礼邑度其处，云礼之纸坊镇可。”<sup>⑮</sup>嘉靖甲辰为 1544 年。在成县、西和、礼县之间选择纸坊镇建行台，说

明纸坊镇在明代之时已是一个颇兴盛的一个集镇（当时属礼县管辖），地处成县县城、西和县城、阶州（武都）县城以至徽县和后建县的康县的几个大集镇之间，所以成了古代麻纸的集散地，不仅甘肃一些府县的商人，即陕西、四川、宁夏、青海等地的商人也到此处进货、订货。所以到西高山、大桥、蒿林、太石河、石峡等地收购麻纸后经销的商铺，都集中于此。

从地理位置上说，上面提到的这几个生产麻纸的地方，走这里比走西和县城、礼县县城近得多，也方便得多，不需要翻大山，只是平缓下坡或顺峡走、顺水走。所以，纸坊镇成了这些地方销售纸的中心集镇。

由于这些地方在几县交界之处，纸坊镇在历史上曾先后属成县（同谷）和礼县。大桥、石峡等地，也曾属礼县或成县。所以旧的地方志对这些地方的一些情况记载不是很清楚。但就目前所知，至

少在距今 500 多年以前,这一带麻纸的生产已有相当的规模了。由这里,沿西汉水向东南辐射,又产生了其他几个点上纸的生产。如康县大堡镇李家山造纸工艺,“史料可查的记述,早于清代康熙末年造纸技艺就传到这里。”<sup>⑥</sup>可见以纸坊镇成为销售中心的西高山、大桥、太石河、蒿林、石峡等地的造纸业的幅射作用。

## 五、由汉代纸的出土看西和麻纸的历史地位

截至目前,最早的古纸原物绝大多数是在西北地区发现的。

过去说蔡伦发明了造纸,并不是很确切。《后汉书·蔡伦传》言蔡伦至和帝即位(89)转中常侍。“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巧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元兴元年为公元 105 年。事实上大汉王朝建都长安之时已有纸。所以说,纸并不是到东汉蔡伦时才有,而是蔡伦改进了造纸的方法,使纸的质量大大提高,从此基本上形成了后代人工造纸的程序。

东汉初年班固(32—92)《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记元延元年(前 12)一事说:“篋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东汉末的应劭注:“薄小纸也。”

汉末佚名著《三辅旧事》中说:“卫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来省视,江充曰:‘上恶大鼻,当以纸蔽鼻而入。’上怒。”<sup>⑦</sup>

由以上两条史料看,西汉之时已有纸,只是面积小,也较薄。

又《后汉书·贾逵传》中言:“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裔,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各简、纸经、传各一通。”唐李贤注“简纸”曰:“竹简及纸也。”贾逵(30—101),贾逵于建初元年(76)受诏入讲北宫白虎观,其具条陈奏《左氏传》三十七事在此后不久,时间在蔡伦之前。

近大半个世纪中我国发现了不少古纸,大部

分是西汉时代的,而且全是麻纸:

1.1933 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麻质古纸,与之同时出土的有汉元帝黄龙元年(前 49)的木简。则为西汉时纸无疑。<sup>⑧</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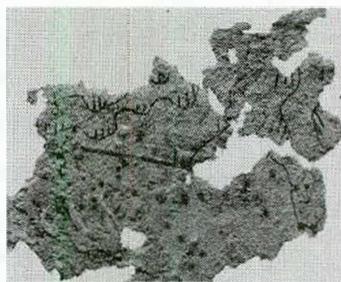
2.1942 年在居延额济纳河东岸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一张被揉成团的纸,上书写七行五十字,是一封信的残片。同时还发现有数根竹简,上面所记年代,最早汉和帝永元五年(93),最迟永元十年(98),也早于蔡伦造纸成功的年代。<sup>⑨</sup>

3.1957 年在陕西西安市东郊出土的灋陵纸。桥砖瓦厂一个古墓中发现有铜镜三面,镜的下面垫有细布,布下又垫有纸,共 88 片,其大者 10 厘米×10 厘米,小者 3 厘米×4 厘米。经科学家分析也是以大麻为主,掺有少量苕麻。这个古墓的年代不晚于西汉武帝(前 140—前 87)时期。<sup>⑩</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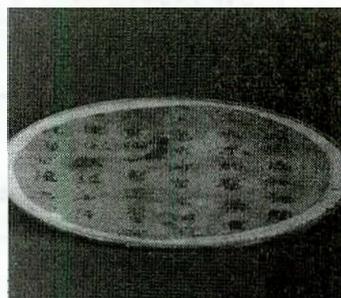
4.1973 年在居延县肩水金关出土麻纸二件。一件与宣帝甘露二年(前 52)木简共存,最大的一块 21 厘米×19 厘米,颜色白净,细薄均匀,一面较为平整,一面稍稍起毛,质地坚韧。另一件出土于汉平帝(公元 1—5)以前的地层,11.5 厘米×9 厘米大,尚可看出其中含有麻筋、线头和碎布头。<sup>⑪</sup>

5.1978 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出土汉宣帝(前 73—前 49)时的三张麻纸。<sup>⑫</sup>

6.1979 年在敦煌市马圈湾西汉烽燧遗址出土麻纸共五件八片,其中一片长 32 厘米,最宽处 20 厘米。同时出土简纪年最早为汉宣帝元康元年(前 65),最晚为甘露年间(前 53—前 50)。有 4 片与畜粪和在一起,质地较前一种细匀,同时出土简多为成帝(前 32—前 7)、哀帝(前 6—前 1)、平帝(1—



天水放马滩古纸地图



兰州伏龙坪东汉墨纸

5)时期。另有两片质地匀细,发现于烽燧倒塌土层中,应为王莽时(9—23)时遗物<sup>②</sup>。

7.1983年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古纸碎片。<sup>③</sup>

8.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出土的古纸碎片,其上绘有地图,年代在西汉初年,是目前发现时间最早的古纸,经鉴定也是麻纸。<sup>④</sup>

9.1987年在兰州市伏龙坪出土两块东汉时代的纸,是作为两枚铜镜间的衬垫,其中一块上有毛笔书写的四十来字,另一块已有霉烂,但可以看清上有墨写的六十余字。<sup>⑤</sup>

10.1991年在甘肃省敦煌甘水井汉代邮驿悬泉置遗址出土汉代麻纸10件,其中汉代文书9件,晋代文书1件。汉代文书主要是文书和药方。其中有一些是西汉武帝(前140—前87)、昭帝(前86—前74)时期的3件,纸面粗而不平,有韧性,一正面隶书“付子”,一正面隶书“熏力”,一正面隶书“细辛”二字,看来均为包药用纸。另有一张上写“□特书来□致嵩□”等。<sup>⑥</sup>

11.悬泉置遗址还出土麻纸460余件,时代从汉代武帝、昭帝、元帝、成帝至东汉初和晋代都有,与简牍同时出土。<sup>⑦</sup>

12.1992年在四川绵阳市涪城区古墓发现古纸残片。<sup>⑧</sup>

13.1998年在敦煌小方盘南侧废墟中发现西汉时麻纸残片,其中一片为书信残片。以同时出土的纪年简分析,为汉成帝绥和二年(前8)之物<sup>⑨</sup>。

此外,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麻纸碎片,上有文字墨迹。时间在东汉晚期,故不计。

以上在近八十余年中所出土古纸值得注意的有五点:

1.全是麻纸。可见最早的纸都是用麻制品的废料所加工成的。

2.十三处发现古纸,其中十一处在西北,且均在丝绸之路上。还有一处在古蜀道上。

3.其中八次发现于甘肃和甘肃内蒙交界处(其西北居延有的地方今归内蒙古自治区)。两次在西汉都城长安和长安与宝鸡之间的扶风。长安以东再无发现。

4.最可注意者,其时代最早,纸的质量较高,上面有图、有文,文献价值最大的出土于甘肃南部天水放马滩墓葬之中。纸薄而柔软,纸平整光滑,上面用细黑线条绘制有山脉、河流、道路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张地图。

5.其中几件至今可以看到上面所写文字、所绘图,说明西汉时期已经有纸,并且已用来书写,成了文化信息传播的工具。

由以上五点可以肯定:

1.在蔡伦之前已产生了纸,且都是麻纸,但大部分质地不是很好,而且手段简陋,产量很少,只用于长途携带的书信和文图资料书写上。至今尚未发现用纸抄写的书籍、奏启、文章之类。看来西汉时纸的使用并不普遍,主要书写工具还是竹简和木牍,书籍等厚重非轻易携带之物则用简牍,重要文献用帛。这些古纸或用于书信纸,或用于文书纸,或用于地图纸,均是因其轻便、易长途随身携带。

2.史书言蔡伦于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发明了造纸术,是蔡伦大大地改进了造纸的方法,开拓了造纸的原料,不仅提高了纸的质量,也使纸的成批生产有了可能。造纸并非始于蔡伦。北宋初年的苏易简(958—996)《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中说:“汉代已有幡纸代简而未通用,至和帝时,蔡伦字敬仲,用树皮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奏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谓之蔡侯纸。”<sup>⑩</sup>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3.造纸术最早是产生于西北的。因为长安以西之地如《汉书·地理志》所言“山多林木”,构树皮成了主要的原料,大量造纸成为可能;地广人稀,又多产大麻、野麻等作物。除官长与富贵之家,人多穿麻布之衣(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水、陇南一带乡下人尚多穿麻布衫,一年中大多时间穿麻鞋)。以破麻织品为原料也是广有来源。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中说:“蜀人以麻抄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藁稻稗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膏油藤为之者尤佳。”宋代之时,西和、礼县、成县正是属蜀,所以苏轼曾将他的一本书名之曰“仇池笔记”,以仇池山为蜀地名山。这反

映了陇南西汉水上游造纸用构树皮(也即楮树皮)的历史在五代以前。

关于绵阳古纸,我以为是由蜀道向南带去的陇南古纸。因为绵阳地处川北,正在由陇南入蜀的古蜀道上。至于西汉时南越王墓中发现古纸,应是由都城长安包裹铜镜之类赠品所带去,所以会出现在南越王墓中。

这里也说一下,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战国秦简中也有纸的记载。钱存训由此对古纸的起源问题提出新的论断。<sup>②</sup>我以为“纸”字为“糸”字旁,表示最初指由几个蚕吐出的丝片。东汉初年许慎的《说文解字》卷十三上有“纸”字,解释说:“纸,絮也,从糸,氏声。”许慎完成《说文解字》在公元96—100年间,较蔡伦造纸成功早二十来年。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纸”字下注云:“漉,絮策也。”“漉”下云:“于水中击絮也,……按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今用竹质木皮为纸,亦有致细密竹簾荐之是也。《通俗文》言‘方絮曰纸’。《释名》曰:‘纸,砥也,平滑如砥也。’《学记》言:‘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曰幡纸。故其字从糸。’又《说文解字》于‘絮’字解释说:‘敝绵也。’段玉裁注:‘敝者,败衣也。因以为孰(熟)之称。敝绵,孰(熟)绵也。是之谓絮。凡絮必丝为之,古无今之木绵也。’说得很明白。许慎是研究古文字的,着力于探究汉字的初义,所以会注意到先秦时文献的原写件,看其最初的写法,因而其所言纸的古义,应就先秦古纸而言。东汉服虔《通俗文》言:‘方絮曰纸。’与许慎的看法一致,其立论的基础也应一样。另外,洗絮之后也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絮片,这也不是人工作成。西汉时产生了用麻作成的最原始的人工纸,仍承其名而称为“纸”,但性质已与自然形成的丝絮片完全不同。所以,睡虎地出土薄絮与汉代人工纸是两回事。

纸最早是产生于建立了统一王朝之后的西汉时代。过去在西北不少地方有造纸作坊,甘肃武威和陕西凤翔(在宝鸡东北)历史上也是盛产纸的地方。

由于生产和从事麻纸经营者都是家道较好家庭,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这些人家中的有关文书、账

本等东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烧毁无存,所以上述陇南西汉水上游产麻纸之地已难以找到时代较早的麻纸实物。就目前所了解有记载及今存用麻纸所写东西有:

1. 明万历年(1573—1619)和清代康熙、乾隆时期的十七种皮影戏书抄本;<sup>③</sup>
2. 嘉庆二十年契约一张(西和县文联王龙收藏);
3. 道光二十年杨鼎抄《包公案·卖花》一本(杨双才收藏);
4. 道光二十三年杨鼎抄《铁牛国》(杨双才收藏);
5. 道光二十八年杨鼎抄《百花咏》一本(杨双才收藏);
6. 同治四年抄《诸杂神咒》一份;
7. 光绪元年、光绪十四年、光绪十八年、光绪十九年、光绪二十一年、光绪二十三年、光绪二十五年的地契各一份(西和县文联王龙收藏);

还有宣统元年写在麻纸上的地契、民国四年岷郡山道院锲印《大乘妙发莲花普门经》(三卷)等二十世纪前期麻纸经卷、契约、收据、存折等多件,兹不具列。

可以证明西和麻纸悠久历史的有那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石碓、铡刀和瓢床,还有被汗水渗透过、拿手的地方已被磨出明显印记的帘床、纸帘、约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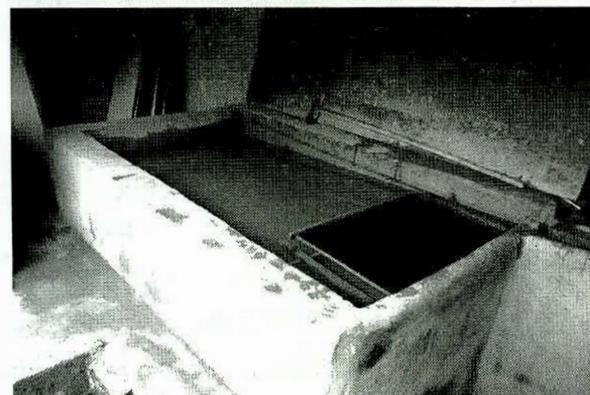
关于中国造纸术的起源,前辈学者劳干有《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sup>④</sup>一文,认为1942年内蒙古查科尔贴出土的纸为西汉字纸,当代著名自然科学史专家潘吉星先生1964年写有《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物》1964年11期),又著有《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3月)都认为造纸之术起于西汉时代。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可移易的。只是目前学界尚未能联系民间造纸的历史来进一步确定造纸术究竟起于什么地方。当然,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在两千多年之后来论此,确实有很大困难。我是在分析一百多年来出土古纸分布的基础上,从一路(丝绸之路)、一道(蜀道)、一水(西汉水)、一山(仇池山)、一城(上禄县城遗

址)、一镇(纸坊镇)的交汇、联系为着眼点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希望在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起源和流传的研究上有所补宜。不妥之处,希方家指正。

##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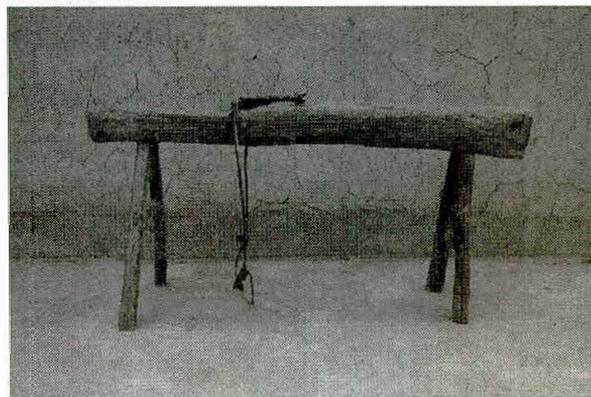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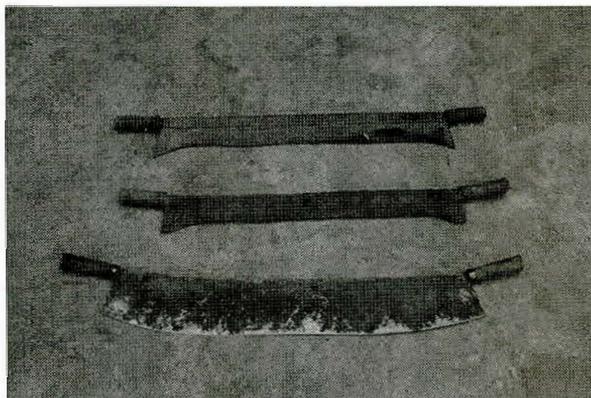
### 制作麻纸必须的设备

1.浸泡池:泡构树皮用。用砖混泥土砌筑而成,按作坊场地大小而建,一般长2米、宽1.5米、深1米。也可在河滩水中浸泡。



2.蒸构炉:由锅和炉子组成。蒸炉呈圆形,一般用石头土块混合砌筑而成,高3米,直径2米,炉底部开火膛与火门。铁锅直径3.2尺,深2尺,内盛水。蒸构树皮时,锅口沿放置木棒一排,将构树皮放置于木棒上,直到炉满为止,然后覆土盖严蒸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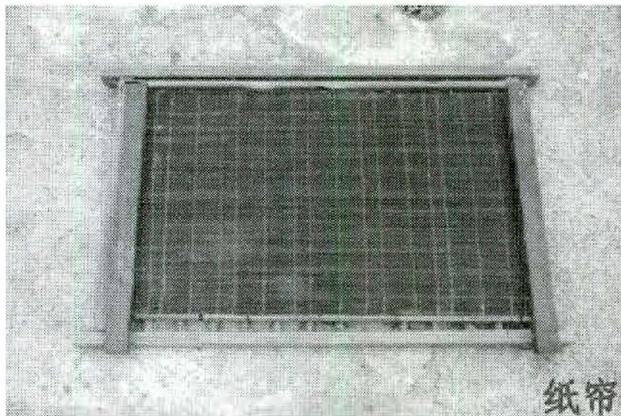
3.石灰窑:用石头、土、沙子、混合砌筑。大小外形与蒸构炉同,亦可蒸构炉兼用。其原料为当地河滩上挑选的石灰石,将石灰石放置于炉内装满,



烧1-2天,石头完全酥解后备用。用水浸泡后即成灰浆,浆构树皮用。

4.石碓:将踩踏好的构树皮打片用具。由木杠与石臼组成。木杠长约3米,直径20厘米,前端十分之一处放置一支架,一端深入石杵圆孔内固定。石杵下置花岗岩石臼。工作时,一人用脚踩在木杠末端,构树皮置于臼上,利用杠杆原理碓打。

5.铡刀与瓢床:切构树皮的组合工具。铡刀长1米,宽约25厘米,刀背两端置刀柄。切皮时,双手握柄,切碎的材料就叫做瓢。瓢床实际是一条长1.5米,高0.5米的长木凳,固定构树皮用。



6.捣浆池:捣瓢用,有石制和混凝土制两类,一般长1米,宽0.8米,深0.5米。

7.纸槽:搅拌纸浆用水池,一般长2米,宽1.5米,深1米,宽0.8米,深0.5米。旧时用石灰、沙子、土混合而成,现在一部分用混凝土浇注而成。

8.帘床、纸帘、约尺:抄纸用一套组合工具。帘床,木制,承拖纸帘用;纸帘用细竹条编成,其规格大小由纸张大小而定。约尺,木制,长约一尺,抄纸时两手卡在纸帘两边,阻挡纸浆流出。

9.压榨机:利用杠杆原理榨去湿纸水分。长约3米左右,直径15厘米,一端插在墙中圆窝,一端重约80斤石头,抄好的湿纸置于木杠中间,榨湿纸中多余的水分。

10.晒纸架:这本是用于上墙晒纸晒不下时的补充工具,今多直接用晒纸架。是一块长方形木板,放置榨去水分的一叠待晒湿纸用具,专用于较大纸张的晾晒。

(本文附录内容和西和造纸工艺部分材料及照片为西和县文化馆馆长鱼旺泉同志所提供,现

存西和清代麻纸实物照片为西和县文化馆原馆长蒲立、县文联副主席王龙同志所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华夏文明传承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平台主任,甘肃省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主席,甘肃省文化发展学会顾问。出版有《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先秦文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等专著,为《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编委和《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甘肃卷)》执行副主编。)

①《新路颂》拓片见吴景山《丝绸之路交通碑铭》,民族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1页。文末“开元”二字下表年代的几个字已湮漫不清。

②参李祖桓《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③《魏书》卷一〇一《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册第2227页;《宋书》卷九十八《氏胡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第2403页。又《仇池国志》第14页。

④《魏书·氏传》第2229页。又《仇池国志》第63页。

⑤《资治通鉴》卷123《宋纪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册第3861页。又《仇池国志》第73页。

⑥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

61—62页。《中国历史地图集》前5册中只此一处标出了上禄,并成州州治,其他各册皆未标出。

⑦ 张永权《康县大堡镇李家山手工制造构树皮纸工艺探访》,《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6期;孟小为《蔡伦造纸活化石——陇南麻纸》,《陇南市文联办《中国乞巧》2014年第1期。

⑧ 因历史上成纪之地多次迁徙,非止一处。人们已经知道的是成纪汉代时治今静宁,唐初移治敬亲川(地在今秦安县城西北三十里),北宋时移治上邽(即今天水市秦州区)。西高山有姓成的人家从古聚居,则为成纪成邑的时间应更早。

⑨ 如胡凤钰(1968年出生,初中毕业)有记载从祖爷胡开林、太爷胡起涛以来就一直造麻纸。尹涛(1958年出生,高中毕业),从太爷尹举武以来就从事麻纸手工造纸工作。刘柏芳(1990年出生,初中毕业),从太爷刘志银起就从事麻纸手工造纸工作。尹芳东(1991年出生,初中毕业),从太爷尹生连以来就从事麻纸手工造纸工作。

⑩ 刘仁庆著《中国古纸谱》第一节“中国的古纸与手工纸”,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版。

⑪ 有的书引董巴《大汉輿服志》,将“穀”写作“穀”(如陈登原《国史旧闻》第1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449页),误。还有的写作“穀”(车穀之“穀”,如刘仁庆《中国古纸谱》第57页),亦误。

⑫ 参《西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77页。

⑬ 乾隆年修《西和县志》卷一《桥梁》在“白水桥”和“盐官镇桥”后注:“北城外,冬成夏拆。”则“长建”指非夏季水涨而拆除、初冬重修者。

⑭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别集类》。储大文,江南宜兴人,康熙辛丑进士。一生究心于地理之学,其著也作《存研楼文集》。文中青羊镇即今青羊峡。

⑮ 见[清]费廷珍纂修《直隶秦州新志》卷一《羌文》,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⑯ 张永权《康县太堡镇李家山手工制造构树皮纸工艺探访》,《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6期;孟小为《蔡伦造纸活化石——陇南麻纸》,《中国乞巧》2014年第1期。

⑰ 《北堂书钞》卷一〇四引。原书已佚。见清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本。作于汉魏之际的《三辅黄图》一书已引及之,则其书产生至迟在汉末。

⑱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潘吉星,《关于造纸术的起源》,《文物》1973年第9期;马骥,《简论丝路沿线出土的汉代古纸》,《文博》1991年第1期。

⑲ 潘吉星《谈早滩坡东汉墓出土的麻纸》,《文物》1977年第1期。

⑳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㉑ 《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㉒ 罗西章《西陲西扶风中颜村发现西汉窖藏和古纸》,《文物》1979年第9期。

㉓ 《敦煌马圈滩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㉔ 《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

㉕ 《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㉖ 叶削坚《近期甘肃境内关于纸的两次考古发现》,《图书与情报》,1994年第2期。朱玫、辛水,《纸的改良与书的产生——从兰州伏龙坪东汉墓出土的墨书纸谈起》,《兰州学刊》,1995年第2期。

㉗ 《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㉘ 同上。

㉙ 杨惠福,王元林《也谈两汉古纸的发现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㉚ 以上材料除所注出处外,论述中据造纸史话编写组《造纸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版),胡惟佳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技术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汪受宽《甘肃通史·秦汉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有关内容。

㉛ 见《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台湾影印本第843册。

㉜ 钱存训《纸的起源新证:试论战国秦简中的纸字》,《文献》2002年第1期。 (转12页)

# 横贯西北的汉代中西交通

刘光华

与张骞同时的司马迁,称张骞通西域是“凿空”,就是指张骞开通了“险厄,本无道路”的中西交通。我们要说的西汉中西交通,不应局限于张骞所走过的道路。第一,张骞通西域之前很早,中亚各国与中国内地之间就有了交往;第二,张骞去西域的道路,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道路,但不是全部;第三,张骞的行程虽仅及中亚,但他却了解到了一些中亚以西国家的情况,扩大了汉朝对世界的认识。所以我们的视野也要适当扩大一些。<sup>①</sup>

## 一、横贯西北的中西通道

古代中西陆路交通的始点,西汉在长安,东汉在洛阳。从东向西,大致可分为4段,兹分别叙述于下。

### 1. 关陇段

关陇段起于长安,包括关中、陇右,止于黄河沿岸。从长安向西有2条路,一是溯泾水而上至安定郡,可称作关陇段北道;一是溯渭水而上至陇西郡,可称作关陇段南道。

关陇段北道上世纪70年代新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已整理、出版了破城子所出简牍《居延新简》;同时,上世纪90年代所出敦煌悬泉简,也发表了《简报》《释文选》和出版了《敦煌悬泉简释粹》<sup>②</sup>,都提供了关陇段和河西段的新材料。《居延新简》有简文曰: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  
茂陵至●置卅五里  
●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  
(新第一组)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乌氏至泾阳五十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新第二组)<sup>③</sup>

简文中的长安,即西汉首都长安城,茂陵、好止为汉县名。“茂陵”为陵县,有汉武帝陵,在今陕西兴平县。“好止”,正写作好峙,止为峙之简写,在今乾县东。“●置”与“义置”“平林置”之“置”,《史记·文帝纪·索隐》曰:“按《广雅》云‘置,驿也’。《续汉书》云‘驿马三十里一置。’故乐产亦云:‘传,置一也,言传乘者以传次受名,乘置者以马取匹。……’如淳云‘律,四马高足为传置,四马中足为驰置,下足为乘置,一马二马为輶置,如置急者乘一马,曰乘也’。”驿站称置者,如敦煌“悬泉置”,出汉简数万枚之多。由好峙西至义置,新第一组简文结束。该组简共5个地名,计225汉里,不足现今之100公

里。此后简文缺。月氏至乌氏为新第二组简文,其中月氏、乌氏、泾阳、高平均为汉县名,属安定郡,郡治高平。诸县的方位,按简文顺序为从东向西。除泾阳、高平外,月氏、乌氏2县的方位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22~23图所标并不一致。《地图集》标乌氏、月氏于泾阳、高平间,而简文明确月氏、乌氏在泾阳之东。高平在今宁夏固原市。按简文,由今固原向东推至月氏,应为240汉里,最多折合100公里,则东过今平凉市不远<sup>④</sup>,若与上一组简衔接,其间短缺近200公里,应缺两组8个驿站,惜已无法知晓了。从高平向西,越陇山北段可抵祖厉县。汉武帝元鼎五年“幸雍,祀五畤,遂逾陇,登崆峒,西临祖厉河而还”<sup>⑤</sup>,就是走这条沿泾河而上逾陇到祖厉河的。祖厉县在祖厉河畔。祖厉河即今黄河流经祖厉县的一段。越过祖厉河即达黄河西岸的媪围。惜高平经祖厉的黄河以东近200公里一段,简文缺佚。关陇段北道止于黄河东岸。

关陇段南道 从长安溯渭水而上,大致在右扶风虢县(今陕西宝鸡县)西再溯千水西北上,经汧县(今陇县)越陇阪,可至汉天水郡治平襄。从汧县越陇阪,就到了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县)。从陇县至平襄间,向南或沿清水,或沿葫芦河,均可至渭水北岸,再溯渭水而上,经望垣(或上邽)、冀至襄武,可与从平襄南下的路会合,再溯渭水上游而达洮河东岸的陇西郡治狄道(今临洮),从狄道经大夏、枹罕可达黄河南岸。也可从平襄西行,经勇士、榆中可达金城县,抵黄河南岸。

以上关陇段两道之间有支路相连,著名的如汉武帝时从汧以北之回中伐山开道,以通高平、萧关的回中道;东汉初年光武帝伐隗嚣,走的是从高平至上邽的道路,或为沿今葫芦河南下至上邽;另外,从狄道北上翻越今马衔山,亦可抵榆中、金城县。

## 2.河西段

以黄河为界,其西为河西段。河西段从东向西为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5郡,一字排开。沿途各驿站,有赖于居延新简、敦煌悬泉简而大致清楚。如上引《居延新简》的第三、四组简,即属于河西段的驿站记录。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  
居延置至●里九十里  
●里至●次九十里  
●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新第三组)

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  
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  
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  
屋兰至氐池五十里  
(新第四组)

此外,敦煌悬泉简《释文选》或《释粹》中亦有一支驿站简,对上引居延新简有补充作用,也引述于此,以供分析之用。

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  
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悬第一组)

氐池去鱧得五十四里  
鱧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  
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悬第二组)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  
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  
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悬第三组)

从上引居延、悬泉简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可知,河西段东部不止一道,而在西部却没有支道。

这里兹以武威郡、张掖郡为东段,酒泉郡、敦煌郡为西段。河西段东段又可分为北道、中道、南道。

东段北道,上引新第三组简始于媪围,止于小张掖,俱属武威郡。媪围县(今景泰县芦阳镇附近)东隔以黄河,与安定郡鹑阴县(今靖远县)为邻,是连接关陇段北道的河西第一站。●次即●次,媪围、●次间经过2个90里的居延置、●里而至小张掖。小张掖即张掖县,相对于张掖郡故称小张掖。这一组简是记关陇段北道渡黄河至媪围进入

河西,沿腾格里沙漠南缘可至姑臧的里程简。

东段中道,居延新简无载,悬泉简第一组于今乌鞘岭以南无载,有乌鞘岭以北一段。仓松即苍松县,西汉苍松县东汉改称仓松县;小张掖即张掖县,与姑臧县俱属武威郡。南与仓松县相接的,一是从金城县渡河,溯今庄浪河而上,经枝阳至令居,从令居越翻乌鞘岭至仓松;一是从关陇段南道之狄道至枹罕渡过黄河,再经允吾、浩亶至令居,翻乌鞘岭至仓松。从仓松经鸾鸟至小张掖,与东段北道汇合。从小张掖西行,经姑臧可抵显美县,就进入了张掖郡,悬泉第一组简文结束。悬泉第一组简之显美与第二组简之氏池间有缺佚,可以居延新简第四组简补之,但仍缺显美至删丹一段。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22~23图,所缺者为番禾、骊轩。居延新简第四组所记之删丹、日勒、屋兰、氏池,均为张掖郡属县。悬泉简第二组简文记氏池至张掖郡治麟得为54里。据居延新简和悬泉简,从东向西所经张掖郡诸县,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22~23图所示张掖郡从东向西诸县为日勒、删丹、屋兰、麟得,而氏池在删丹、屋兰之南约50公里的祁连山下,其方位有较大差异,《地图集》所标虽然有据,但未必正确,当以居延新简和悬泉简所记为是。

东段南道,关陇段南道从狄道至枹罕即达黄河岸边。渡黄河后经允吾溯湟水而上,再北折翻越祁连山,出今扁都口(古称大斗拔谷者)即至麟得,与中道汇合。河西道东段结束。

河西段西段从麟得西经昭武出张掖郡,就进入了酒泉郡的表是县,开始了河西道西段。但表是至第四组悬泉简开头的玉门,其间酒泉郡的县名、里距缺载。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22~23图所标,所缺者应为乐涇、绥弥、禄福、天●4县。天●以西之玉门、沙头、乾齐县,亦属酒泉郡。渊泉县属敦煌郡,其西的县名缺,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22~23图所标,可补冥安、广至、效谷、敦煌、龙勒,出龙勒县境之玉门、阳关,从地域上说便进入了西域地区。

河西走廊之北是蒙古高原。从酒泉郡会水县沿弱水(今额济纳河)而下,是走廊通往蒙古高原的大路,汉将李陵就是由这条道路“出遮虏障”,至漠

北浚稽山与匈奴单于大战的。该路使中西交通的河西段与蒙古高原的草原道相通。河西走廊之南为祁连山,祁连山之南乃青藏高原北部地区。上述从枹罕过黄河进入湟中地区,除从浩亶至令居,可与河西段东段中道,或从湟中北越祁连山与河西道相连外,从湟中还可继续向西,经柴达木盆地边缘可抵若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东返时,“欲从羌中归”。其时,匈奴占有河西,他就是想从这条羌人通行的道路,避开匈奴东归的。《汉书·西域传》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若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从西域南道东头经若羌(今青新两省间之嘎斯地区)翻越阿尔金山,可至今青海茫崖,向东再经今柴达木盆地边缘、青海湖岸可至湟中。张骞所以想走这条路,是因为他在西域时得到过有关的信息,说明羌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路的。不过目前我们尚无资料证明它。

### 3.西域段

《汉书·西域传》记载: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玉门、阳关以西,葱岭以东为汉代的西域。“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从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这就是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绿洲道。

据上引《西域传》文,北道当出玉门关,“从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然玉门关至车师前王庭间的国家和艰险道路,引文未言。据“楼兰国”条:“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一岁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则出玉门关必经楼兰国才能到达姑师(即车师前王庭)。据研究,楼兰国都是今罗布泊西北之古城,其地出土之简牍上有 kroraim 即其对音。昭帝时楼兰国改称鄯善,迁都伊循城。而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的罗布泊以东的白龙堆,颜师古注引孟康的话说:“龙堆行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余,皆东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汉书·匈奴传》称其为西域交通之“厄”,即最艰险的路段。其地乏水草,因盐碱风蚀状貌奇特,又因流沙堆积,绵延起伏,婉曲如龙,故称龙堆。出玉门、阳关经白龙堆至楼

兰,为西域南北2道共同要走的一段路,至楼兰后才分为了南北2道。

西域北道从楼兰西北上,到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再沿天山南麓西去。所经西域国家有焉耆、尉犁(今焉耆南)、乌垒(今轮台东)、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尉头(今阿合奇西)、疏勒(今喀什)等。

西域南道从楼兰西南行至伊循城,西经喀喇昆仑山北麓的且末、精绝(今民丰北)、杆弥(今于田)、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等。最后,南、北道交汇于疏勒。

除西域南北道外,天山以北还有从蒙古高原穿越阿尔泰山,经准噶尔盆地边缘西去的道路,可至乌孙,这是当时匈奴骑兵经常往来的路。这条路还可从车师后王庭(今吉木萨尔)穿越天山至车师前王庭;或从乌孙穿越天山至温宿、姑墨,与西域北道相连。《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部高昌壁与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500汉里等于200公里左右。这是车师前、后部之间穿越天山的通道。关于乌孙与西域北道的交通,《汉书·陈汤传》记汉元帝建昭三年,汉军攻打郅支的兵力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至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此其一;成帝河平中,乌孙贵人日贰杀小昆弥拊离,逃亡于康居。汉朝为讨伐日贰,“徙己校屯姑墨,欲候便讨焉。”<sup>⑥</sup>据《大唐西域记》记载:“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卷一)“跋禄迦”即姑墨;“大清池”即伊塞克湖,在乌孙赤谷城北;“凌山”,据周连宽先生考证,为今“粟克托尔一路所经的哈喇该尔山隘。”<sup>⑦</sup>这支讨伐部队驻地姑墨,距温宿“二百七十”汉里,与乌孙赤谷城隔以天山,其间有道可穿越。

#### 4.葱岭及其以西段

西汉西域都护所辖,大致以葱岭为界。但李广利伐大宛后,葱岭以西的大宛国,归服了汉朝,也属都护。汉与除大宛之外的葱岭以西国家的交往,是当时的国际交往。其道路如下。

从疏勒通大宛的道路 疏勒“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大宛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

干纳盆地。李广利伐大宛,“分为数军,从南北道。”这是进军大宛的南北道。北道或为上述从姑墨、温须北上穿越天山,经乌孙至大宛的道路;南道或为从疏勒西北上,穿越今吐尔尕特山口至今费尔干纳的道路,学者们称之为费尔干纳之路。大宛西北是康居国,西南是大月氏<sup>⑧</sup>,大月氏国之西为安息国。

从莎车通大夏国的道路 西域南道至莎车,可经疏勒西北上,沿费尔干纳之路至大宛,亦可从莎车西行,走翻越葱岭至大夏的道路。从《汉书》记载来看,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是先抵大宛,后依次抵康居、大月氏、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sup>⑨</sup>,归途或即从大夏翻越葱岭而还。若此说不误,其归程当与唐朝玄奘走着同一条路。该路从东向西,是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一带)、无雷(今塔什库尔干东)而到妫水(今阿姆河)以南的大夏国(今阿富汗),亦即从今莎车沿叶尔羌河支流赛里河至塔什库尔干(此为蒲犁段),再沿河谷南下至明铁盖,过山口顺瓦罕河而下,瓦罕河汇入喷赤河后经今伊什卡希姆(以上为无雷段,伊什卡希姆即唐代的护蜜或达悉摩铁帝),并继续向西,可达大夏国都蓝氏城(今阿富汗巴尔赫)。这条路今人称之为“瓦罕之路”。

从西域南道通罽宾的道路 从南道的皮山(今皮山县一带)国西南行,穿越喀喇昆仑山,亦即经西夜(今叶城县阿克河河谷)、子合(今克什米尔巴勒提斯坦)等国至罽宾(今克什米尔)。该路十分险峻,翻越喀喇昆仑山时,要经“不属汉之国四五”,“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渊,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坠,势不得相收视。”“县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sup>⑩</sup>从这条路向南可通身毒(今印度),向西可通乌弋山离(今锡斯坦)。

## 二、中西交通联系的葱岭以西国家

如上所述,东起长安,西逾葱岭的中西交通,是一条漫长的连接西汉与其以西国家的道路。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以西域国家与汉朝的关系来

分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西域都护“总护”的葱岭以西的西域南北道国家;一类是西域都护“督察”的外国。而中西交通连接的汉朝以西国家,乃是指西域都护“督察”的康居、大夏、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等外国。下面兹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记载,对这些“外国”作些简要介绍。

### 1. 罽宾国

罽宾国在今喀布尔河下游和克什米尔一带。其“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国都为循鲜城(今查萨达),基本居民为塞人。其国物产丰富。《汉书·西域传》记载:

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秣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居罽宾。……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蒲桃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室。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玕、珊瑚、虎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

汉武帝时开始,罽宾就与汉朝建立了联系。宣元之际,汉朝一次派去罽宾的使团即达70余人;而罽宾来汉的使团中,“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由于道路的艰险,罽宾为了赏赐、贾市,几年与汉朝通使一次。

### 2. 乌弋山离国

罽宾之西南为乌弋山离国,位于今阿富汗与伊朗间之锡斯坦。原为安息国的东部地区,前127年塞人入侵安息,杀安息王,占据了东部的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西亚2郡,并于前87年建立了乌弋山离国。《西域传》记载:

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桃、西与犁鞞、条支接。……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

引文说“汉使希至”,说明双方尚有使者往还。

### 3. 安息国

从乌弋山离“转北而东得安息”。安息国原属希腊塞琉古王国,公元前247年建国,国名源于创建者阿尔萨息一世,司马迁音译作安息,位于里海东南的帕提亚(相当于现今之伊朗东北部和土库曼斯坦南部一带),后来向西扩张,领土到达两河流域,向东攻占了木鹿绿洲。国都随疆土的扩展而不断迁移,《汉书》记载其国都番兜城,在今土库曼斯坦首府阿什拉巴德西南15公里处之尼萨城。居民主要为塞人。据《西域传》记载:

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鞞人献于汉,天子大悦。安息东则大月氏。

安息国“其人……善市贾,争分铢”<sup>①</sup>，“商贾车船行旁国”，说明其国商业、对外贸易都很繁荣。与汉朝的关系，如上引文始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时。安息国处于中西交通要冲，直接垄断着当时的中西贸易。其时，欧亚大陆并存着3个强大国家，东方是中国的汉朝，势力直达中亚；中间是安息；西方是欧洲的罗马，已侵入西亚。战国时期希腊人就称中国为丝国。汉朝通西域后，中亚及西亚各地时兴衣着丝绸，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国的王侯后妃更是如此。在公元前一世纪，安息与罗马之间发生过数次战争，其中前53年的卡雷战役、前36年安东率军入侵安息的战役，罗马均遭失败。因之，中亚贸易被安息人控制着，中国的丝绸、铁器由此西运西方；西方的珠宝、香药、象牙、犀角、毛皮也由此东运汉朝。

### 4. 大夏·大月氏国

从疏勒向西南逾葱岭，经瓦罕之路可抵大夏。大夏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拜套山脉与阿富汗兴都库斯山之间。大夏人原居楚河、伊犁河流域，是塞人的一部，所以这里被称为塞人故地。汉文帝时大月氏人西迁，攻占塞人故地，大夏之一部分遂逾锡尔河南下，攻占了希腊人建立的巴克特

利亚国,建国大夏,都阿姆河以南的蓝氏城(今阿富汗巴尔赫东)。《大宛列传》记载: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氏城,有市贩贾诸物。

《西域传》又补充记曰:

大夏……有五翁侯,一曰休密翁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翁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翁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胘顿翁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翁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翁侯,皆属大月氏。

前130年,大月氏再次西迁,从伊犁河、楚河流域进入巴克特里亚,臣服了大夏。初建都于阿姆河北岸的且蜜(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sup>⑩</sup>,后又越阿姆河,迁都于蓝氏城(今阿富汗巴里黑),其经济由原来的游牧(行国)转向了农业,并吸收当地的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张骞联络大月氏时,大月氏尚都于阿姆河以北;骞还,越阿姆河到了大夏。张骞联络乌孙时,曾派副使到大月氏、大夏。大月氏、大夏也遣使随汉使到了长安,“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sup>⑪</sup>

#### 5.身毒国

身毒国即天竺国,现今之印度,《西域传》无传,其情况班固叙述于《张骞传》中。传言张骞联络大月氏到了大夏国,“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张骞第一次出使期间,在大夏国见到蜀地生产的邛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来自身毒国;而大夏商人又从身毒国贩到大夏。因此他推知,从西南夷地区可以到达身毒国以通西域。到元狩初年,张骞又向汉武帝进言,从西南夷通身毒、大夏国: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

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于是,汉武帝遂令王然于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sup>⑫</sup>通西南夷道受阻,武帝于是决定从河西走廊继续通西域。

#### 6.大宛国

从疏勒西北行,翻越葱岭可抵达大宛国。匈奴逐大月氏出河西,大月氏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人一部分渡锡尔河南下,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了大宛国,都贵山城(今列宁纳巴德)。《西域传》记载:

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三万,胜兵六万人。副王、辅国王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闾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张骞第一次去西域就到了大宛,大宛王还为骞“发译导,抵康居”;张骞第二次去西域,曾遣副使抵大宛,大宛王遂遣使随汉使来汉朝奉献。汉武帝知道大宛贰师城出好马,马汗血,派使者求马,但大宛“匿不肯予汉使”;武帝又遣使“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王仍不予,“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王又令东边郁成王遮“杀汉使,取其财物。天子大怒”,于是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两次伐宛,终于使大宛屈服,“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而还。”<sup>⑬</sup>此后,“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桃、苜蓿种归。”汗血马、葡萄、苜蓿都是从大宛引进汉朝的。大宛不属于“外国”,受西域都护管辖。

#### 7.乌孙国

乌孙国在今伊犁河、楚河流域。从西域北道翻越天山,或从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沿准噶尔盆地边缘向西,均可抵达乌孙国。乌孙与月氏原居河西走廊,月氏西迁,乌孙一度归降匈奴。后匈奴又支持乌孙攻打西迁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月氏,月氏败走,乌孙遂占据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建立了乌孙国,都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及纳伦河上游地区)。《西域传》记载:

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羈属,不肯往朝会。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曾向汉武帝报告了乌孙原居河西走廊以及乌孙西迁后对匈奴“不肯往朝会”的政治态度,建议招乌孙东居河西故地,与之共同抗击匈奴。建议得到汉武帝支持,张骞又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仍未成功,但汉朝却与乌孙建立了联系。不久,汉武帝又嫁公主给乌孙昆莫,乌孙以马千匹为聘,汉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宣帝初,双方又建立了对抗匈奴的军事联盟,并取得了攻匈战争的胜利;后乌孙终于“叛绝匈奴”,其昆弥、大吏、大禄、大监均佩汉朝印绶,成为汉朝在西域的重要支持力量,不属于“外国”。

#### 8. 康居国

康居国位于锡尔河流域,并占有河中的粟特地区,都卑闾城,其位置一说在今锡尔河北岸厥斯斯坦一带<sup>①</sup>,一说在今吉尔吉斯山西段北麓古地名千泉一带<sup>②</sup>,居民为塞人,以游牧为生。《西域传》记载:

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闾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乐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羈事匈奴。

张骞第一次出使时,从大宛经康居而抵大月氏。张骞联络乌孙时,曾派遣副使至康居,康居王亦派遣使者随汉使来长安朝献。康居经常插手乌孙内部事务,支持动乱;还留居西逃的匈奴郅支单于于都赖水(今塔拉斯河)上,后被甘延寿、陈汤率兵讨平,安定了西域。康居“自以绝远,独骄嫚”汉使,“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己,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

省以夸旁国。”但却派遣侍子入质汉朝,目的是“欲贾市为好”,所以西域都护郭舜建议汉成帝:“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汉成帝以康居“新通,重致远人,终羈縻而未绝。”

#### 9. 奄蔡国

奄蔡国在康居西北 2000 里,与康居同俗,临大泽,居民为塞人,游牧于里海、咸海之北的乌拉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控弦者十余万人,与康居同俗。”但记载缺略,其他情况不详。

#### 10. 条支·犁靬国

这是两个希腊化国家。前 324 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建立的马其顿帝国瓦解为塞琉古、托勒密、安提柯三个王国。与条支、犁靬有关的是塞琉古、托勒密王国。

塞琉古王国是亚历山大大帝部将塞琉古所建。极盛时期,其统治的地区包括小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印度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前 304 年,南亚新兴的孔雀王朝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前 3 世纪中叶,帕提亚(安息)和巴克特里亚(大夏)先后独立;前 190 年,罗马并吞了小亚。张骞在西域传闻到的条支,即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安提柯省的音译。《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王西母,而未曾见。张骞传闻到条支时,安息向西已攻占了安提柯省,所以,条支所“临”的西海即地中海,位于地中海西北隅。“有大鸟卵如瓮”,大鸟即鸵鸟,栖息于叙利亚沙漠中,卵为其特产;“国善眩”,《史记集解》引“应劭曰:眩,相诈惑。”《史记正义》引“颜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是说条支擅长魔术;往往有小君长,当指王国境内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希腊化城市的市政长官。<sup>③</sup>条支所以臣属于安息,是因为它两度入侵安息均遭到失败的缘故。

犁靬指大秦即罗马帝国,一般认为是埃及托勒密王国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缩译。<sup>④</sup>由于《史记》《汉书》对犁靬均无具体记载,其情况不详。所知者仅安息王曾向汉武帝进献犁靬眩人,说明有了犁靬国,其魔术也著名于当时。《史记》《汉书》在

叙述犁靽方位上是不一致的。《大宛列传》记载:安息“北有奄蔡、犁靽”;《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西与犁靽、条支接”。这种不一致,又会使人联想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中,在中亚以西、以南建立过许多亚历山大利亚城,所以司马迁所记犁靽是否指埃及,倒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sup>④</sup>有学者主张武帝时的犁靽,在今波斯湾北岸的古拉希坎特附近,该地有普林尼称之为阿曼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城<sup>⑤</sup>,可备一说。

司马迁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髭,善市贾,争分铢。”这些国家均为塞种人。塞种有许多部,语言稍有差别,或者属于方言之不同,故大体上“相知言”。他们“善市贾,争分铢”,正好充当了中西交通线上的中间商。

### 三、汉朝与葱岭以西国家商贸往来

#### 1. 西交通大道上的中外使团

自张骞“凿空”后,新开通的中西交通要道上的中外使团,频频往返。关于西汉王朝的使团出使西域36国,姑且不谈,而出使葱岭和伊犁河流域以西者,《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犁靽、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赏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上引诸国中,汉使是否到了条支,《史记索隐》持怀疑态度:“然汉使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汉使是否到过奄蔡,也是值得怀疑的。至于犁靽,《大宛列传》载其在安息北,《西域传》载其在乌弋山离西,这种歧异,其实和条支一样都是传闻,决非汉使足迹所至。而康居、乌弋山离、大月氏、罽宾,文献记载都是汉使所至之国。

关于派遣汉使的频繁程度,由于武帝要取得大宛汗血马,司马迁以“使者相望于道”概括;而其“诸使外国”的使团,“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这都是太初中伐大宛以前的情况。其后“益习而衰少焉”,虽然达不到“使者相望于道”的程度,但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这些使团都是远距

离成行,一次往返长者经八九年,近者也要“数岁”,或许是因为使团庞大的缘故吧。以张骞统领的第二次去乌孙的使团为例,“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牛羊行进的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而滞留于途中甚至目的地者。

关于西方国家的使团,《汉书·张骞传》记载:

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乌孙发译导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

《汉书·西域传》记载:

罽宾王乌头劳之子曾“遣使奉献”;成帝时罽宾王“复遣使献。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

安息王“因发使随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靽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

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贰师既斩宛王,更立贵人素遇汉者,名昧蔡为宛王。后岁余,宛贵人……相与共杀昧蔡,立毋寡弟蝉封为宛王,遣子入侍,质于汉。又汉使乌孙,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元康二年,昆弥及太子(即元贵靡)、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少主!

以上中外使团在往返途中,汉使的做法恐怕带有普遍性。以张骞为例,他出使乌孙的使团有300人之众。他们在某些国家或地区,“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故必市乃得所欲”,在食宿补给地必需进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取所需的交换。汉使携带的丝织品和西方各使团所带的土特产,是各食宿地的抢手货;同时也以金银、货币(如西域各地发现的五铢钱)购买生活必需品,这

也是一种经常性活动。1965年和1973年,先后在长安城内和扶凤县姜源村出土外国铭文铅饼15枚。据考释,这些铭文是传写失真的希腊字母,应是安息“法拉克麦”钱币上的铭文。据推测,这些铅饼可能是西域商人带来的,时间在西汉晚期,

是西汉时中西之间商业及友好交往的实物证据。<sup>②</sup>也就是说,中西使团在往返途中,为了取得生活所需品,必须将自己携带的部分礼品、赏赐物,或者金银,拿出来交易,充当着商团的角色。

## 2. 外使团中的商贾

由于张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官居大行,位列九卿,于是,“其后从吏卒皆争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sup>③</sup>汉武帝认为,出使“绝远”之国,并非一般人所敢想的,所以他总是:“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这些曾随张骞出使西域的“从吏卒”,地位虽低下,但却有出使经验和与沿途各族部众打交道的能力,对西域国家有所了解。为了出使,他们所言的“奇怪”,或者指出使国家的物产,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及其加工品等,难免夸大;所言的“利害”,或指出使国之人口多少,武力强弱及其政治态度,难免不缩小,目的就是引起武帝的兴趣,对他有吸引力,所以“妄言”者大有人在。到了出使途中,这些“妄言无行之徒”“来还不能毋侵币物”。所谓“币物”,乃泛指赠送外国的礼品,包括丝织品和珠玉黄金等;“侵盗币物”,即将所携带的赠送出使国国君、大臣的礼物私吞,沿途市买,收入装入私囊。这种私吞后市卖的行为,便具有了私人交易的性质。

据《大宛列传》记载,中亚及其以西一些国家,如安息“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大月氏,“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大夏“有市贩贾诸物”;“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以上记载,说明大宛以西诸国商品货币关系是发展的。它们派往汉朝的使团,或由商贾操纵,名为朝献,实乃为了贾市。《汉书·西域传》有如下两条记载:

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

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也未绝。

(宣元之时,汉朝与罽宾虽有使者往返,但时有矛盾。)成帝时,(罽宾)复遣使贡献谢罪,汉欲遣使者送其使回国,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前罽宾王阴来赴本汉所立,后卒叛逆。……(罽宾)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嫚,终不可怀服。……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悬度,恐失实见欺。……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长久计也。……”于是凤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云。

这虽是两个国家的例子,但绝不止于这两个国家。因为乌孙以西各国,其人“善市贾,争分铢”,商人当然不会放弃加入使团便可以官方身分通行无阻的机会,何况其一出于西域都护之口,其一出于成帝之舅辅政的大将军王凤属吏,“能直言士”杜钦之口,其可信性不容怀疑。

以上所述,是说中外使团中有“妄言无行之徒”,借出使之机“侵盗币物”,并于沿途市卖中饱私囊;或者“善市贾,争分铢”之徒混入使团,从事长途市卖。从罽宾的情况看,汉朝在其使团回国时还要派员护送。“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这种百余人的护送队伍随行,其安全又得到了保障,汉朝对其之爱护有加,有目共睹。

中西交通道路上是否有个体商贾,那是不容怀疑的。据记载,东汉光武帝去世后,长安的“西域贾胡,供起帷帐设祭,京兆尹车过帐,贾牵车令拜”。<sup>④</sup>

汉光武帝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前,汉朝与西域关系断绝,其时长安的“西域贾胡”,当系西汉末年滞留的个体商贾。此外,我们可否作这样两种推测:第一,私人商贾必须以结帮方式方可成行;第二,私人商帮不可能长途的从西到东往还,因为从西到东往还不仅不很安全,而且费时费日,路途

又十分艰险。所以估计私人商帮大多为短途转运贩卖。

中西交通大多是双向的、直接的,当然也不排除简接的交流。西汉时代,汉朝与安息之间国家交流是直接的;但汉朝与安息以西国家的交流,由于某些大国的从中阻挠,就可能是简接的,需要居间者集散商品,转手贸易。

### 3. 于中外国家之间交流的物品

上引《汉书·西域传》记罽宾国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櫨、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等。乌弋山离国,“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此外还有桃拔、狮子、犀牛,“有大鸟,卵如瓮”,国人“善眩”。安息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山离、罽宾同”;此外还有大马爵。大月氏出一封橐驼、马。大宛多善马,马汗血,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耆苜蓿。汉使采蒲陶、苜蓿种归。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乌秣国出小步马,有驴无牛。“武帝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即玳瑁)、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远方异物,四面而至。”

以上葱岭以西国家出产的物品并不都是商品,但却是汉朝所没有的,是他们向西汉皇帝敬献的贡品。退一步说,其中不少物品即或是商品,在长安等地市场上可以买到,但现今我们已无法知道其价格,也绝非一般平民所能问津。此后的文献中,记载张骞从西域带回了涂林安石榴、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葵、胡蒜、酒杯藤等。当然,也可能还有葱岭以西国家的某些物品传入中国而文献失载的。

从汉朝输送到葱岭以西国家物品,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及汉使至,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

汉武帝即位,令(张)骞赍金币往(乌)孙。《乌孙传》凡三见“金币”。

汉元封中,(武帝)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乌孙王)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赐送甚盛。……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武帝)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

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乌孙王,赐金二十斤,采缯。

元康元年。龟兹王娶乌孙公主为夫人,遂来朝贺。汉宣帝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且留居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乐汉家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

从汉朝传入西域的物品有金币、丝绸织物、衣物、建筑技术、乘舆、礼仪、旗鼓、音乐、中医药疗伤;另外,汉朝还有两项技术传入中亚。一为冶铁技术。公元前29年,陈汤在咨询乌孙兵包围段会宗事时曾指出:“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汉书·陈汤传》。这“汉巧”乃是西汉先进的冶铸技术,如低硅灰口铁球墨铸铁、由铸铁脱碳的百炼钢等。西汉的剑长度在80~118厘米之间,钢剑的刃部经过淬火,坚实锋利,而且还出现了有刃的环柄长刀。这些锋利有力的武器正是中亚各国缺少的,而由汉朝逃亡的士兵教给它们这方面的技术,即所谓“颇得汉巧”。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64~65页。一为穿井术。李广利伐大宛时,“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引起大宛贵族的恐慌,遂杀死宛王,遣使求和。李广利和部下计议:“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遂接受了和议。《汉书·李广利传》。

①关于中西交通,也就是今天中外人士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8世纪8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其专著《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指从中国内地往返于中亚的骆驼商队所走的道路。后经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对文献记载进

一步的考察,1910年出版了《中国和叙利亚的古丝路》一书,把丝绸之路向西又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了大批古代中国和西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遗址、遗物,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考古等问题遂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课题,并著书立说,使丝绸之路的研究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又提出了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等等。由于本书有地区限制,故以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通为题,包括草原、沙漠丝绸之路。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丝绸之路》条,1992年版第957页。

②《简报》、《释文选》,载《文物》2001年第5期;《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③见该书第395~396页。简文后的编组为引者所加。下引简文同此,不另注。

④关于该驿站简的问世,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不过目前尚未见论文发表。故前面述及郡县时,未引用该简,特此说明。

⑤《汉书·武帝纪》。

⑥《汉书·西域传》。

⑦见《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第87页。

⑧《汉书·西域传》。

⑨《汉书·张骞传》。

⑩《汉书·西域传》。

⑪《史记·大宛列传》。

⑫见余太山著《塞种史研究·大月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0页。

⑬《汉书·张骞传》。

⑭《史记·西南夷列传》。

⑮《汉书·李广利传》。

⑯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97页。

⑰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上册第248页。) )

⑱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86页。

⑲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⑳关于犁靽即大秦、古代罗马的问题,与罗马占领埃及即灭亡托勒密王朝有直接关系。据记载,罗马占领埃及在公元前30年,其年托勒密王朝灭亡,领土并入罗马。原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城,从此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商业与商品集散地。其商业在西方世界居于首位,所以,当时人们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代称罗马帝国,因之我国史籍中才有了“大秦国,一号犁靽”,在安息、条支大海之西的记载,见鱼豢《魏略·西戎传》。也就是说,汉武帝时的大秦不能称作犁靽,相反,这时的犁靽也不能称作大秦。大秦称作犁靽,只能在公元前30年以后,亦即只能在西汉末年和东汉之时。详见刘光华、谢玉杰《骊靽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商榷》,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㉑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㉒参见《西安汉城故址出土一批带铭文的铅饼》,载《考古》1977年第6期;《扶风姜原发现汉代外国铭文铅饼》,载《考古》1976年第4期。

㉓《史记·大宛列传》。以下引文同此,不另注。

㉔《东观汉纪》卷16杨正条。

(作者系兰州大学教授)



## 陇右地名考(续)

薛仰敬

**三川** 在青海民和县境南部黄河北岸的官亭赵木川(上川)、中川、峡口(下川)全称三川。据《秦边纪略》载,明嘉靖时,这里已“水溉田畴”,“枣梨成林,膏腴相望”。清代每逢三月杏花烂漫,落红如雨,沃壤园林,景色美甚。乾隆碾伯举人吴棫作《三川杏雨》诗有“曾将烂漫照山川,水旁红雨白成泉。千家门巷皆铺锦,十里园林皆罩烟”句。三川今为青海全省闻名的苹果生产基地。约5万土族聚居这里,是青海领略土族民俗风情的主要景点区。平凉川(今甘肃泾河上游)、蔚如川(今宁夏南部黄河支流清水河)、落门川(今甘肃武山县东渭水支流南峪河)合称三川。

**三合** 在青海平安县城西南13千米。明初祁土司曾在此筑高墙,城堡内设衙门,人呼高墙堡。现城已不存。1952年改三合村,并置三合乡。

**三岔** 在甘肃漳县城关镇西北14千米。东通陇西、武山、甘谷,西南抵卓尼、岷县,北达渭源、临洮,故名。《元丰九域志》云,熙宁四年(1071年)置三岔堡。明初置三岔镇。后设三岔驿。清末驿废,城址犹存,三八日集。今为三岔镇。漳县之大镇。总面积125平方千米,人口2万多。

在甘肃临潭县城关镇东南63千米山谷中,有三岔交汇于此而名。清设三岔关。今设乡政府。森林资源丰富,有4.4万亩,多松、柳、杨、桦树。

在甘肃镇原县城西北43千米的蒲河上游米家川河、白家川河汇入蒲江源头交汇处,故名三岔。镇政府驻高湾村。清晚期,西方传教士于此建天主教堂。193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三岔,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李富春、叶剑英、邓发等领导人均在这里宿营。现确定为该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岔古代

为征战地,今日是镇原北部农贸产品集散中心地。1985年置镇。特产黄花菜、花椒。在秦州东南220里渭水南岸。宋绍兴末,吴璘恢复秦陇置砦于此,人称吴砦。对岸为陕西陇县地。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三月,秦州州判驻三岔,名三岔厅。民国并入县。清置三岔堡,在今甘肃武威市北。

**三甲** 在甘肃临洮县洮阳镇南25千米的洮河东岸。明代里甲户口编制以一百户分十里,每甲十户载于黄册以充差役,此地以数序编为第三甲;一说以清代兵营驻地序数而名。今为三甲乡。境内有新石器时代马家窑与寺洼文化遗址格致坪。

**三陇** 陇东、陇南、陇西称三陇之地。以陇山之东划为陇东,陇山以西为陇西,今陇南市、天水市、甘南部分地区为陇南。故甘肃亦名三陇。

**三峡** 在青海省西宁市东之湟水谷地。三峡一为小峡,长7里;大峡长75里;老鸦峡长50里,合称三峡。

**三镇** 明王朝为防御蒙古游牧民族侵扰,在我国北部边境共设九军事重镇,其中西北置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简称三镇。

**三滩** 在甘肃靖远县,处黄河西岸,今为乡名。三滩的泮泰、中源两河渠,首开于汉唐,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巩昌府牧监同知吕恒重开。清康熙、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17年、31年多次修浚,至1990年底,泮泰渠干渠全长12千米,有支渠4条,长21千米,灌田1.9万多亩。在甘肃徽县城东南50千米处,从西而东,有头滩、二滩、三滩、昏人滩等,滩滩相贯,有“八九七十二滩”之说。从东北而西南,有大殿山、东界山、太阳山等“九九八十一山”之说。全区80%的地域被原始次生林覆盖。境内林海茫茫,碧草连天,小溪飞瀑,奇峰溶洞

辉映。林中有珍稀树种十多种,羚羊、金钱豹、猴、麝等保护动物 40 多种。还有岩洞、南天门、黄羊岭、月亮峡及瀑布多处,双龙崖古栈道遗址等近百处景观,是一处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旅游地。

**三台** 在新疆吉木萨尔县西偏北 25 千米,属三台镇所在地。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在三台西 4 千米处无量山东麓筑惠徕堡,并设营塘,称三台塘。光绪设三台驿。林则徐《荷戈纪程》云:“有上台、中台、下台。上台五百余户,……铺户皆在下台,相距约二里”。以地形有三层台而名。主产粮食。有三台酒厂,“三台老窖”为名优产品。

**三秦** 五代十六国时期的前秦苻健,后秦姚萇,西秦乞伏国仁,史称三秦。

**三边** 明季称陕北、宁夏、甘肃一带为三边。在延绥、宁、青设三大卫所为军事要地,修边墙,驻重兵,防北虏入寇,曾是明朝北边战略防守处。三边制府驻固原,也称二镇,即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城内。杨一清、曾铣等人先后任过三边总督,杨尤多建树。据《殊域周咨录·北狄》载:曾使“三十余年胡马不敢南牧”。汉代幽、并、凉三州地亦称三边,其凉州地辖今甘宁青。因三州地均在我国北边之疆域而名。

**三河** 古水名。汉时羌人所居黄河、赐支河(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一带境内一段黄河)、湟河三河的合称。

**三堡** 在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近处。三堡又名阿斯塔那,维吾尔语意为“首府”。清设守备驻防并置驿,后设都司,今为村名。该堡有护堡壕深 5 米,今仅北墙存有遗迹。北数里有明长城。1948 年与二堡合称高昌镇。今为吐鲁番市三堡乡所在地。

**三岔河** 古称谷水。《清一统志·凉州府》谷水“在武威县东,东北流经镇番县,东出边海”。今甘肃民勤县境之石羊河。《读史方輿纪要》卷 60 临洮府狄道县:三岔河“在府西北 10 里,……流入洮河”。在今甘肃临洮县西北。

**三台驿** 清驿站。即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西七十里三台镇。

**三个泉** 在新疆木垒县博斯塘河的戈壁滩头。光绪时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载,这里为唐代庭州

七守捉之一——独山守捉城,有三泉,古驿道所经地,今两泉已干涸。距三个泉 1 千米处有古堡遗址。三个泉为古代军事要道,是古丝路上重要城堡。清人史善长咏《三个泉》诗:“漠漠黄沙黯澹天,果然涓滴胜金钱。愿教吸尽西江水,喷作戈壁百道泉”。西域道上水贵如金,诗人渴望戈壁滩上多泉水之心声犹在昨日。

**三堡驿** 新疆哈密市西 60 千米处重要驿站。维吾尔语称托和齐,意为长官故居。清人陶保廉考证,这里即唐代纳职故城。伊州古道由此分路,一向南去高昌,一向西北去鄯善。唐玄奘去印度取经,宋代王延德使高昌皆经此。清乾隆时,此处设“屯,兵三百戍之”。驿东白杨沟,泉水下流四堡、五堡,这一带有佛窟佛寺、古城、古墓群及烽燧遗存,为哈密古文化发祥地。

**三道坝** 在新疆米泉市北 17 千米。民国初年筑坝引水,为第三道坝而名村。1928 年乾德县治设三道坝。这里地下水丰富,建有三座水库,盛产水稻,是米泉市重点产粮区之一。近二三十年推广稻田养鱼,养鱼水面约 133 公顷。

**三角城** 甘肃榆中县辖地,312 国道经此。旧城周长一里二分,为唐代戍兵所筑。清初在旧城北增筑新城未及一里。城略成平行四边形,东西两方向由远处眺望均可见城堡三个角,故称三角城。

青海省海晏县人民政府驻地,位于海晏县城西北 1 千米。西汉为西海郡城,王莽时建。城址保存完好,东西长 650 米,南北宽 600 米,城墙残高 4 米,四门可辨。城内 20 世纪 40 年代天水冯国瑞先生始发现虎符石匮一尊,身長 132、高 46 厘米,石座长 137、宽 115、高 65 厘米,石座正面有篆文三行“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三行九字。另一块有“虎符石匮元年十月癸卯郭戎造”三行篆刻铭文。铭文拓片结合串读,第一行七字“西海郡虎符石匮”;二行九字“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三行六字“工河南郭戎造”。石虎蹲伏状,昂首张口,形象生动。此文物有重要史料价值,今存海晏县文化馆。又出土两汉货币及东汉铭文瓦当,唐代莲花纹瓦当和宋代钱币。后因年久失修,东南城角坍塌,成三角形,故称三角城。1940 年为海晏设治局治所,

1943年为县驻地,1951年为海晏县治。2001年改银滩乡置三角城镇。青藏铁路经此。

在甘肃靖远县糜滩乡黄河北红砂岩山头上,古河西羌人所居。建于西夏时期,周长850米,高10米,底基12米,开南门,城略呈三角形而名。城内发现西夏砖、古墓、陶器等。

在甘肃永登县大有乡中川村三角城社。城坐西向东,依山而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为宋筑石门堡遗址。在甘肃金昌市双湾乡尚家沟村二队北侧。新石器时代沙井文化城址,约为公元前800—600年。墙垛泥土垒筑,南北154米,东西132米,残高3—5米,开南门。城内灰层厚约2.7米,出土石球、石斧、磨盘、磨棒、夹砂粗红陶片、铜器、卜骨、卜币等。城外有房屋、窖穴、墓葬等遗址。从出土铁器现象判断,含有彩陶的沙井文化是甘肃彩陶中时代最晚的文化,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为农牧经济。

在甘肃民勤县红沙梁乡西约7.5千米沙丘中。汉代武威郡北塞上重要城障,塌损略呈三角形,故名。南北120米,东西约200米。遗址附近有灰红夹沙陶片、汉砖,附近有农田遗址,汉唐墓葬。国营民勤县三角城林场建在这一带,林场总面积32万亩。

在甘肃古浪县民权乡长岭村南平顶山坡上。汉城。今存残垣。

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城桥头镇南。元时所筑,路通甘凉肃等处。《西宁府新志》称该城为永安关,或南閤门。俗名三角城。分上下二城。上古城(左)东西约300米,南北356米。下古城(右)东西310米,南北280米,残高最高10米,城垣大段塌毁。

在青海门源县旱台乡旱台村东,建在一红山顶,高出民门公路250米。城呈三角形,开北门,城墙全毁,东西30米,南北40米,西南偏下筑哨台两座。属汉代建筑。在青海门源县克图乡东侧,城高10米,西北开一门,有瓮城。宋城,明清修葺,遗址至今基本完整。在青海祁连县峨祁公路19千米处,恰当山扇形沟口。城址范围1500平方米。古城由三座互为犄角堡子组成,其西和西南两堡小,呈

方形;东北不规则三角城大。宋代遗址。在青海大通县向化乡西,城三角形,遗址残存,始建年代不详。甘青新三地区凡所筑三角形城,均因险设防,互为支援的军事设施,若三面受敌,各当一面,一方受敌,两方支援,若全面告急,则尚有一面退路。在青海祁连县城西峨堡乡境内,有长约文化古三角城,南北120米,东西100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大红沟乡三角城村山丘上。明代筑。东南面开门。称三角城,实为矩形,东西60米,南北28米。在甘肃临潭新堡乡窑头村西北青石山上的排狼山嘴。南临洮河,城略似三角形,以控驭洮河北岸东西通道。东垣长约75米,西南垣长62.5米,西垣长43米,北垣长30米,为唐至德(756—758年)后,吐谷浑筑三角城,为唐与吐蕃王朝双方攻防要塞。北宋废弃。在甘肃华亭县麻庵乡三角城村。宋庆历四年(1044年)陕西漕运使张奎采掘仪州三角城黄铜矿,即此。三角城早已无城,地处旧城去矿山及蒲塘三岔路口,宋明两代时商业、饭馆、店铺多有,甚繁华兴旺。

三工镇 在新疆昌吉市南13千米,因三工村得名。1956年设三工乡,1958年改公社名,1984年改社为乡。后又改乡为镇,镇驻地梁口村。多汉族,又有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产煤。北疆铁路经此。

三台山 在甘肃漳县城北,又名钟鼓旗山。海拔2134米。钟山之巔古有泰山书院。今引水提灌绿化荒山,并建四亭一廊,发展建设泰山公园,为该县休闲健身之地。

三皇谷 在甘肃清水县东南70里关山林海深处,今山门镇白河村,亦名轩辕谷。传为轩辕黄帝诞生地,古代建三皇庙。2003年辟为三皇省级森林公园。公园有龙潭沟、芦子滩、轩辕谷、白桦湾、金柳沟和石洞山六景区,总面积3665公顷,空气清新,四季常青。

三关口 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东南37千米,今属蒿店乡。又名弹箏峡、金佛峡。因当瓦亭、制胜、六盘三关之口,故名。后魏永熙三年(534年),宇文泰闻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驰赴平凉,令杜朔周先据弹箏峡。《元和郡县志》谓:“泾水南流经

都卢山,山路之中,常如弹箏之声,行旅因谓之弹箏峡”。峡中有金装佛,因名金佛峡。此处历代摩崖石刻较多,峡口处尚存庙宇及碑刻。佛庙之右有“萧关锁钥”四字摩崖。高峰夹水,西去甘凉,北通朔漠,历代为战守要隘。

在宁夏永宁县杨和镇西北38千米贺兰山中段,原名赤木口。沿沟谷自东而西曾设头道关、二道关、三道关,1949年改称三关口。古设关隘,明嘉靖筑长城尚存。是宁夏银川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交界地,系咽喉所在,今仍为重要关口。

三岔关 《明一统志》卷37洮州卫:三岔关“在卫城东四十五里”。即今甘肃临潭县东南三岔乡。

三岔堡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置,属通远军。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北二十五里。金废。

三岔镇 《清一统志·秦州二》三岔镇“有州判驻此,兼设把总”。在今甘肃天水市东渭河南岸。

三香水 《寰宇记》卷32泾州灵台县:“三交川水,在县东南十五里,亦名三香水,源从麟游县”。在今甘肃灵台县东南。

三个桥 在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三个桥村。村昔年建有三个桥,故名。1990年6月在该村南约1.5千米的荒漠戈壁,新疆文物工作者在此清理发掘战国至晋唐时期墓葬33座,出土陶罐、陶碗、陶钵、纺轮、皮衣、皮鞋、皮带、耳环、铁钉、砺石、发簪、手杖、毛毡、毛裙、食物、水饺、枣、葡萄等。

三营镇 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西北33千米的清水河西岸。老三营城址在河东,原称万家川。宋置平夏城,后升为怀德军,宋末废。明弘治间为固原排序号第三营寨,故名。清置三营驛。1912年设镇,1949年后改区。1984年置三营乡及镇,乡镇并存。1985年撤乡并入镇。镇政府驻三营。银川至固原公路必经地,宝中铁路经此设站,为固原市最大集镇,以皮毛加工交易为主。1989年建有长约2里的商业一条街。

三角堡 在甘肃临夏县韩集镇东北23千米的北塬西北侧。元代蒙古驻军依地形筑堡,似三角形而名。今临夏县三角乡政府驻此。

三台阁 在兰州市城南皋兰山顶最高处,基址海拔1800米,相对高度600米。原为唐宋时所

建烽燧遗址,明建文初年(1399年)建魁星阁于其上,史载“神阁一楹,阁崇三级”,俗称三台阁,岁久尽圯。清乾隆三十四年再修,1781年又遭兵燹。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咸同间再毁于兵火。民国六七年集资复建,民九年地震再毁。1949年后绿化荒山,使“兰山烟雨”景致大大增色。20世纪80年代初再复建三台阁。历史上凡四修而四毁。今三台阁第五次修复,为兰山公园组成部分,是兰州市重要景观之一,夜观市区万家灯火,蔚为壮观。

在甘肃张掖市甘州区甘泉巷南城牆根,原与甘泉书院相对称,创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从三台阁可登城至五云楼,楼上悬有“咫尺五云”四字木匾。1942年蒋介石来张掖时,曾由三台阁登五云楼眺望全城景色。阁楼后随城牆一同拆除。

在甘肃镇原县潜夫山上。1930年重修。今废。

三界寺 在敦煌。元魏平凉,于敦煌开莫高窟,造像造福,建立此寺。今存,俗称石窟寺。

三都谷 汉为射虎谷,宋转音为三都谷,地在甘肃甘谷县境北山。汉段颍(姑臧人)剿羌于射虎谷。《宋史·曹玮传》: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唃廝囉率众数万人入寇,玮迎战三都谷”。地在今甘肃甘谷县西,魏晋称三府谷,宋讹为三都谷。一说地在今甘肃武山县东。

三坝堡 在甘肃民乐县城北直线距离14千米。明代筑堡,为张掖河上游第三处闸坝而名。清季简称三堡。今为三堡乡,乡政府驻三堡村。

三眼井 在甘肃兰州市城关区西关清真大寺南侧紧临大街处,原在数米内有三口井而名。水质甘冽,水量丰沛。始凿于明洪武年间,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是西关一带居民、车马店骡马牲畜饮水处。今存水井一眼,为西关清真寺备用水井而保护。

在宁夏中卫县城关镇南65千米香山南麓。明为庆藩牧地。有井三眼,后成村落,故名。1956年置三眼井乡。1962年析置三眼井公社,1983年改社为乡至今。

三塘湖 清宣统《新疆图志》卷二镇西:三塘湖在“城北二百四十里。水草丰美。东通归化城,北通

乌里雅苏台,西通科布多,北路通衢,商贾辐辏”。即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北90里三塘湖乡。三塘湖是南北走向一条山谷中的三片塘地,故称三塘湖。清乾隆后期,甘肃民勤县迁来八户屯民,始开始种植农作物,形成上中下三个自然村。1962年建三塘公社,1985年改社为乡。乡政府设中湖村,距县城74千米。该乡以种植瓜果蔬菜、春小麦为主。兼营牧业。

**三仙洞** 在新疆喀什市北郊约18千米的伯什克里木河南岸悬崖峭壁间。这里清泉甘冽,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三洞中置石像,故名。三仙洞自河岸至崖顶高三四十米,初建者在崖石凿孔插柱架木梯攀援,几与甘肃武山拉稍寺初建有雷同处。今洞内有释迦牟尼石胎残坐像及残壁画等。石窟开凿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佛教最初由印度传入我国喀什噶尔。该石窟公元10世纪左右因伊斯兰教在这里兴起而废弃。窟内有20世纪初英、法、德、日等国“探险家”题名。

**三道岭** 在新疆东天山巴尔鲁克山南麓,东距哈密市区85千米。古时由哈密向西经此翻越三道山梁而名。旧称塔勒奇,清设军台和驿站,有井泉和坎儿井,临交通要口。今这里的戈壁滩上四十多年前建起一座新兴煤城,是目前西北地区最大露天煤矿三道岭矿区。为年产450万吨的大型机械化煤矿和年产30万吨的一矿斜井。有职工1万多人,生产优质动力煤。矿区有人口4万,占地4.5平方千米。此处煤开采始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已有200多年采煤历史。今三道岭以煤业为主,电力、运输、纺织、建筑、建材、机械加工、农林养殖多业并举。三道岭煤矿已跻身于全国大煤矿行列,发展前景广阔。

**三台镇** 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城西35千米处,镇政府驻三台。是附近老台、庆阳湖、潘家台子等地区农副产品集散地,交通方便、市场繁荣。有三台酒厂产名酒,已有2000年酿造历史,北庭大曲行销全疆。清光绪初,在无量山东坡惠徕堡废墟设三台驿。1946年始设三台镇。1984年改三台公社复为镇。在甘肃陇西县东南部,镇政府驻文家。以境内有三台山取名。《水经注》云,为秦献公

所置道治。2000年改三台乡为镇。

**三眼泉** 在宁夏固原县西南5里羊坊庄南山下。平列三泉、水色澄莹,四周柳荫茂密,民间早年祷雨于此。在甘肃舟曲县城北三里。明清以来于石崖隙缝中涌出,泉水甚大穿城而过,流入白龙江,灌溉城郊田地。

**三危乡** 在甘肃敦煌市城东3千米,乡驻地泾州村。主产小麦、玉米、棉花、盛产梨和蔬菜。

**三危山** 在甘肃敦煌市东南,属祁连山脉。主峰海拔1947米。俗亦谓异雨山。有三峰,故名。(见《太平寰宇记》)。三危为沙州望山,俗名异雨山,今在城东南三十里。三峰耸峙,如危欲堕,故名。(见《明都司志》)。舜竄三苗于三危,三苗曾迁徙至三危。禹贡导黑水于三危。《山海经》:“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三危山西面大泉河对岸是莫高窟。《河图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汶山相接。”鸟鼠山即在今甘肃渭源县。今有人说渭源五竹镇西南5千米的银沟峪中三峰同麓,高耸云天而名三危乡。三危山在甘肃宕昌县。

**三河乡** 在甘肃武都县城东南32千米,乡政府驻汉坪。自北魏至宋代历为武都县经济、文化兴旺之地。地处郭河、福津河、花椒河三溪流汇合处而名。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为武阶郡翫当县地,西魏为武州武都郡覆津县地。唐初为武州覆津县地。宋为阶州福津县地。明为阶州地。清属阶州迭石里。1935年设福津乡。1958年三河、花椒两乡合并为三河乡,下半年建三河公社。1983年改社为乡至今。境内三面环山,水土流失严重。有宋代建柏林寺并《广严院赐额牒碑》,为福津县广严院古建筑遗存。

**三闸镇** 在甘肃张掖城北郊,镇政府驻张家墩。为清代建修水渠第三闸取名。原称有本乡。1955年改三闸乡,2001年改乡为镇。甜菜种植面积大,产量高,其高寨村1988年种甜菜1194亩,平均亩产3.55吨。近年利用水资源养鱼,年上市鲜鱼1.6万公斤。主产粮食。

**三川口** 在甘肃皋兰县驻地北一千米许。此处为西岔通往永登,猩猩湾通向白银、白家川连接黑石之三个川的口子上,故名。今公路与铁路交汇

处。1979年这里出土过新石器时代马厂文化石磨盘、石斧、细泥彩陶罐等。1987年夏,笔者在此普查文物时又捡到经加工的扁平蛋形(长约10余厘米)石磨盘一,送皋兰县文化馆保存。

**三墩庙** 在甘肃酒泉城东北18千米,陶赖河南岸,三墩庙乡政府驻三墩庙。以酒泉城东古驿道旁第三处烽火墩台建庙宇而取名。1993年有3159户,12631人。盛产洋葱、大蒜,为农产品集散地。

**三峪乡** 在甘肃礼县城南90千米,乡政府驻水坝沟。1949年始置三峪乡,1961年为三峪公社,1983年改社为乡。境内山大沟深,坡陡地少,气候湿润,植被良好,有森林约10万亩。特产木耳,为饮食中山珍。

**三贤祠** 在甘肃永登县城原葛衣先生祠内,为今城关小学占地。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建前殿祀葛衣先生赵天泰,后殿祀御史包节,人称二贤祠。雍正间,庄浪监屯厅金人望又被尊为一贤,与赵、包合称三贤,建三贤楼,其祠改称三贤祠。三贤祠后为学宫。毁于民国。

**三江源** 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源头,在青海省果洛、玉树、海南三个藏族自治州的16个县中,面积31.6万平方千米。海拔4000多米的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国内面积最大,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地区。有藏羚羊、藏野驴等70多种。这里由于过度放牧造成草原退化严重,生态恶化。2003年1月开始,国家始斥巨资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该地区将减少牲畜总量的1/3;通过退牧还草,扶持牧民定居等方式减少1/4的牧业人口,让牧民过上安定生活。国家用10年左右扭转三江源地区生态持续恶化趋势,使草原得以恢复,野生动植物以及湿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达到山绿水清,草场丰美的目标。2000年8月,成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在通天河畔竖碑。保护区共分六大块,保护区采取休牧育草、禁牧育草、造林种草、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沙漠化防治等一系列措施。

**三清渠** 在甘肃高台县境内。始开于清雍正年间。1945年进行整修,渠口下移,开新渠9.2千米。1953年在大沙坡处分建三清渠南、北干渠。1964

年和1965年,实现控制用水。有直属斗渠54条,总长115.26千米,南华、骆驼城两乡受益,有效灌溉面积54300亩。

**三爱堂** 在兰州市城关区颜家沟南侧。抗日战争后期,张治中将军任西北军政公署长官时,在这里建公署礼堂,礼堂门额书“三爱堂”三大字,下题“爱民、爱兵、爱右军”七小字。1949年后,此地扩建为陆军医院,人们习惯称三爱堂医院至今。

**三泉驿** 又名阿克他斯塘。在新疆木垒县东南三个泉子。清置驿站于此。

**三岔厅**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划秦州东南乡73个村置三岔厅。初治今天水市北道区利桥乡,不久迁北道吴砦乡。秦州州判驻三岔镇。地处川陕咽喉,有宋吴璘屯兵遗址吴砦。

**三坝渠** 在甘肃临泽县境内。明代整修,渠开口于柳树堡,无坝引水,旧称屯田渠。明季灌田5862亩,清代灌田6667亩。1951年改道25千米,溉田9400亩。至1984年灌溉面积增至1.56万亩。

**三义殿** 在甘肃古浪县土门镇街东北隅之柏台。清康熙四十三年(1778年)建,因土筑台地植有翠柏而名柏台。台上原有古建筑多座,毁于1927年地震。仅幸存三义殿,卷棚、三间重檐歇山顶砖木结构,内塑刘备、关羽、张飞三结义像,并有诸葛亮、赵子龙等塑像。

**三川河** 青海湟水主要支流,为西川河、北川河、南川河合流,共在西宁市区北部汇合成湟水向东注入黄河。

**三阳川** 在甘肃天水市北20千米。宋开宝元年(968年)置三阳砦,地滨渭水。领渭滨、武安、蜗牛等十四堡,时皆与西夏交界处而宋据守之。三阳川西北有伏羲画卦台遗址。三阳者以“朝阳启明其台光荧,太阳中天其台宣朗,夕阳返照其台腾射”的画卦台而名。金为三阳寨。明清至今一直称三阳川。

**三河口** 三河口为兰州市西固区达川乡境内黄河、湟水河、大通河交汇处。亦有称“三江口”者。沿河谷地6千米内,上车、岔路、河嘴、吊庄、幸福五村庄一字分布,千亩枣林、农庄掩映,一派田园

美丽风光。

**三教洞** 在兰州市五泉公园千佛阁西数十米台地,为五泉山最高一处古建筑。始建年代不详,原供儒、释、道之祖孔子、释迦、老子而名三教洞。明正统间禁革儒释独尊道教,清初仍祀儒释道之祖。同治六年毁,光绪间重修时,移孔子像于县文庙,原在城关区延寿巷幼儿园址,2002年后县文庙又移黄河铁桥北近10里今址。三教洞三塑像毁于“文革”中,现三教洞内无塑像。

**三川寨** 北宋天圣中置,属镇戎军。金升为三川县。在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彭堡乡境。

**三乡镇** 明置巡检司于此。《清一统志·平凉府二》:三乡镇“地有三乡川,故名”。在今甘肃华亭县东南40千米上官镇。

**三女川** 今甘肃灵台县西。

**三龙县**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置,属岐山郡。治今甘肃灵台县南。隋开皇十六年移陕西,改名岐山县。

**三阳寨** 北宋开宝元年(968年)置,在今甘肃天水市北。

**三岔驿** 明置,今甘肃漳县西之三岔。明置,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北之三岔。

**三河郡** 十六国南凉置,治地白土县(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北黄河北岸)。北魏废。

**三兜谷** 东汉章和元年(87年),烧当羌迷吾杀护羌校尉傅育于此。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一说地在青海尖扎县西北。

**三台观** 故址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北山坡上。据原观内铁钟铭文载,明嘉靖十三年(1533年)建。清同治毁于兵燹。存铁钟高约2米,周长约4米,铸有八仙和八卦图,又毁于1958年。

**三塘驿** 明置。即今宁夏中卫市西于塘。

**三忠祠** 原在甘肃静宁县城东,现农机制造厂院内。纪念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玠、刘琦三位将军。静宁县是三将军故里。祠建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9年),乾隆五年(1728年)重修。同治十年(1872年)左宗棠西征经此祭该祠,其立碑小篆文《宋三忠庙丽牲石文碑》残碑,今存静宁县博物馆。近年新建三将军庙于烽台山,有一定规模。

**三十六路** 宋宣和二年(1120年)分天下为三十六路,其中秦凤路为三十六路之一,其地为今陕、甘及青海湟水流域。

**三龙古县**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置,属岐山郡。治今甘肃灵台县南。隋开皇十六年移岐山南十里(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五十里),改名岐山县。

**三十里墩** 在甘肃临洮县城北30里处。《一统志》云:“秦筑长城起点,唐置长城堡”。秦长城起点在临洮30里墩杀王坡,尚存遗迹。

**三泉古县** 隋义宁二年(618年)置县于今甘肃庆城县桐川。唐武德三年(620年)改三泉县为同川县。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废。

**三川古县** 宋天圣八年(1030年)置三川军寨。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元昊占据。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升三川砦置三川县,治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属镇戎州。蒙古至元七年(1270年)废。故址在今甘肃镇原县城西北60里,三川总汇于此,今属开边乡羊千原村交口南岸坪台地。三川县一说在今宁夏固原西北15千米处。一说在今宁夏彭阳县新集乡,2003年该乡姚河村陶海子出土有宣和二年(1120年)杨庆抵达三川寨验尸碑。

**三道坝镇** 在新疆米泉市南部。镇政府驻三道坝村。清乾隆年间,当地农民在黑沟河上筑坝引水灌田,沿河上下共筑四道堤坝,该地处第三道堤坝,故名。现境内有水库三座,各灌田1500-3000余亩,并在水库养鱼。清光绪间,左宗棠部刘锦棠率湘军垦种稻成功。目前主产水稻,境内地下水丰富,全市重点产粮区之一。1928年设乾德县于此。1989年改三道坝乡为镇。

**三道沟镇** 在甘肃瓜州县渊泉镇东136千米,昌马河冲积扇前缘。以境内有疏勒河支流三道沟河取名。民殷物阜,甘肃西端商道枢纽,清代其老街已有商号店铺,比玉门、安西县治经济富庶。1985年置镇。镇政府驻三道沟村。兰新公路及铁路均经此。盛产红皮葱、红皮蒜。为瓜州县粮油、甜菜、黑瓜子产区。有石棉、煤矿。

**三甲集镇** 在甘肃广河县城东北20千米广通河南岸。明代里甲之三甲,故名。原是河州第一重门户。1949年前置三甲乡。1985年置镇。镇内

水资源较丰富,有洮河、广通河流经镇境,兴修永红渠一条。有毛纺、羽绒、畜产品、皮毛加工等。该镇是广河县最大集贸市场,是甘肃皮毛主要集散地之一,又有木材、茶叶、牲畜、羊只等大宗商品,集市向十里长街沿伸,今为甘肃省四大主要集贸市场之一。兰郎公路横穿境内,康临公路经此,交通便利。

**三眼井堡** 在甘肃景泰县城西北 20 千米处八道泉乡三眼井村。宋元称汜水关。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兵备副使荆州俊建堡,堡中龙王庙前掘井一口,中有三眼出水而名。堡周长 120 米,高 8 米,基宽 7 米。并筑月城,建神庙。

**三晋会馆** 又名山西会馆。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有大门、前庭、正殿等。原与八旗会馆比邻。古建筑十多年前已全部拆除,位于今兰州市永昌路北段西侧,现兰州第四十中学用地。

**三十六郡** 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西北地区有陇西、北地二郡。

**三十六国** 汉代西域有三十六国,其地多在今敦煌以西至新疆境内。有婼羌(今若羌县)、且末(今且末县)、楼兰、小宛、精绝、戎卢、扞弥、渠勒(上述六国今已沦为戈壁)、于阗(今和田、于田两县市)、皮山(今皮山县)、依耐(今英吉沙县)、莎车(今莎车县)、疏勒(今疏勒县)、尉头(今乌什县)、姑墨(今拜城县)、温宿(今温宿县)、龟兹(今库车县)、尉犁(今尉犁县)、危须、焉耆(今焉耆回族自治县)、车师(今吐鲁番市)、墨山(今罗布泊沙漠北)、劫、狐胡(皆在今鄯善县)、乌垒(今轮台县),还有部分小国在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境内。

**三元道观** 在甘肃金塔县城北 12 千米,今羊井子湾乡境内。2000 年,企业家宋安学投资 1100 万元,在榆树井旁新建三元道观,有山门殿、灵官殿、三官殿、钟鼓楼、三清殿、慈航殿等。这里已成为一处旅游和宗教圣地。

**三水古县** 西汉元鼎三年(前 114 年)置县,属安定郡。其地安置匈奴族,为安定属国都尉治,管理内附匈奴事务。东汉末废。后置西川都尉。三国魏改西川县。治地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东

35 千米,下马关乡北红城水故城址。

**三屯碑水库**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部,靠十七户路西侧。1965 年始建,1967 年竣工使用,因在三屯碑地区,故名。占地 52 万平方米,水面面积 23 万平方米,最大蓄水量 120 万立方米,实际库容量 90 万立方米,是乌鲁木齐市绿化专用水库。

**三甲水电站** 在甘肃临洮县城南 25 千米三甲乡境内洮河干流上。1992 年 2 月 12 日开工,1997 年 9 月三台发电机组全部建成投入试运。坝顶总长 229.16 米,最大坝高 35 米,水库正常蓄水位 1968 米时,相应库容 967 万立方米。多年平均发电量 1.275 亿千瓦时,是洮河上第一座河床式水电站,提高了原溥济渠 2.8 万亩农田灌溉的供水保证率。同时解决了刘排子坪、格致坪两处共 1.6 万多亩电力提灌工程的取水水源和电源。库区又为洮水添明珠,成为旅游重要景点之一。

**三十里铺乡** 在甘肃庆城县城北 15 千米。1978 年 5 月上旬,社员在环河左岸三十里铺采石场采石料时,发现一脊椎动物化石。后经证实是一翼龙,两翼展开长度约 2 米,命名为庆阳环江翼龙,属原始翼手龙类。为中生代侏罗纪——白垩纪,是会飞的爬行动物。

**三间房** 卡伦《新疆识略》卷三哈密:三间房卡伦“距城四百六十里”。清末废。即今新疆哈密市西北三间房。

**三将军神祠** 在甘肃庄浪县朱店镇。祀吴玠、吴玠、刘锜三位抗金名将。

**三将军神祠** 一名三忠祠或三忠庙。在甘肃静宁县城东,祀涪王吴玠、信王吴玠、武穆刘锜,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建。清同治十二年左右宗棠命举人孝威撰书《宋三忠庙丽牲石跋》,小篆体,共 19 行,满行 30 字。碑文拓片笔者有收藏。

**三百户大桥** 在甘肃会宁县郭城驿西南 10 千米处关川河上。元代有三百户长驻屯管辖这一带,桥因名。1989 年 5 月建成净跨 60 米单孔钢架拱桥,桥长 102.69 米,高 15.7 米,桥面净跨 7 米,使郭岷公路畅通无阻,定西靖远间距离比原运营缩短 61 千米。

**三屯河水库** 在新疆昌吉市南山三屯河中游

碾盘庄。始建于1971年冬,后因经费等原因1973年停工。1976年重新兴建,1985年竣工。坝高52米,长280米,总库容量3500万立方米。建有东西干渠。现浇灌土地面积52万亩,其二六工、榆树沟、大西渠、佃坝、滨湖五个乡及城郊办事处大部耕地受益,并解决近8万人民生活用水。

**三〇七国道** 亦作307国家级公路。黄骅港至银川公路。起自河北省渤海西岸的黄骅港,经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于宁夏盐池等地至银川。全长1193千米。为全国东西向公路干线之一。

**三〇九国道** 亦作309国家级公路。荣成至兰州公路。自山东省黄海西岸的荣成,经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富县进入甘肃省,由庆阳、宁夏固原再入甘肃省,向西至兰州。全长1961千米。连接鲁、冀、晋、陕、宁、甘等6省区,为全国公路主干线之一。

**三一〇国道** 亦作310国家级公路。连云港至天水公路。自江苏省连云港等地经安徽省、河南省、陕西省西安、宝鸡等地入甘肃省清水,至终点天水。全长1153千米。与316国道天水至兰州段和312国道兰州至霍尔果斯段组成全国最重要的东西向公路主干线。

**三一二国道** 亦作312国家级公路。上海至霍尔果斯公路。自上海市入江苏省、经安徽省、河南省、陕西省商州往西北入甘肃省,经平凉、宁夏隆德、甘肃静宁、会宁、定西岷口、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柳园、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乌苏、霍城等地至霍尔果斯口岸,与哈萨克斯坦相连接。全长4708千米。甘新路段为古丝绸之路由西安经兰州中线及河西走廊去西域路线,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被贬新疆伊犁所记《荷戈纪程》所经道路大部分地段相同。兰州至霍尔果斯段为全国东西向公路主干线之一。

**三一四国道** 亦作314国家级公路。新疆乌鲁木齐至红其拉甫达坂公路。自乌鲁木齐经托克逊,穿越天山至库尔勒,沿塔里木盆地北缘,经库车、阿克苏、喀什折向南,登帕米尔高原,至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喀喇昆仑山口红其拉甫达坂。全长

2073千米。塔尔库尔干至红其拉甫达坂段原为中巴公路。为联系南北疆并通往巴基斯坦的干线公路。

**三一五国道** 亦作315国家级公路。西宁至喀什公路。自青海省西宁市经湟源绕过青海湖北岸,经柴达木盆地北部的德令哈、大柴旦、茫崖等地入新疆,经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若羌、且末、民丰、和田、叶城、莎车等地至喀什。全长2746千米。

**三一六国道** 亦作316国家级公路。福州至兰州公路。自福建省福州经江西省、湖北省、陕西省,进入甘肃天水、临洮等地至兰州。全长1985千米。连接闽、赣、鄂、陕、甘等省,为全国公路主干线之一。

**三水属国都尉** 西汉前期置三水属国都尉。汉武帝时未远循的匈奴归附汉朝,汉官管理之。三水属国都尉治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三源电力提灌站** 在甘肃永靖县南,刘家峡水库北岸黄土塬台上。始建于1966年6月,1973年12月基本竣工。提灌分四级提水,总扬程298.8米,上水管道总长4.2千米。干渠5条,总长13.32千米,1985年实灌面积1.72万亩。

**三滩黄河公路大桥** 在甘肃白银市靖远县三滩乡,上距靖远县城8千米,为109国道二级公路控制性工程。桥全长520米,净宽16.5米,主跨径140米。于1996年开工,2000年9月竣工通车。该大桥建成使109国道吴(家川)唐(家台)段公路全线贯通,对疏通我国东西大通道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三道沟四道沟水渠** 在新疆哈密市柳树泉农场。引西山三道沟和四道沟水,全长38千米,实际灌溉农田2.4万亩。1966年全部竣工。

**三角城电力提灌工程** 入水口建于甘肃榆中县来紫堡乡小燕湾黄河岸边。该工程1966年兴建,1973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成。1980年灌溉土地7万亩。主干渠分总干渠、东干渠、西干渠,全长52千米。(未完待续)

(作者系兰州市博物馆退休干部)

# “陈云一贯右倾”考辨

## 从抵制“左”倾错误角度切入

王杰

新中国史上，“陈云一贯右倾”曾在决策高层流传颇广，也直接影响相当时期的重大决策取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屡有述论提及但未见有系统研究成果发表。此事内涵丰厚，影响深远，很有必要廓清。

### 一、“陈云一贯右倾”透视

#### (一)“陈云一贯右倾”史实辑要

新中国史上自“左”倾错误出现以来，“陈云一贯右倾”随即散播流传。如胡平口述《改革开放亲历记》一书就载，“在党内陈云被划为‘老右倾’”。<sup>①</sup>现已公布的权威史料，也载中共高层有关人物就陈云“右倾”的不同说辞。1966年8月，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攻击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一九六二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sup>②</sup>1968年10月，谢富治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言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的。”<sup>③</sup>

现已公布的史料显示，陈云面对“陈云一贯右

倾”，既未见有辩驳，也未见有意规避，总体表现为依然故我地担当、恬然和睿智。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应对关系“主义”和“道路”的严重批评，检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要他发言而自己不发言的“错误”，说“主席要我在大会上发言，因为我不愿在这样的会议上散布我的右倾观点，因此，没有讲。如果要讲，也只能讲那时的右倾观点。这种不表态，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种表态。”<sup>④</sup>陈云的这个检讨颇耐人寻味——“如果要讲，也只能讲那时的右倾观点”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中央全会如此庄严场合受到冠以“搞修正主义的”批评，陈云依然故我坚持“那时的右倾观点”。朱佳木在《一代伟人陈云》序言中说：“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末，陈云同志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曾经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因此几度受到冷遇。”“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说他‘左’了，‘僵化’了，甚至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也跟着鼓噪。这个话传到陈云同志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sup>⑤</sup>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一些颇有资望的老同志在会上批评“陈云一贯右倾”。如姚依林在西北组会上发言说，“我不赞成那种‘陈云同志一贯右倾’的说法”。谷牧在中南组讨论时发言说：“陈云同志长期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多年的实践证明，不能给陈云同志戴这样一顶帽子。”<sup>⑥</sup>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毛泽东“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据《毛泽东传》、《陈云年谱》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权威史籍载: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把周恩来、陈云推动的“反冒进”视为右倾,严厉批评“离右派还差五十米”。“反反冒进”事实上启动了大规模的反右倾。<sup>⑦</sup>社会上关于毛泽东说“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由来已久。李乔《推倒“陈云一贯右倾”之说》一文断言,“‘陈云一贯右倾’。毛泽东确有此言”,<sup>⑧</sup>但又未注明出处。毛泽东于何时何地“确有此言”,尚需确凿证据支持。笔者查阅《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及《陈云年谱》和《陈云传》等官方权威文献,尚未见毛泽东有“陈云一贯右倾”断语的证据,相反却有毛泽东批评有人批评陈云右倾的述载。——“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1959年钢产量1800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很正确。’”<sup>⑨</sup>

## (二)“陈云一贯右倾”的实质

陈云作为中共历经诸多成败曲折实践的资深革命家,历来十分重视从思想观方法论升华角度修炼自我。“1943年3月,毛泽东为照顾陈云养病,将他从杨家岭迁至毛泽东的住地枣园居住。陈云在此治疗休养了一年。”<sup>⑩</sup>在此期间,陈云向毛泽东讨教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毛泽东告,所以犯错误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要学点哲学。“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我们

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sup>⑪</sup>陈云自述表明,在自己“唯实”观发展升华的关键之机,得益于毛泽东实事求是精髓的催化,一旦突破完成质变,实现了从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形成以“唯实”观奠基的稳定的认识论,并成为始终坚定不移规范自我准则。陈云对于准确把握事实形成的正确认识,历来持之以故,从不轻易改变。如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曼发现,陈云“很少改变他对经济问题的看法。”<sup>⑫</sup>经济学家张曙光从操守始终如一视角评价说:“就坚持独立立场和见解,不看他人眼色,不见风使舵,不计较个人荣辱安危来看,陈云同志也许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做得最好的。用则出山效力,不用则退避山舍,表现出了一种独立人格。”<sup>⑬</sup>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南组讨论发言中说:“陈云同志的特点是慎重,在任何情况下,对各类事情都能冷静周密地思考,采取审慎负责的态度,从不随声附和”。<sup>⑭</sup>毛泽东以其统揽天下、敏锐查事识人的深邃,评价陈云“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很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指标的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一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

## ⑮

各方面各层次的评价公认,坚定不移“只唯实”,坚持真理不动摇,是陈云思想方法论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中共历史上历次“左”倾错误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在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论却是共同点。新中国史上,在“左”倾错误发生发展成为指导思想大势之下,陈云坚定不移“只唯实”和坚持真理不动摇的主观能动和客观指向,都直指反对唯心论,即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这就在事实上构成了“只唯实”和“唯上”“唯书”的斗争,即具体化的抵制“左”倾错误与“左”倾错误反抵制对立

格局。但“左”倾错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逐渐占了上风”，<sup>⑩</sup>以党的决议、决策的形式堂而皇之地贯彻，这就在客观上使得抵制“左”倾错误和“左”倾错误反抵制，在政治上具有了不对等的特性——“左”倾错误得以居高临下的反制抵制。如薄一波证实，在“反反冒进”中，被批评者“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sup>⑪</sup>因为事实上陈云是中共最高决策层中长期不懈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之一，故而必然地成为“左”倾错误反抵制首当其冲、居高临下集中攻讦的目标。而且“陈云一贯右倾”也清楚地证明陈云一贯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的史实。

清晰可见，“陈云一贯右倾”既是“左”倾错误集中攻讦陈云的号召，也是反抵制旗帜，又从反面显现陈云一贯抵制“左”倾错误的史实。这就是“陈云一贯右倾”的本质。

## 二、抵制“左”倾错误的中流砥柱

“陈云一贯右倾”是对客观存在扭曲认识积淀所成的并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观念。但“陈云一贯右倾”的长期影响，不会因为呼吁“推倒”或发文件宣布平反昭雪，就能一旦消释。“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sup>⑫</sup>事实是承载物本质的基本单元，所以还原事实本来面目，乃是矫正错误观念、消除影响的根本途径。还原标志“左”倾错误发作过程从经济方面遭遇抵制史实的重大节点，“陈云一贯右倾”——抵制“左”倾错误的真相就会明白显露。

### （一）抵制“左”倾错误重大关节标识一贯的中坚

1. 坚持按比例发展法则“反冒进”。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是社会化生产内在的客观规律。陈云主政全境解放的东北经济期间，即已形成全面谋划——统筹局部和全局、目前和长远——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思想架构<sup>⑬</sup>的内核。建国后，他申述并力主“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sup>⑭</sup>使然地将按比例发展思想运用于指导国民经济全程，十

分清醒地发现正在发动的大跃进悖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法则，与周恩来协力“反冒进”，力争消除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衡。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强调“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sup>⑮</sup>严厉批评“反反冒进”“离右派还差五十米”——薄一波证明：1958年“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sup>⑯</sup>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思既往说，“一九五六年的错误是不该公开反‘冒进’”。<sup>⑰</sup>新中国史上最高决策层在经济领域的“反冒进”和“反反冒进”——抵制“左”倾错误的一场颇大战役，以“不该公开反‘冒进’”告一段落。

2. 抵制“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是新中国史上“左”倾错误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危害深远的大规模实践。1980年4月，邓小平谈到决策大跃进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sup>⑱</sup>显然，“没有反对”是同意，而“没有说话”是不同意。毛泽东指出，陈云对大跃进的高指标明确反对态度。或因陈云再三力陈，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已从3000万吨降至1800万吨。但陈云基于算细账结果的支持，明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1959年18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完不成，当降为1300万吨，并强调“我们必须依据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办事”。<sup>⑲</sup>《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将大跃进高指标列为“左”倾错误四大标志（排序为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第一标志。否定大跃进的高指标，事实上毫无意义是对“左”倾错误抵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肯定陈云屡次明确提出否定关于大跃进高指标、及不公布高指标的意见，说“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sup>⑳</sup>虽然大跃进因于惯性未能紧急刹车，但这无疑是在“左”倾错误仍然居于指导思想地位大势之下，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理论意义上的胜利。

3. 消除“大跃进”消极后果的巨大成功。长期参与最高决策咨询的薛暮桥回忆说，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包括我和邓力群、许

明等同志)曾窃窃私议,说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国民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或迅速恢复生机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国绝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的共同意见。”<sup>②</sup>在大跃进引发的后果严重到了危及政权的程度<sup>③</sup>之下,陈云再度受命主政经济。1962年2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若干办法》讲话,统揽国民经济困难的五个方面,<sup>④</sup>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六项措施。<sup>⑤</sup>中共中央于1962年3月18日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三个讲话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反响很大,纷纷要求扩大传达范围。四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补充通知,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这三个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对大家认识全局,正视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也坚定了全党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sup>⑥</sup>陈云逝世后的讣告盖棺论定,评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努力下,使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同志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sup>⑦</sup>显然,由“左”倾错误奠基的指导思想继续之下,矫正“左”倾错误重大胜利。

4. 遏止“新的大跃进”。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陈云从政治层面大力度推动矫正左倾错误纵深的同时,面对新的大跃进即已成议<sup>⑧</sup>的实际,与李先念联名致信党中央,明确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待上调整过来。”<sup>⑨</sup>警示“经济建设要脚

踏实地”,<sup>⑩</sup>“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sup>⑪</sup>党中央接受陈云的一系列主张,清醒的主动实施调整国民经济方略,避免再度出现大的马鞍形,步入了平稳发展轨道,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

抵制“左”倾错误重大关节的史实证明,陈云是“一贯右倾”,坚持始终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和中坚。

## (二)抵制“左”倾错误的中流砥柱

新中国史上,“左”倾错误从发生到转化为指导思想,延续到拨乱反正被纠正,是一个逐渐发展和不断受到抵制的过程。在“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下的决策因为脱离实际,具有普遍的危害性,所以从形成、贯彻之初就受到了从群众到干部、从地方到中央的群体性抵制,构成多层次的、从局部到全局的长期过程。陈云则是坚持自“左”倾错误发生到全面纠正始终的中坚。继陈云抵制“左”倾错误历“反冒进”等重大事件后,彭德怀、张闻天等在庐山会议上公开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反响剧烈空前。虽然他们也是抵制“左”倾错误先驱群体的重要代表,但既因为他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地位的局限,也因为他们在1959年即被政治上打倒,事实上并未成为抵制“左”倾错误的中流砥柱。陈云则是长期坚持抵制“左”倾错误,直至全面拨乱反正的中流砥柱。因为:(1)坚定不移“只唯实”的理论坚定性,及行使主政经济使命直系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刚性规定,必然地使陈云成为中共最高决策层内始终保持清醒,且坚持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不动摇的领导人。(2)陈云的正确思想转化成为决策虽然十分艰难,但他毕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其思想能够直接达到最高决策层,在化解历次危难之际转化为决策,不仅极大地支持扭转当时危局,无可置辩地成为矫正“左”倾错误的中流砥柱,而且为他后来再度居闲后正确主张再次转化为决策奠定了基础,再次彰显他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中流砥柱的地位。(3)睿智的方法屏障稳步深入。陈云十分关注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左”倾错误事,<sup>⑫</sup>但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目标集中指向陷于吃饭穿

衣困境、危及政权稳定的经济大政,从殚精竭虑解决燃眉之急的重大问题入手,并不笼统地作扩大反抵制幅面而矫正“左”倾错误效益低的类“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批评。如他在“大跃进”初发之时即予抵制,但就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之理服人,以按比例综合平衡为理论支持,又依钢铁生产内部及其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比例失调为据,力主降低高指标;揭示国民经济发生和陷于严重困难的经济根源,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承受力,缓解农业压力,必须“伤筋动骨”砍基本建设;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合理的比例关系,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实现平衡,既因为陈云的正确主张是摆脱困境不二的选择,也因为重视农业、以农业为基础,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而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所以,陈云抵制“左”倾错误不仅持久继续,事实上成为抵制“左”倾错误的中流砥柱,而且他的主张在“左”的错误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还能部分地得到贯彻,不仅相当大限度地降低了“左”倾错误为害程度,而且使抵制“左”倾错误得以艰难继续,直至总体上拨乱反正。事实十分清楚,陈云是抵制“左”倾错误坚持始终的中流砥柱。

“假作真时真亦假”。廓清“陈云一贯右倾”的实质,则可见其若地质罗盘仪的水平刻度盘发生错位时,指针标识方位与实际方位发生错乱,状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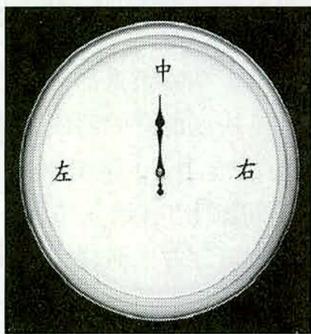


图-1:指针处于中位,指针与刻度盘标识方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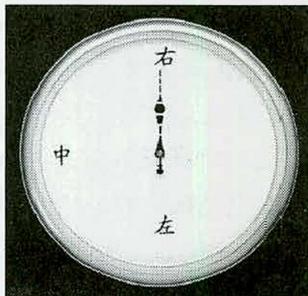


图-2:刻度盘左转90°,指针标识方位实际偏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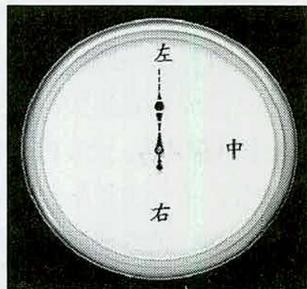


图-3:刻度盘右转90°,指针标识方位实际偏左

“陈云一贯右倾”乃如图-2左居中时中亦右。

朱佳木著述记载他与陈云关于陈云“右”或“左”问题的谈话,说: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陈云同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sup>③</sup>

### 三、中流砥柱是这样铸成的

陈云何以“只唯实”矢志不移,成为抵制“左”倾错误的中流砥柱?

#### (一)“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

有论者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和毛泽东一样,都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sup>④</sup>但此说取舍史料有失确当,致模糊陈云抵制“左”倾错误坚定所以铸成的重要根源。据权威官书《陈云传》载:在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错误发生发之时,陈云“在总体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还没有认识清楚。这导致他后来在工作中仍执行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主张”。<sup>⑤</sup>“但是,江苏省委积极执行‘左’倾冒险计划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几年来艰苦积聚起来的那点革命力量受到

严重摧残。”<sup>①</sup>陈云受命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周边的淞浦等地领导建立农民革命军，发动的多次发动武装暴动，<sup>②</sup>均告失败，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吴志喜、陆龙飞遭杀害。“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sup>③</sup>陈云汲取既往教训，——“比如罢工问题，我在一九三三年离开上海前，受了盲动主义影响，认为工人去工厂似乎不是为了吃穿，而是为了罢工，而且要一直罢到底，从工厂里罢出来。其实，该不该罢工，不应听书本上和别人讲什么‘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资本主义动摇崩溃’，而应看对工人有利还是么有利。”“要保证以后不再犯错误，就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要革命者的责任心去分清是非，弄清问题。”<sup>④</sup>——较早地认识到了“左”倾路线脱离实际的关键所在，“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sup>⑤</sup>确立了以“只唯实”奠基的认识论。

## （二）“唯实”矫正“左”倾错误

重大事件是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也是标识思想发展轨迹的界碑。1933年1月，陈云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视察苏区的工人运动，发现存在忽视工人最迫切的经济利益危险右的错误倾向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sup>⑥</sup>他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期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指出“党必须清楚地估计到，工人经济斗争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对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莫大的危险。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地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在每个斗争中去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工人参加苏维埃建设和革命战争，以巩固工农联合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合中的领导权，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sup>⑦</sup>针对中央苏区职工会领导工人与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普遍存在“左”倾主义错误——如店员和木船工人都机械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日休息等有些就连工人也感觉到难于实行的条文，陈云在《斗争》第18期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详细介绍是年汀州京果业订立

劳动合同，坚持从实际出发原则的作法。强调排除不切实际过高要求的“左”倾错误，订立符合实际的雇佣双方都可履行，能够实际实行的劳动合同。一要全面了解、掌握企业的实际情况，二要以党支部为中心动员和组织签订合同，三要订立适合于汀州京果业目前情形的有弹性的合同。

从组织上服从、行动上积极执行，转变到在职权范围自觉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标志陈云已经决绝“左”倾错误路线，奠定了继续深刻反思“左”倾错误路线和确立“唯实”方法论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作《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同时汇报的还有陈潭秋和潘汉年。”<sup>⑧</sup>关于消灭富农阶级和对待商人问题上的错误，由其他人专题报告。陈云作为遵义会议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唯一在场的常委，从检讨“左”倾路线主要错误的全局指出，“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这个任务。我们在对待商人问题上也犯有错误。”<sup>⑨</sup>在此场合检讨中共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错误问题，清楚显示陈云反思“左”倾错误的探索，已经深入到了不仅仅局限于中共领导层的更高层次。——史料显示，中共所以发生“消灭富农阶级”失误，直接渊源于“唯上”——共产国际之命。1929年6月共产国际发指示给中共中央，“批评中共六大‘不故意反对富农’的策略。中共中央在8月作出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开展反对富农的斗争。”“各级党部按照本地实际的情形，依根据这一决议的总的路线决定具体的明确的策略”。<sup>⑩</sup>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的场合，检讨中共在富农政策问题上“有错误”，标识包括陈云的中共高层核心反思“左”倾错误路线的组织渊源，已形成了颇深认识。

## （三）毛泽东助推陈云的“唯实”观飞跃

毛泽东揭示认识与实践辩证发展规律，“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

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sup>⑥</sup>陈云以“唯实”观为核心的方法论发展,也是认识-实践-理论-实践的辩证运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断绝粮饷并实施封锁,引爆经济危机之际,毛泽东高度关注扭转陕甘宁边区经济危局。1942年8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后,陈云的人生产方面”。<sup>⑦</sup>在经济危机重心转移至财政金融领域,蓄势恶性爆发之际,“1943年3月,毛泽东为照顾陈云养病,将他从杨家岭迁至毛泽东的住地枣园居住。陈云在此治疗休养了一年。”<sup>⑧</sup>此间,毛泽东与陈云深入谋划经济大政,思想方法乃是毛-陈“枣园对”水首当其冲的内容。——1947年,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自己在枣园治疗休养期间,再次讨教毛泽东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毛泽东告诉要学点哲学,所以犯错误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sup>⑨</sup>“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sup>⑩</sup>十分清楚,陈云的“唯实”观,因神会实事求是精髓催化,实现从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凝成稳定的方法论,经指导陕甘宁边区创造巨大成功于危难实践的验证、充实完成第二次飞跃,提炼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sup>⑪</sup>“十五字诀”。并坚持贯彻后来长期实践的始终,每当关系全局重大决策的紧要关头,他都强调“十五字诀”,把思想方法搞对头。<sup>⑫</sup>

汲取亲历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屡遭失败的教训形成“唯实”观,并为毛泽东助推,实现飞跃,形成稳定方法论,在实际运用中验证、丰富,实现从理到实践再次飞跃,概括为“十五字诀”,并坚持贯彻始终,实践-理论-实践-理论辩证运动,否定之否定升华成为矢志不移规范行为的思想方法论。“陈云一贯右倾”——抵制“左”倾错误巍然矗立的中流砥柱,就是这样铸成的。

①胡平:《改革开放亲历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②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③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第148页。

④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第148页。

⑤朱佳木为侯树栋主编《一代伟人陈云》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⑥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92、1493页。

⑦例如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发动“大跃进”(上)》。

⑧李乔:《推倒“陈云一贯右倾”之说》,《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8日,第20版。

⑨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06页。

⑩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第376页。

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文选》第1卷,第343页。

⑫【美】大卫·M·贝奇曼:《陈云》,孙业礼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⑬张曙光:《评书论人和不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⑭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第1493页。

⑮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第13页。

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

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54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⑯因为陈云在这里的述论,(1)主要是工业而未覆盖全局,(2)陈云综合平衡论、农业基础论、方法论等逐步完成与新中国,故称为架构。——《陈云文选》第1卷,第366页。

⑰《陈云文选》第2卷,第241-242页。

⑱《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

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2页。

㉑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第22页。

㉒《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㉓《陈云文选》第3卷,第137页。

㉔《陈云年谱》下卷,第13页。

㉕薛暮桥:《杰出的经济工作者——陈云同志》,《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㉖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第210页。

㉗农业有很大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用多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导致了通货膨胀;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㉘即: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应把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㉙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第116-117页。

㉚《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人民日报》,1994年4月16日第1版。

㉛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包括30个大电站、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化纤厂、十大化工厂等。

㉜《陈云文选》第3卷,第248页。

㉝《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页。

㉞《陈云文选》第3卷,第281页。

㉟1960年6月,陈云“在上海瑞金宾馆回见彭德怀并合影留念”;1979年“8月25日,出席并主持张闻天追悼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此前,中央安排追悼会时,陈云正在杭州。他表示要参加追悼会,希望把时间安排到他回北京后。”——见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第35页、第249-250页。

㊱朱佳木为侯树栋主编:《一代伟人陈云》序言,第14页。

㊲王玉贵:《毛泽东与陈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㊳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第79页。

㊴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第91页。

㊵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第43-51页。

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㊷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第415-416页。

㊸《陈云文选》第1卷,第346页。

㊹《陈云文选》第1卷,第9页。

㊺《陈云文选》第1卷,第11-12页。

㊻罗燕明:《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04期。

㊼《陈云文集》第1卷,第31-32页。

㊽转引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第67页。

㊾《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㊿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第376页。

①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第361页。

②《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

③1956年,在“反冒进”和“反反冒进”尚未最后结论之际,陈云强调“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

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重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46页)——1962年,在“大跃进”既成严重后果之际,陈云再次强调,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全面把握事实,矫正认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陈云文选》第3卷,第189页)——1977年9月2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

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1987年,陈云与党中央负责同志专门谈学习哲学问题,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中学,终身受用”。(《陈云文选》第3卷,第361、362页)——1990年1月,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又一次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唯物辩证法的问题,说:“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文选》第3卷,第371页)



## 甘肃历代方志目录整理情况研究

马新建

**内容提要:**甘肃历代方志,见诸《陇右方志录》及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甘肃方志通览》,存志收藏在上述目录所记的图书馆,少数存于甘肃民间。诸目录,各有优短;读新修一轮志书,方志有失载、记述有讹误。甘肃地方志目录整理,一是理清历次方志目录整理情况,二是搞清历次方志目录整理的特点及不足,三是辨证考订错误,继承创新,编著新的提要式目录。

**关键词:**甘肃地方志目录 辨证 编著

甘肃地方志,从起源的先秦、西汉地图算起,已有 2250 多年的历史,历魏晋南北朝的初期形式玄石图、旧事、地记、人物志、异物志、耆旧传、实录,隋唐五代图记、图经、别录、地志、族志、土境、新录等;宋代补遗、古今记、续记、州县志,甘肃方志基本定型,元代即定型。明代出现边图、图说、郡记、郡志、漫记、汇记、考略、略记、纪变,府、镇、都司、卫、所、山志;清代种类繁多,产生省、厅、分县、县丞、乡镇、寺、书院志,轶志,采访志,乡土志,风土记,载笔,随笔,杂钞,水编,便览,续实录,备考,遗事历鉴,赋役全书,乡彦传,纪略,忠义录,采访录,采访事略,采访底本,记实录,地理调查表;民国出现杂志、小志、国志、国考、镇考、地名考、土司录、设治记,见闻记、录,调查录,乡土教材稿,乡土讲义,风土志,灾情记,要览,盐法、水利、方言、石窟、煤田、植物志专志。从战国秦王嬴政八年(前 239 年)《秦邽县地理全图》<sup>①</sup>到止于 1964 年完成的下限民国 38 年的《甘谷县志

稿》<sup>②</sup>,总计产生方志近 500 种。战国木板地图,存;西汉纸地图,存残图;三国魏晋十六国南北朝地记等 20 多种全佚;隋唐五代 20 多种,存地志图经族志等残卷 6 种、地境 2 种;宋元图志 20 多种全佚;明代 100 余种,存郡府镇州县卫志等 22 种;清代 210 多种,存省府镇州县卫所厅分县县丞山寺书院志等 180 种;民国 120 多种,存省府州县乡镇志、乡土志、国志国考镇考土司录、专志等 118 种;止 1964 年完成的下限民国 38 年的县志存 2 种。存志包括残卷本(图)不少于 330 种。笔者在对甘肃地方志类文献的认识逐步加深,特别是通过对各图书馆藏甘肃地方志文献的搜索、整理和利用工作,新修一轮志书记述的地方志进行研究认为:甘肃应当有自己清楚掌握情况的方志藏书网络体系和书目体系,在理清馆藏历代方志的基础上,搞清历次方志目录整理及其特点,分析清楚目录整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知优短,继承创新,编著新的提要式目录。编著一省新的历代方志目录是现实需要。

### 一、甘肃近代以来对历代方志目录的研究整理

甘肃历代方志目录,在明志中已见端倪,如董继舒纂崇祯《镇原县志》序云:“有明一代,甘肃诸志推胡可泉《秦安志》,赵浚谷《平凉志》,巩焞、巩尔盘同修之《真宁志》。”<sup>③</sup>清代,张澍考证辑佚旧志。至近代以来,代表性的 4 家:民国张维编著《陇右方志录》及补;1985 年以后出版的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甘肃方志通览》。经历代学人努力,甘肃方志目录的研究整理颇有成效。

### (一)《陇右方志录》及《陇右方志录补》

1934年北平大北印书局印行的张维《陇右方志录》，按省、郡、县、杂古今志4类，收录甘宁青历史上产生的自晋至1932年的杂古今志和省、府、州、县编纂的地方志293部。其中，甘肃254部。张维又遵前书体例，将截止1941年寻录的自三国魏至前述年份的36部方志编为《陇右方志录补》，1943年由北平大北印书局印行。其中，甘肃方志31部。《陇右方志录》及补，佚、存志均录，有甘肃存志149部。此存志中的一部分，是1928年张维任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长时，呈请省政府转令各县征集的志书及其此后民国期间各县充实来的馆藏；其它见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等。

### (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中科院北京天文台主编，庄威凤、朱士嘉、冯宝琳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甘肃自唐开元至1949年存志197部。见藏于北京、甘肃、天津、上海、山西、内蒙、辽宁、吉林、宁夏、青海、新疆、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省市图书馆及省市区境内图书馆、博物馆，石家庄、南京、广东中山等图书馆，哈尔滨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开元图经写本存法国巴黎，嘉靖庆阳府志刻本、万历临洮府志刻本存日本国会图书馆，顺治秦州志刻本、光绪镇番县乡土志抄本分别存日本内阁、东洋文库。

### (三)《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

1996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易雪梅、刘瑛编《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收录甘肃自唐开元《沙州都督府图经》至1948年存志219部。其中有清代张澍辑《凉州异物志》等、民国冯国瑞辑《秦州记》，均为馆藏。

### (四)《甘肃方志通览》

2007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郝玉屏主编，高子贵、金钰铭副主编的《甘肃方志通览·甘肃古今方志编修系年录》，收录甘肃自三国魏至1964年完成下限民国38年的佚、存志412种<sup>④</sup>。其中存志300余种。存志除见藏于上述图书馆外，甘肃、陕

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敦煌研究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图书馆馆藏，甘肃省内天水市等较大图书馆、武山、镇原县等市县图书馆馆藏；甘南州，甘谷、成县、静宁、永登、安西县等州县档案馆馆藏，定西市安定区、陇西等区县文化馆馆藏；存天水、平凉等市地方志办公室，西和、华亭等县地方志办公室，武山、甘谷、秦安等县民间，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等。

## 二、历代甘肃方志目录研究整理的特点和不足

### (一)特点

《陇右方志录》及补收录范围广、学术性强。张维在《陇右方志录·序》中言：“自人之有群也，其经营事状，常有以继往而开来，记载此事状以诏于后人，惟史之赖。分析愈微，则记载愈详，事状乃愈真。自国而省而县，是分析之微也，详而能真，惟方志兼之。故规一国之文化，求之史毋宁求之方志……未时或息，幽之为卦向，显之为礼乐，化之为风俗，蔚之为制度文物，发散之为事功文章。生乎今之世，而欲观其粲然者，方志是已。”<sup>⑤</sup>《陇右方志录》及补除收省、府、州、厅、县、卫、所志，乡土志外；杂古今志的图志、方物、耆旧、山川4类中包括图经、都司志、异物志、人物志、实录、耆旧传、山志等，还收方志初稿性质的备采录，收录范围广、种类多。以时代为次，考志书年代、卷册、版本、著者、卷目、存佚情况等，录介方志纲领内容并以按语评议。类例分明，考评精深得当。评议大者建置沿革错误、山川地理失实、人物收录不准、记事叙物不确、体例归属不当，小者修纂者自附其传于志等，分析在理，考之有据，直言志书，指出弊端，赞优纠误，一分为二，客观公允，学术性强。既是目录，近似解题，又将学术思想观点见解贯穿其中。从自序及著录方志评述中反映出张维的学术思想概略：方志起源多源说为方志发展的实际情况，雏形形成于西晋，图经为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方志存史事关下层社会民生，对历史规律有认知价值；方志编修要因时、与时俱进，重视资料，听取学界意见。张维对方志领域的弊端有深刻认识，《陇右方志录·序》中指归为“四蔽六习”，四蔽：蔽古疏今；蔽文略质；蔽人轻事；蔽钞撮丧系统。六习：习

天官,著星野事应;习堪舆,著龙脉结穴;习神仙,著神话传闻;习辞章,著诗赋言辞;习方輿胜览,著八景十景;习通鉴纲目,著褒贬删削<sup>⑥</sup>。值得修志者引以为戒。《陇右方志录》及补是我国较早的区域性方志目录,甘肃开先河的第一部总结性历代方志目录。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著作,至今仍是整理西北地方文献的有力的工具。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版本、馆藏信息完备。就甘肃方志而言,除收省、府、州、厅、县、卫志,乡土志外;还收乡镇志,增收方志初稿性质的采访、调查录,便览、要览。山志等未收。省内以府、州、县、乡为序,乡土志、乡镇志随所属县后,同一地区的方志则按编纂年代先后排列。著录项目有纪年、书名、卷数、修纂者、版本、藏书单位、备注。版本及其胶卷注明藏处、藏书单位注明卷数存佚,凡卷数分合、记事起讫,地名古今变迁、书名异称,流落异域孤本的国别与收藏单位等都备注说明。书末附书名索引。甘肃部分共著录方志及方志资料197部,其中将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五凉全志》)中的武威、镇番(今民勤)、永昌、古浪、平番(今永登)县志单列为5部县志;省府镇州厅县卫分县县丞乡镇志171部,乡土志8部,便览要览5部,采访事迹事略稿风土调查录10部,汇记设治记实录3部。收甘肃存志比《陇右方志录》及补多48部。以其内容系统完整实用,注明收藏单位多,版本、馆藏信息完备,对了解存志的出版、流传和收藏情况增加了便利,受到广泛好评,成为方志研究最常用的工具书之一。

《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集中收录甘肃存志较多。著录项目有志名、卷数、修纂者、版本、册数、索书号、附注。增收部分史料或记载地方掌故的杂记、杂考。订正《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甘肃部分,比其多收甘肃存志22部。

《甘肃方志通览》系统总结甘肃方志编修,较诸目录所录甘肃方志最多。全书分绪论、上编、中编、下编、附编5部分。绪论概要叙述甘肃的自然地理、建置区划和历代修志;上编综述甘肃修志历史,从初期的地记到隋唐的图经、宋元的定型方志、明清的修志高潮、民国修志的赓续,直到社会

主义时期的两次修志;中编对首轮新方志分省志,市州志,县(市)志,城市区志,逐一地进行分析评介;下编为甘肃古今方志编修系年录,分旧志系年录和新志要事录两部分;附编选编了明清、民国和新编方志的修志文献。全书以叙述为主,有叙有论,沿甘肃修志主线,通览古今。总结了甘肃省方志修纂的历史、现状,梳理、分析了现存的甘肃古代、近代方志,详细介绍了新旧重点志书的优长、特点,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1984年以来一部盘点集中、系统展示甘肃方志编修、存佚情况的专著,有学术、实用价值。其下编甘肃古今方志编修系年录中的旧志编修系年录所录甘肃存志比《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增加近100种,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亦有订正。增收赋役全书、地理调查表等。

##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陇右方志录》及补因交通信息等的限制,失收方志较多,存在舛误。《陇右方志录》及补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以前,所录是1941年以前的志书,当时的甘肃,交通不畅、信息闭塞。在如此条件下,张维作出了创见之举。后人不能苛求民国时的先辈,由于上述原因的限制,张维未见、未著录方志较多。如将康熙《秦边记略》列入佚目<sup>⑦</sup>。按《陇右方志录》的收录种类标准,1941年以前的甘肃方志遗漏失收的有100多种。张维以其求一方文化,求之史毋宁求之于方志的精神,搜集钩沉方志,仍因前故,难免存在一些舛误。如把梁明翰修,傅学礼主纂的嘉靖《庆阳府志》记为王福等修<sup>⑧</sup>;王福等纂成的是成化《重修庆阳府志》。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失载志书,乡土志类收书范围窄,遗漏误差不少。该《目录》由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的众多工作人员参与编辑。诚如洪斯溢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由于本目录涉及的面较广,参加的单位多,工作量大,加之编者集中编辑的时间短,因而存在不少缺点。如编例不够统一、目录与实际馆藏或有不符甚至遗漏、错误等情况”。<sup>⑨</sup>因研究甘肃旧志,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种类标准,校读甘肃部分,经过几年

的内查和外访,仅就所能见到的方志与该书著录的内容逐条校勘,发现其有遗漏,著录纂修、刻本时间错误,不记志书编印时间,纂修人、卷数确定不当等问题。如把嘉靖清渭草堂刻本《巩郡记》残本 20 卷<sup>⑩</sup>,按《明史·艺文志》著录为 30 卷;嘉靖四十三年刻本《徽郡志》<sup>⑪</sup>,记为嘉靖四十二年;顺治十四年刻本《秦州志》<sup>⑫</sup>,记为顺治十一年;康熙四十九年刻本《宁远县志》<sup>⑬</sup>(宁远,今武山县),记为康熙四十八年;恩福修、陈自新协修,林映川参正,冒蕖编纂完成道光《续修金县志》<sup>⑭</sup>(金县,今榆中),不述协修者等名;宣统元年杨清等纂成《河州续志稿》<sup>⑮</sup>(《河州采访事迹》,河州即今临夏),记为张庭武纂,张是修者;始修于民国 12 年,王楨、许以栗、张津修,民国 22 年孙文俊、马兆蕃纂成《礼县新志》,记为清孙文俊纂,不述修者、协纂名<sup>⑯</sup>;《天水小志》不记志书编成、油印时间<sup>⑰</sup>,等。限于篇幅,仅简述大的不足与问题一二:一是遗录失载自唐《沙州地志》至下限 1949 年志书 50 余种。二是除乡土志失收(如民国《皋兰县风土志》)外,由于编者对乡土志的不同理解,乡土志类收书范围窄。乡土志是清末进行教育改革,在初等小学堂开展乡土教育的直接后果。晚清学部还于 1905 年下发《乡土志例目》进行范式推广,把乡土教材的内容分为历史、地理、格致三个方面,基本框架规定为历史、政迹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 15 门<sup>⑱</sup>,内容与传统方志接近。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将具备上述方面例目内容的乡土、蒙学教材未收录。如民国《天水乡土教材稿》、《天水三字经》等。

《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失收史料或杂记、杂考。收录甘肃存志 219 部,其中 7 种是把 2 部志书分卷或分志展开,即同样将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五凉全志》)单列为 5 部县志,又把民国《增修华亭县志》中的人物志等单列为另 2 部志书。易雪梅在《前言》中说:“编辑此书时鉴于西北边疆地区纂修书目无多,加之战争和民族变迁、自然灾害等原因,部分区域的方志存世的较少,特将部分史料或记载地方掌故的杂记、杂考,如记录北宋时青唐(今西宁)战争的宋代李远、汪

藻二人纂的两部《青唐录》及民国时期的《今日新疆》、《宁夏省考察记》、《最近之青海》等文献一并收入。”<sup>⑲</sup>此言符合实际,民国以前,不仅宁夏、青海、新疆战乱、灾害频仍,甘肃亦如此,纂修的书目也不算多。存世的此类书,如民国《甘乱杂志》等史料或杂记、杂考未收录。

《甘肃方志通览》旧志编修系年录有的记所引书目、卷册、门类、脱稿刻印时间、简介简评、馆藏,但相当一部分仅记纪年、志名、佚存、修纂者、“有存”,有存何地? 不详馆藏;明代纪年不明确的,都放在崇祯十四年,清乾隆纪年不明确的,皆放在年号最后,民国放在 38 年;《甘肃历代修志分类统计表》<sup>⑳</sup>注明志“仅存十余部”,清、民国志“大部有存”,存数不清;有的志书重复,如宣统三年张掖知县李含青纂修成《张掖县乡土志》,既记在宣统三年,又记在民国 38 年<sup>㉑</sup>;并有“待访”。照搬《陇右方志录》、新修一轮志书舛误,如仍把梁明翰修,傅学礼主纂的嘉靖《庆阳府志》记为王福等纂,清康熙《秦边记略》记为“已佚”;把任廷颺纂民国《重修甘谷县新志稿》记为《伏羌县志》,“已佚”,错写纂修者名<sup>㉒</sup>。纪年不准,如将万历十三年纂成《崆峒山志》<sup>㉓</sup>,误记为万历十七年修;康熙二十六年纂修成的《成县志》、《西和县志》<sup>㉔</sup>,分别误记为康熙三十六年、五十六年修;张澍道光年间撰成《凉州府志备考》<sup>㉕</sup>,误记光绪年间。不考证而误记纂修者,如将《重修正宁县志》的纂修者,会宁籍正宁县长苏绍泉<sup>㉖</sup>,记为苏眼泉。失收自唐至民国方志较多。如开元《敦煌名族志》(写本,收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6 册,原件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民国《静宁县新志》、《文县风土调查录》、《永昌县采访录》、《临洮要览》等,按收录种类标准不少于 60 部。

一轮新修志都记载了本地地方志。有些一轮地区市州志、县志,地方志史记述不清,且有错误。按理说这两级志书在纂修时,应掌握、起码知晓本区域内历史上纂修或产生的方志,其实不然,底子不清,失收失载。前述目录未记入者,多不载。陇东某志未记入明成化、万历,清顺治《镇原县志》等;某州志未记入嘉庆《拉卜楞寺志》等;《天水市志》未记入《晋太康秦地记》等;河西某志未记入三国

魏《张掖郡玄石图》等不少方志,以上出版于2010年之前。此后出版的地区志亦未记入唐《安定图经》等。这部分一轮新方志失载旧志不少于36种。现有目录失收的,新志不载;现有目录收录的,是经考证史有其书,新志不载,断裂历史。这让人想起金恩辉在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2005年12月22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录的方志,有些在编撰《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时就因佚失而未能收入,两书时距才几年时间,根据这种情况估计,现在比《总目提要》问世时,旧志的损失可能有一个百分点。”<sup>⑨</sup>新志失载旧志;两种时距几年的目录,前收志佚损,后者已不能收入。颇有异曲同工之遇,也有无可奈何之感。不仅如此,新修志书介绍旧志及纂修者尚有错误。如《天水市志》将嘉靖《秦安志》陈瀛跋错记为耿尚义,康熙《宁远县志》45目误记为43目<sup>⑩</sup>,等。这些错误须纠正,否则,像《甘肃方志通览》照搬《陇右方志录》、新修一轮志讹误一样,会以讹传讹。二轮志须纠讹补遗。这些问题从另一方面说明编著一省新的历代方志目录是现实需要,更有传承一方历史文化的深远意义。

### 三、提升甘肃方志目录整理的实际设想

前述方志目录的编撰为地方史及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功不可没的极大便利,同时为今后方志及目录的整理打下了良好基础。经对4家有代表性的方志目录的具体分析,既知其优长,也知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今日甘肃,须编更加完整的方志目录。

(一)继承前人成果,完善成为网罗截止目前已发现方志的新目录

《陇右方志录》分类可以有调整地继承,《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版本、馆藏信息可资采备,《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全部收录,《甘肃方志通览》旧志编修系年录所录,除其重复、“待访”而无考据者等外,收录;4家逐步增收的种类全部继承。继承前人,客观地展现甘肃历史文化及其地方志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再大量补充,完善成为网罗截止目前已发现方志的新目录。甘肃存留下来的各种类旧志包括残卷本(图),按《陇右方志录》

分4类收录。省志类,增收记略、水编、纪略、忠义录传、记实录、杂志,以甘肃命名独立完成的专志;通志的分志不单列记录。明代河西是军政合一的卫镇建置,不同于内地的府州县;因此,变郡志为府镇州(直隶州)都司志类。州(散州)县志仍之。古今杂志,按现今区划的历史沿革,相应列入府镇州都司志、或州县志;山、寺、书院、水利、方言、煤田、植物志等专志,列放所在地县志之下;不能列入前述范围内的,视为古今杂志。继承,尊重前人辛苦不易地劳动成果,调整、补充意味着有所创新。

### (二)编著一省方志提要

新目录的体例应该是提要式。凡今甘肃境域诸旧志皆提要录入,使之比较完整地呈现一省方志的起源、初期形式、发展过程、体例体裁比较完善乃至成熟定型、形成编修高潮,继承和变化的脉络,勾勒出历史进程。除省志类外,按现今市州分块介绍,呈现一地直观。诸志各冠纪年年号,年号不详,冠以朝代,朝代无考者,缺;志书皆录其类目、纲目;根据考证,说明存佚情况;佚志以考证资信。主持修志者称修、执笔纂述者称纂,修、纂者不止一人的,均记入,以资考信;修者兼主纂称纂修,私修者称纂;修、纂者姓名,除原志列修志职名外,并参照序跋,若书面缺失,或缺载修、纂人,则参考原志及其他有关资料,尽可能补出,考查不出,注明未详。因事因志系人,对于甘肃方志修纂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的贡献,重点记述;志书的得失,采取客观谨慎的态度,根据需要,援引前人评价,记入该志评介,若有见解,按语说明,力求中肯。引证文字,皆取于修纂志书有关系者,或全录或节录,编写中参考的文献,在书后逐一列名。

提要内容。1.志名卷数。包括纪年、志名、卷册数,纪年用“[]”括起。2.修、纂、刊行者名。3.内容提要。一是修纂者小传。包括名字号、生卒年、籍贯、科第、主要履历,生卒年用“()”括起,履历中要说明与地方志修纂的关系。二是地方志修纂。包括缘起、过程、成书及刊刻发行的时间。三是方志主要内容介绍。包括门类类目或卷次、评价,详列类目或卷次,重点介绍认为有价值的篇目、作出比较精深的学术评价。四是方志版本、馆藏、存佚情况。依

据卷端著录志名,还要说明其书名的著录依据;著录已知、现存全部版本信息及对应的馆藏。

(作者单位: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

① 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第5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天水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水市志》,第2067~2068页,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版本下同。

③ 董继舒:崇祯《镇原县志》,卷首序,刻本。

④ 郝玉屏、高子贵、金钰铭:《甘肃方志通览》,第100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版本下同。

⑤ 张维:《陇右方志录》,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西北史地文献》第77卷第488页,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序本。版本下同。

⑥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489页。

⑦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734~735页。

⑧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522~523页。

⑨ 庄威风、朱士嘉、冯宝琳:《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前言,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版。版本下同。

⑩ 郝玉屏、高子贵、金钰铭:《甘肃方志通览》,第581页。

⑪ 郝玉屏、高子贵、金钰铭:《甘肃方志通览》,第582页。

⑫ 天水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水市志》,第2057~2058页。

⑬ 天水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水市志》,第2069页。

⑭ 郝玉屏、高子贵、金钰铭:《甘肃方志通览》,第596页。

⑮ 临夏回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委会:《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492~149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⑯ 礼县志编委会:《礼县志》,第827页,陕西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⑰ 庄威风、朱士嘉、冯宝琳:《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216页。

⑱ 郝玉屏、高子贵、金钰铭:《甘肃方志通览》,第686~687页。

⑲ 易雪梅、刘瑛:《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前言第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⑳ 郝玉屏、高子贵、金钰铭:《甘肃方志通览》,第100页。

㉑ 郝玉屏、高子贵、金钰铭:《甘肃方志通览》,第600页,611页。

㉒ 郝玉屏、高子贵、金钰铭:《甘肃方志通览》,第581页,590页,602页。甘谷县志编委会:《甘谷县志》,第4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甘谷县志》在未见读任廷颺《重修甘谷县新志稿》的情况下,名该志为《伏羌县志》,并注“佚”,是为误说。

㉓ 平凉市(县级)志编委会:《平凉市志》,第897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㉔ 张维:《陇右方志录》,第641页,653页。

㉕ 张澍于道光十二年(1832)整理自己的著作,道光二十七年(1847)逝世。见武威市(县级)志编委会:《武威市志》,第80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凉州府志备考》是其生前撰成。

㉖ 会宁县地方志编委会:《会宁县志》(1990~2005),第85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㉗ 金恩辉:《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 参与地方志整理研究的经历和体会》,中国地方志网2007-12-23。又:金恩辉口述 刘永强整理《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 参与地方志整理研究的亲身经历》,《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5期,有删改。

㉘ 天水市地方志编委会:《天水市志》,第2062页,2069页。

(作者单位:天水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 《肃北县志》(1950—2010)

## 目 录

特载

概述

大事记

### 第一章 地理环境

第一节 地理位置

第二节 地质

第三节 地形地貌

第四节 土壤与植被

第五节 气候

第六节 水文

第七节 自然灾害

### 第二章 自然资源

第一节 水资源

第二节 土地资源

第三节 风能 光能资源

第四节 野生动物资源

第五节 野生植物资源

第六节 矿产资源

### 第三章 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

第一节 史前古生物及早期人类活动

第二节 建制沿革

第三节 行政区划

第四节 乡镇概况

### 第四章 人口

第一节 历史人口变化

第二节 自治县成立后人口发展

第三节 婚姻 家庭

第四节 人口生育

第五节 人口普查

### 第五章 民族 宗教

第一节 蒙古族

第二节 汉族

第三节 其他民族

第四节 民族关系

第五节 宗教

第六节 宗教事务管理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党员和党员代表大会

第三节 重大活动纪略

第四节 组织工作

第五节 宣传工作

第六节 政法综治工作

第七节 党校 党史及档案工作

第八节 统一战线工作

第九节 老干部及关心下一代工作

### 第七章 纪检 监察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党风廉政建设

第三节 违纪案件查处

第四节 纠正不正之风

### 第八章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节 依法监督

第五节 代表联系及人民信访

第六节 代表议案和意见、建议办理

第七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八节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 第九章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施政方式

第三节 主要施政成果

第四节 办公室及归口管理部门

第五节 政府法制建设

第六节 群众来信来访

## 第十章 政协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委员会

第一节 历届委员会组成及会议

第二节 县政协常务委员会

第三节 提案办理

第四节 文史资料征集

第五节 友好往来及联谊活动

## 第十一章 群众团体

第一节 工会

第二节 青少年团体

第三节 妇女联合会

第四节 贫下中农协会

第五节 工商业联合会

第六节 个体劳动者协会

第七节 残疾人联合会

第八节 消费者协会

第九节 科学技术协会

第十节 侨务委员会

第十一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第十二章 军事

第一节 驻守军警

第二节 地方军事机构

第三节 肃北县人民武装部

第四节 边防管理

第五节 “双拥”共建

第六节 兵役工作

第七节 民兵建设

第八节 民国时期重大兵事

第九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剿匪

## 第十三章 司法

第一节 公安

第二节 检察

第三节 审判

第四节 司法行政

## 第十四章 经济总情

第一节 基本建设

第二节 工农业总产值及比重

第三节 社会总产值

第四节 国内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产值比重

第五节 人均生产总值

第六节 招商引资

## 第十五章 牧农村经济

第一节 管理机构及业务单位

第二节 生产关系变革与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节 经营管理及收益分配

第四节 畜牧业

第五节 种植业

第六节 林业

第七节 水利建设

第八节 乡镇企业

## 第十六章 工业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 发展简况

第三节 工业体制

第四节 工业门类

第五节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第六节 部分企业简介

## 第十七章 交 运输邮政通讯

第一节 交通

第二节 运输

第三节 交通运输管理

第四节 邮政 电讯

第五节 移动通讯

## 第十八章 商贸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商业经营体制

第三节 经营管理

第四节 商品购销、

第五节 “三项照顾”政策

## 第十九章 粮油购销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粮油收购

第三节 粮油销售

第四节 粮油购销管理

第五节 储运加工

## 第二十章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县城建设

第三节 乡镇及牧农村建设

第四节 城建管理

第五节 环境保护

## 第二十一章 财政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管理体制

第三节 财政收入

第四节 财政支出

第五节 财政管理

## 第二十二章 税务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税制

第三节 税种 税率

第四节 税收

## 第二十三章 金融 保险

第一节 金融机构

第二节 现金收支

第三节 银行存贷款

第四节 信用社存贷款

第五节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第六节 保险

## 第二十四章 经济管理

第一节 发展计划

第二节 统计

第三节 审计

第四节 物价

第五节 工商行政管理

第六节 安全生产管理

第七节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

## 第二十五章 国土资源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土地管理

第三节 矿产资源管理

第四节 执法监察

第五节 地质灾害防治

## 第二十六章 民政

第一节 优待 抚恤

第二节 复退军人安置

第三节 救济

第四节 扶贫与社会保障

第五节 婚姻登记

第六节 政区边界问题调处

## 第二十七章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第一节 劳动就业

第二节 劳动制度和劳动管理

第三节 工资福利

第四节 干部录用与管理

第五节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第六节 机构改革与编制

第七节 离退休干部管理

**第二十八章 教育 科技**

- 第一节 基础教育
- 第二节 教师队伍
- 第三节 成人教育
- 第四节 职业技术教育
- 第五节 教育管理
- 第六节 教育经费
- 第七节 科学技术

**第二十九章 文化 体育**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群众文化
- 第三节 乌兰牧骑
- 第四节 广播
- 第五节 电影 电视
- 第六节 图书出版与发行
- 第七节 文化市场及管理
- 第八节 文史研究与遗产保护
- 第九节 体育

**第三十章 肃北蒙古族语言**

- 第一节 肃北蒙古族方言语音
- 第二节 蒙古语标准音推广使用
- 第三节 蒙文的使用

**第三十一章 文学艺术**

- 第一节 艺文创作
- 第二节 民间文学
- 第三节 民间工艺

**第三十二章 文 录**

- 第一节 诗词赋
- 第二节 散文
- 第三节 小说
- 第四节 论文
- 第五节 书画摄影
- 第六节 歌曲

**第三十三章 文物 旅游**

- 第一节 文物普查与保护
- 第二节 城堡塞墙和烽燧遗址
- 第三节 岩刻画
- 第四节 石窟 墓葬及馆藏文物
- 第五节 旅游

**第三十四章 医疗卫生**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公共卫生
- 第三节 卫生防疫
- 第四节 妇幼保健
- 第五节 蒙医蒙药
- 第六节 医疗制度
- 第七节 医药管理

**第三十五章 习 俗**

- 第一节 蒙古族习俗
- 第二节 汉族习俗
- 第三节 其他民族习俗

**第三十六章 人 物**

- 第一节 人物传略
- 第二节 人物简介
- 第三节 人物表录

**附 录**

-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撤销肃北设治局  
设立肃北自治区(县级)的决定
- 中共肃北县委肃北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  
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
- 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管理办法
-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矿产资源管理办法
-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实施《甘肃省计划  
生育条例》变通规定

**后 记**

## 阴铿：动荡离乱时代的悲情诗人

程对山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侯景之乱”的战火仍然笼罩着南中国江淮一带，梁武帝萧衍治下的帝国境内兵连祸接，生民涂地，“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是年秋天，一位孤弱的士子正携带家小，从扬州登舟，溯江而上，拟抵京师建康（现江苏南京）。沿途风餐露宿，忧兵畏盗，神惊魂惧。未至建康，侯景乱兵已经攻克吴兴（今江苏苏州）。既而兵围京师，整郡惶然。不久，梁武帝饿死台城，梁简文帝萧纲继位，朝政由侯景把持，“城关荒纪”，京师一片残败景象。面对这样的凄惨景象，这位孤弱的士子顿感时令维艰，命运困窘。于是，仰天长叹，情动于衷而形诸言，吟成一首五言诗，记下了当时的真实情状——

秩满三秋暮，舟虚一水滨。漫漫遵归道，凄凄对别津。晨风下散叶，歧路起飞尘。长岑旧知远，莱芜本自贫。被里恒容吏，正朝不系民。惟当有一犊，留持赠后人。

这位孤弱的士子，就是当时名重南梁的诗人阴铿。这首诗就是著名的《罢故郾县》。

当时，诗人正从吴兴郡故郾县（浙江吉安县）县令任上卸下，拟到建康京城近郊父亲阴子春在株陵的府邸。然而，时逢国难，生民离乱，何处才是诗人的容身之所？在这种“凄凄对别津”“歧路起风尘”的危机情势下，诗人顿感天高地迥，无所依傍，于是发出了“惟当有一犊，留持赠后人”的悲伤且无奈的喟叹。

阴铿(510—563)，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人，南北朝梁末陈初时期优秀诗人。其诗在有唐一代曾产生过一定影响。诗人杜甫称赞李白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他自己也是“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的，足见杜甫对阴铿极为推崇。

据《南史·阴子春传》载，“阴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藏人也。晋义熙末，曾祖袭随宋武帝南迁至南平，因家焉。”阴铿高祖阴袭原在长安供职，后随宋武帝南来，定居南平（湖南安乡县）。梁高祖萧衍创建南梁帝国时，阴铿父亲阴子春为宣惠将军，才举家迁至建康近郊株陵。南北朝时期，由于严酷的门阀制度，士族（贵族）与庶族（寒门）之间的差距非常大。门阀制度特别规定，寒门士子必须待到“过立”即三十岁或过三十岁，才有资格“释褐”出仕为官。阴子春虽然几代官居朝中显职，家族地位却不能轻易变更为士族，这样的时代属性，就为阴铿后世的仕途命运涂上了一层艰难坎坷的悲情色彩。

阴铿生于梁天监九年(510年)春，自幼聪慧过人，五岁时就能吟诵诗赋，及长，每日写诗千言。由于严酷的门阀制度，贴上寒门标签的阴铿，也须待到“过立”才有资格“释褐”出仕。所以，三十岁之前阴铿便专志求学，博涉史传，吟诗著文，俨然一代名士。特别是擅长五言诗，写景状物，抒情达意，体物察事，词句绝佳。史载，阴铿早岁时就已经“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

## 三

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梁湘东王萧绎出任江州刺史。其时,阴铿虚岁刚值“过立”之年。阴子春时为梁州刺史,为一方军镇统领。暮春时节,阴子春由任所返回京师建康,名为述职,实则亦为阴铿出仕斡旋。不久,阴铿出任为梁湘东王萧绎府中的法曹行参军,品秩为一班九品下,属九品十八班里最低品秩。在士人眼里,庶族寒人是“浊职”要被驱使任用。即便是这个最低品秩的法曹行参军职事还是经阴子春斡旋之后,再加阴铿本人“诗名早冠”,湘东王府甚或萧绎本人“自辟召”才得以就职。此后,阴铿便随湘东王出任江州。因为初仕离家,难免思念故土亲人,于是,阴铿写下了历为论者称引的千古名诗——

江陵一柱观,浔阳千里潮。风烟望似接,川路恨成遥。落花轻未下,飞丝断易飘。藤长还依格,荷生不避桥。阳台可忆处,唯有暮将朝。(《登百花亭怀荆楚》)

此诗起笔意境开阔,“江陵一柱观,浔阳千里潮”,似有旷达豪迈之态,但接句却引出“离恨成遥”的伤感。下片“藤长还依格,荷生不避桥”等句则词工句美,情景交融,写出诗人离家别乡的怅寥和思念之情。此诗原为湘东王萧绎《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一诗的唱和之作,但阴铿和诗一出,萧绎及陪同人员无不击节赞叹。

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正月,荆州刺史庐陵王萧续病亡,皇帝诏令湘东王萧绎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萧绎离开江州回到建康,接着由京师赴荆州任所。这一年,阴铿刚满37岁,随湘东王萧绎自江州回京城建康后,再没有随至荆州,而是改派至故鄆县做县令去了。故鄆县在今浙江吉安县西北。《南齐书·州郡志》里“扬州”条载,吴兴郡领县十,其中有故鄆县。《隋书·地理志》记隋时“宣州郡”的情况是“统县六。户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九”,这六县中的绥安县建制是将梁、陈原设五县合并而设,其中就包括故鄆县。故鄆县令于梁代为九品二班,因此阴铿官职比此前任湘东王法曹行军时

升了一班,仍在九品。

阴铿任故鄆县令一年之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之乱”爆发了。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又东掠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虽然吴兴郡里坚守如故,却也情势紧迫,危如累卵。是年秋天,在吴兴郡故鄆县令任上的羸弱书生阴铿,陪着家小在饱尝血雨腥风的沐浴和惊悚之后,随着流民逃跑至扬州,登上一叶小舟,溯江而上,划归京师建康而来。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述的一幕。

## 四

太清三年(549年)九月,阴铿滞留京师建康还未至半年,就被侯景乱兵俘虏。但是,阴铿被俘仅两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有位军士于侯景兵营中砸开囚禁俘虏的栅室,冒着生命危险将阴铿救了出来。施救之人原是阴铿与宾友宴饮欢聚时逢到的一位行筋递酒的侍者。据《陈书》记载,某个冬天,阴铿与宾友共聚饮宴,宴会间留意到一直负责斟酒的仆人似乎流露出想要喝酒的神态,于是命人把一斛酒炙热后赠予了那名仆人,在座的宾客都嘲笑阴铿多事,阴铿却说:“我们在酣畅淋漓地饮酒赋诗,而这个每天都为我们斟酒的人却从来不知酒的滋味,实在没有道理啊。”谁都不曾料到,阴铿曾礼待那位行筋者一斛酒聊以御寒之事,众宾友嘲笑不已,那位行筋者却当成大恩大德铭记于心。一个有身份的官吏竟如此体谅关心自己,这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氛围中实属罕异之事。阴铿自己都早已忘却了,行筋者却念念不忘,因此他在沦为侯景乱军中的士兵之后,发现阴铿被囚,便冒着生命危险将阴铿搭救了出来。

阴铿获救后,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便是必须要尽快逃离建康,否则仍会沦为敌手。可是,茫茫江天,何处是归宿?惶急四顾,也唯有仍在江陵(湖北

荆州)的湘东王萧绎可以投奔了。于是他将居于株陵的家口亲人一起搬迁,凄凄惨惨,逃出新亭,溯江舟行,日夜兼程,转投江陵,复奔仍为荆州刺史的湘东王萧绎而来。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阴铿至江陵,湘东王萧绎正忙于同室操戈,又得应付讨伐侯景叛军等事宜,江陵军政事务乱作一团。萧绎无暇顾及安置阴铿,只能终日闲居寓所而已。此期所赋《闲居对雨》,写出了当时的真实心情和史实——

四溟飞旦雨,三径绝来游。震位雷声发,离宫电影浮。山云遥似带,庭叶近成舟。茅檐下乱滴,石窦引环流。寄言一高士,如何麦不收?(《闲居对雨》)

## 五

梁大宝元年(550年)八月,阴铿返至江陵还未满一年,侯景废梁简文帝萧刚,又立豫章王萧栋为皇帝,改元天正。嗣后,侯景又废萧栋为淮阴王并自立为汉皇帝,并将萧栋与其弟萧桥、萧穆囚于密室之中。

此时的荆州刺史、梁湘东王萧绎却全然不顾父死弟囚的天伦灾难,反而变本加厉地向其它兄弟举起了鲜血淋漓的屠刀。萧绎命王僧辩击溃在郢州(今湖北武昌)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六兄萧纶,并向西魏称臣,袭杀益州刺史萧纪(萧衍第八子)。太清二年(551年)五月,萧绎擢任阴铿之父阴子春为左卫将军,令其统兵随王僧辩攻打邵陵王萧子贞。阴子春统兵至贝矶却遭遇了侯景大军,旋即兵败,郢州陷没,返回江陵即被萧绎寻罪处死。

阴子春一死,阴铿必须守制三年,不得有任何职事。阴铿于大宝二年(551年)六月,携带家小,披麻带孝,扶着父亲阴子春的灵柩,到达南平作唐祖居地。埋葬父亲之后,开始为父守丧,整整三年,深居简出,不问政事。此期所写的诗《晚出新亭》就描摹了诗人当时真实的心态——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晚出新亭》)

此诗写守制期间所见景物和离开都城时的离愁与无奈之情。首句写景,次句写情。开首两句点出“离悲”的主题,“潮落”以下六句具体表现“离悲”。全诗语言洗炼,写景抒情,皆出于自然,将落潮、昏云、戍鼓、寒松等景物组合成一幅孤舟远行图,形象分明,意趣澹远。“亡国之音哀以思”,综观全诗,字里行间,丧父的怆痛情结和时代的衰落气息溢于言表。

## 六

阴铿替父守丧的三年期间,梁湘东王萧绎翦除兄弟的目的实现后,便于天正元年(552年)二月遣王僧辩与陈霸先进兵至大雷(今安徽望江),开始大举平定侯景乱兵。陈霸先率先击败侯景,王僧辩亦率兵前进。不久攻下建康,侯景兵败乘船东逃。四月,侯景至胡豆洲(江苏南通)为其部下杀死。十一月,萧绎称帝于江陵,是为梁元帝,年号承圣。

梁元帝萧绎盲一目,少聪颖,好读书,善五言诗,但性矫饰,多猜忌。生平著述甚富,凡二十种,四百余卷,藏书十四万卷。萧绎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人生前四十年作为皇子养尊处优,呆在华屋高墙之内抚琴读书,赋诗作画,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太多痕迹。但在人生末期,借助“侯景之乱”走上历史前台,登极为帝,却做出了很多为人诟病的举动。其称帝后,成都被北周吞并。当时梁州、益州已于西魏,襄阳也在西魏控制之中。因与北周联盟,再度与北方的西魏产生矛盾,招来强敌寇境,江陵形势十分孤立。承圣三年(554年)九月,西魏宇文泰派于谨、宇文护率军五万南攻江陵。十一月,江陵城陷,登上帝座仅仅两年的萧绎被俘遇害。被害之时命人将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焚烧干净,这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最大的文化破坏事件,可以说是中华文明遭受巨大破坏的千古罪人。江陵失陷之后,西魏扶持萧督称帝,建立后梁,改元大定,时在公元555年正月。阴铿不想为这个属政权效力讨好,江陵又不能再去。梁朝宗室成员唯有时任广州刺史的萧勃可以投靠了。于

是,后梁萧督称帝不久,阴铿便离开南平作唐,渡过洞庭湖,南下至始兴,找到了萧勃。其诗作《渡青草湖》大概写于这个时期——

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 (《渡青草湖》)

沅水是湖南西部的一条江流,入洞庭,桃源县在其左岸。本诗开端点明渡湖的地点和季节,勾勒出湖泊澄静潏潏的全景。“沅水”以下四句在描写洞庭湖水势,意蕴丰富,意象清丽。“桃花色”“杜若香”“茅山”“巫峡”等让人联想起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恬淡安逸之景。“度鸟息危樯”“滔滔不可测”则委婉曲折地表达出诗人对现实时局的隐忧以及对诗人自身命运难以揣测的彷徨之感。

承圣四年(555年)王僧辩屈事北齐,迎立北齐扶植的萧渊明为帝,陈霸先苦劝无效,就暗暗发兵诛杀了王僧辩,迎立萧方智为帝。梁太平二年(557年),梁敬帝萧方智禅位,陈霸先代梁称帝建立陈朝,史称南朝陈。

梁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萧勃举兵北上讨伐陈霸先,“自广州度岭,顿南康”(陈书·高祖纪),四月兵败被杀。萧勃进军南康时,派遣其将欧阳颢率军进兵豫章(江西南昌),任命阴铿为随军司马和欧阳颢一同北上。而后,陈霸先部将周文育击败欧阳颢,欧阳颢被擒送至建康即投降归顺了陈霸先。陈永定二年(558年)正月,陈霸先给欧阳颢进号“镇南将军”,任为广州刺史。所以萧勃死后,欧阳颢很快接替萧勃成了控驭岭南所有职权的一方领主。陈永定三年(559年)六月,武帝陈霸先病逝,诏追临川王陈蒨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继位之初,又为欧阳颢进号“征南将军”。时局的变化往往决定着个人的渺小命运,南梁著名诗人阴铿由此而沦为陈朝王室下属权贵的幕僚。在陈永定二年(558年)正月至次年(559年)七月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阴铿就一直在欧阳颢麾下任镇南府司马。其诗《南征闺怨》,大概写于南藩期间,这首“思妇诗”表达了阴铿入南既久思念妻子及家乡亲人的自然感情。

## 七

陈文帝继位后,即永定三年(559年)七月,阴铿离开了欧阳颢的镇南府所在广州,来到京师建康。十月,陈文帝诰封皇子陈伯茂为始兴王,又应尚书八座奏请,始兴王加赐戎号,即开府置吏。阴铿被任命为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期间,与当时的陈朝司空侯安都往来密切。据《陈书·侯安都传》载,侯安都“自王琳平后,数招文武之士,或射驭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其文士中就有阴铿。阴铿于陈天嘉元年(560年)二月讨平王琳叛军后,经常出入司空侯安都府中,成为侯府文士圈子里的重要成员,写过许多应命诗作。阴铿诗作中《和侯司空〈登楼望乡〉》,就写于天嘉元年(560年)五月,另一首《侯司空宅咏妓》也作于前后不久。阴铿实在也没有想到,和司空侯安都的来往酬唱活动竟为日后招致杀身之祸埋下了悲惨的伏笔。

阴铿在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职上,写成了名作《新成安乐宫》——

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鸱仰,连翩贺燕来。重檐寒雾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梁花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新成安乐宫》)

这是阴铿生平经历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阴铿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此诗所咏内容虽不为后人称道,但其格律形式之无可挑剔被后世诗家屡有道及。此诗炼字造句极工,清代诗论大家沈德潜《说诗粹语》评此诗“专求佳句,差强人意”。阴铿诗名转盛,一定意义上有赖此诗规格效高、格律整饬所致。《梁书》《南史》里都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文曰:“世祖尝宴群臣赋诗,徐陵言之于世祖,即日召(阴)铿预宴,使赋《新成安乐宫》。(阴)铿援笔便就,世祖甚叹赏之。”之后,阴铿官运亨通,累迁晋陵太守,时在天嘉三年(562年)九月。此时,阴铿所任晋陵太守,绝非普通太守,梁朝时就是显职,入陈而为全实之职,尤其显赫地位。

天嘉四年(563年)六月,南陈重臣侯安都以

为功大位高，日渐骄横，大肆招聚文武之士，骑馭驰骋。其部下将帅多数不遵法度，在外遇事受到追究则找侯安都庇护。陈文帝生性严谨，对此极为不满。七月，陈文帝将侯安都赐死。阴铿与侯安都关系最为密切，《建康实录》(卷十九)记载，阴铿是侯安都门下文士之中“为首”第一人。按陈文帝诏令，侯安都所有“同谋”均要正刑追究。天嘉四年(563年)十一月，阴铿在晋陵太守任上仅一年有余，就因牵连侯安都篡逆大案而被文帝诛杀。事后又追授员外散骑常侍，又优予礼待，加虚官，赐虚秩，礼数从厚，这不过是历代帝王玩弄权术的手段而已。

南北朝时期梁陈年间的优秀诗人阴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 八

阴铿出身寒门，三十岁以前无缘仕进，青春虚度，年华倥偬。“过立”之后刚入仕途，即罹“侯景之乱”，而后家破父亡，饱尝流离失所之苦。经梁陈更叠战乱之后，诗名渐露，仕途才顺，却坐侯安都之罪，罹祸而亡。历朝历代都有文人成为皇权诛杀权臣的牺牲品，但置身动荡离乱时代的悲情诗人阴铿的命运遭际尤其令人惋惜不已。

阴铿是南朝的优秀诗人，其诗歌创作成就斐然，以南朝梁陈年间一流诗人的座次直接浇沃了后世的诗风，即使盛唐的李杜和宋代的苏轼这样的大家亦是倍飨其甘。阴铿诗歌以写景见长，尤善于描写江上景色，展现了江陵洞庭、武昌一带长江风物。特别是诗歌中情感的笃切与庸和的心态构成了阴铿诗歌中不可或缺的主体特征。在其诗作中，凄怆的离情交织着淳绵的友情，真挚可感。浓烈婉致的感情又较好地融入了平和惨淡的人生感悟，并物化在“简净”“清省”的诗风之中。始终以一种恬淡的娴美来静观梁陈之际的躁动与浮华，给后世的学人以无限的遐想和余韵。诗歌创作中注意雕琢字句的同时，也讲究谋篇，追求律诗通篇的完整，如《晚泊五洲》——

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戍楼因嵒险，村路入江穷。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遥怜一柱观，欲

轻千里风。(《晚泊五洲》)

全诗用语天然明净，意境冲淡平和。首联直言其事，点出行舟结束“结缆”的时间和环境。次联“因嵒险”“入江穷”情景交融，又“景语皆情语”，衬托诗人感觉前程黯淡的失落之感。最后二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已经可以说是接近成熟的五言律诗。又如《晚出新亭》《游巴陵空寺》《秋闺怨》《经丰城剑池》等篇，均可视为唐代律诗的滥觞。

阴铿的艺术风格同何逊相似，后人并称为“阴何体”。南北朝时期，许多人写诗描写贵族奢侈糜烂的生活，诗文追求艳词浮华，这就是所谓的宫体诗。但是，阴铿和同时代的诗人何逊没有受其影响，着力于新体诗的创作，诗风质朴自然，清丽流畅，形象生动，意境高远。“阴何体”突破宫体诗内容，扩大题材范围，寄情山水，抒发胸臆，构思新颖别致，写景含蓄，语言自然，音律和谐，独具特色。其创作实践推动了齐梁新体诗向唐人近体诗的转化，促进了五言律诗在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的定型化。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发展当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的桥梁作用。

### 参考资料

- 1.唐·姚思廉撰《梁书》，1997年3月，江苏古籍出版社8月版。
- 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
- 3.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
- 4.谭元春《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 5.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1987年9月版。
- 6.戴伟华《阴铿生平事迹考述》，《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3期。
- 7.赵以武《阴铿生平考释六题》，载于《文学遗产》1993年第6期。

(作者单位：武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 陇上名人牛载坤

马晓春

牛载坤(1886—1934)字厚泽,狄道(今临洮)西乡八松村人。1905年中童子试,后领附生。1907年考入甘肃省文高等学堂,后被校方以母不丁忧予以除名,遂去新疆探望长兄秉坤。1909年新疆巡抚保送,入京师军咨测绘学堂测绘班学习。民国建立,复入北京簿记讲习所攻会计学。毕业后,到南通师范、无锡师范、上海中学、中华职业教育社、南洋中学、申报馆、商务印书馆求教。结识教育界名流蒋梦麟、黄炎培诸先生。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筹建兰州正本书社,订印甘肃各级学校教科书,自任书社经理。1913返回故里,筹募教育基金兴办地方教育。1914年与胥应魁、苏效汤等筹措资金创办“树风学校”,并制定“艰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为解决经费,将附近山林,划为学林,科学经营,勤加抚育,使青山常在,永续作业。随后,创设风化初级小学十余所。同时提倡妇女放足,男子剪辫。传播世界进步思想。

同年秋,甘肃省府派安肃道尹周务学调查处理玉树25族疆界纠纷及隶属问题,牛为随员,负责测绘舆图,前往青海高原,翌年完成堪界任务。

1916年任甘肃省教育会会长,建议省府核准分设师范学校9所,并对甘肃临洮教育发展作出规划。

1917年在兰州万寿宫创办“手工传习所”。传习毛编、制革、地毯技术。次年5月去上海出席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路经山西大同,采购瑞典式人力纺线机,准备仿造推广。会后赴日本考察实业教育。与高抱诚草拟《发展甘肃实业教育计划书》,回省后提倡发展毛纺业及蓄水

造林,改良羊种等振兴甘肃经济之措施。

1919年,兰州工艺学校改为省立工业学校,任校长。与邓隆出面,动员停办的甘肃织呢局工人复工,改称“甘肃织呢有限公司”,后任副经理。

1920年应《申报》主持人史量才之邀,为《申报》50周年撰写论文。

1922年4月,再次东渡日本,重点考察毛纺织业,为织呢公司选购器材。途经华北,考察当地毛业概况。

1924年被任命为甘肃省银行协理。并与水梓、杨思、张维创办“陇右公学”。

1925年国民军入甘肃,派员向银行提取“陇右公学”教育基金,被拒付,得罪刘郁芬,迫于形势,遂辞去银行协理职务。回临洮创办新民水利工程,后因地方变乱被迫停工。是年冬遭刘郁芬逮捕入狱。监禁40天经水梓等社会名流呼吁营救获释。在狱中,写成《振兴甘肃羊毛计划书》一文。

1928年,“河湟事变”起,遂去兰州,受刘尔圻之聘,在城内办“惟救工厂”。督造脚踏纺毛车百余台,招收贫民妇女纺线织衣、织地毯、做肥皂。

1929年全省大旱,民不聊生。与水梓作为灾民代表赴南京、上海呼吁救灾,中央政府终于拨出赈款10万余元回省督促发放,赈济灾民。

在南京请赈期间,结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钦佩行知创办之“晓庄师范”。遂动员石德安、台和中、牛孝威等人入学学习。结识国医馆馆长焦善堂,拜国医大师施今墨为师,请教医理,回兰州后筹国医馆兰州分馆。为取得焦善堂协助,再去南京。行至平凉,被匪徒抢劫一空返兰州,任省图书馆馆长。

1930年留京期间,受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之委派,赴内蒙处理蒙汉纠纷,圆满解决而归。

1932年中央国医馆兰州分馆在省城天齐庙正式成立,自任馆长,聘请名医权爱棠、柯与参、牛孝威为医师,门诊治病。

1933年春,应甘肃绥靖主任邓宝珊之请,赴宁夏与马鸿逵联络感情,归途中经一条山遭匪徒截杀,幸被群众掩护,遂免于难。同年6月,出任民勤县长。任职期间,振兴教育,借“杜公祠”作校舍,创办师范传习所;督建西外乡,中外乡,泉山乡3所小学。兴修水利,从兰州聘请能工巧匠仿黄河水车,监制“水刮子”在全县推广;重视绿化,设立苗圃,制定造林防沙计划。引进榆、槐树种,发动学生和市民种植城垣大街小巷。兴办实业,创办毛纺织传习所,邀请外地技工,购买机器,就地加工羊毛、驼毛,为以后的惠民工厂初奠定基础;重视救灾,在县城建立义粮仓,组织骆驼队,余粮入仓,平价卖出,解决人民生活;重视医疗卫生:当时民勤天花流行,死者甚众,发动在兰子女亲友紧急购买牛痘疫苗,亲自种痘,扑灭天花;宣传新思想,大力提倡剪辮放足,移风易俗,革除陋习。

刚正不阿,同情民众。马步青驻民勤部属拉扶派差,遭载坤痛斥“要拉就将我的马车拉去”。1934年5月晋省述职,经武威将民勤驻军蛮横之情俱实告于马步青。遂致积怨于心。6月5日4时,轿车行至皋兰县哈家咀,为仇家狙击,身受4弹殉命,年49岁。噩耗传至民勤,人民哀痛如丧考妣,立“牛公祠”,额题“爱遗甘棠”祀之。遗著有《五十年来中国之毛业》《水利之研究》等。

(作者系康乐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 中国共产党正宁历史『十个之最』

王立明

一、最早投身“五四运动”的甘肃籍青年学生之一——王自治。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五四运动”爆发。正在北京求学的甘肃籍学生王自治、王和生、张一悟、丁益三、张亚衡等数十人踊跃参加这场伟大斗争。6月3日,北京各院校学生数万人举行游行示威,在京甘肃籍学生再次参加,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其中甘肃籍学生王自治、王和生、邓春膏、张明道、张继忠、冯聘山等10余人被捕。同时,甘肃籍在京学生及时把北京革命斗争的消息、传单、报刊通过邮寄、自带

等方式传到甘肃,动员家乡人民奋起救国。“五四运动”对甘肃的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特别是促进爱国青年的觉醒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大力推动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积极参与下,“五四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在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王自治(1890—1965)字立轩,正宁县宫河镇南庄村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全国学联副会长。1920年毕业,历任平凉第一中学校长、陕西泾阳县县长、甘肃省教育厅科长、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院长、省水利局副局长。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兰州志果中学(今兰州市第二中学前身)教导主任。1953年4月,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5年逝世。事迹收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陇原志士》一书。

## 二、甘肃旅京学生最早创办的进步刊物——《新陇》。

1920年3月,旅京甘肃大学生王自治(北京大学学生)、张明道等创办《新陇》杂志社,有社员40余人。4月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讨论通过杂志宗旨和投稿简章,定名为《新陇》月刊。王自治任编辑部主任。同年5月20日发行第一期,王自治在撰写的《发刊词》中大声疾呼:“望陇人之觉悟奋发及污浊社会之改良”。《新陇》每年七、八两月因暑期而临时停刊,后变成不定期刊,刊行时间一直延续到1930年9月。《新陇》对甘肃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等发表见解和议论,发表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产生积极影响。并转载《新青年》杂志的文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对推动甘肃的民主进步潮流起到一定作用。《新陇》在甘肃有特约记者2人,并在兰州、平凉、西宁、武威、宁夏、天水,陇西、临洮,酒泉等地及各地师范学校均有代办处。

## 三、西北地区成立的第一支冠名红军的革命武装——1932年2月12日在正宁县三嘉乡锦章村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柴桥子村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巡视部队,领导和布置政治和军事工作,指示部队立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建立革命根据地。2月12日,在三嘉乡锦章村一打麦场里,隆重举行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大会。打麦场上临时搭起彩棚,挂起纵书“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典礼”大字的横标,两旁插着绘有镰刀、锤头的党旗,部队全体战士和当地群众约千人参加大会。战士们分成若干个小队,打着红旗,每个人脖子上都系着用红布条做成的“牺牲带”,在党旗下庄严宣誓,表示要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奋斗到底。所有战马的辔头和尾巴上都缀着红花和红布条。整个会场气氛热烈,群情激动。会上,由李杰夫代表陕西省委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全军360多人,下辖4个大队。

阎红彦任步兵一大队队长,吴岱峰任步兵二大队队长,强龙光任骑兵大队队长,白锡林任警卫大队队长。同时,成立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均设党支部,配备政工人员。改编后,举行庄严的授旗仪式。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正式打出工农革命的旗帜,是一次转折性的变化,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地区正式成立工农红军,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从此,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新阶段,揭开陕甘边界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 四、中国人民军队成立最早的骑兵部队——1932年2月12日在正宁县三嘉乡锦章村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下辖的骑兵大队。

2014年1月2日《人民政协报》第6版刊发贾晓明署名题为《关于人民解放军的骑兵部队》的文章,该文称:关于我军骑兵的早期记载,出现在1932年。当年1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宣布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全军共700余人,编为一、二两个支队和警卫、骑兵两个直属队,强龙光任骑兵队队长。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全军编为4个大队,其中强龙光任骑兵大队队长。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是西北红军最早的骑兵部队,虽然只有三四十人马,但机动性好,战斗力很强。

## 五、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1932年4月在正宁县湫头乡新庄子村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

1932年3月,谢子长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一带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在广泛动员群众的基础上,4月上旬的一天,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主持,陕甘游击队在湫头新庄子村岳王庙附近的麦场里,召开寺村塬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72个村庄的农民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议程有5项:宣布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的决议和法令;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分配粮

食和游击队给养问题;建立赤卫队;号召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会上经选举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成立地点在寺村塬,故称其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其中正、副主席3人,常务委员7人。陕甘游击队政委李杰夫(高维翰)任主席,车家沟村农民张进元、西城村农民唐贵荣任副主席。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4个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驻新庄子村西洼。8月下旬,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随之解散。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共陕甘边历史上成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也是甘肃历史上成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它虽然在时间上只存在了短短的5个月,但它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传播了革命的种子,打击了地主豪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为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的重新恢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 六、中国革命史上建立最早的回民革命武装—1933年秋在正宁县五顷塬乡龙嘴子村成立的回民支队。

1933年秋,在杜宛等的领导下,以龙咀子、西渠回民青年王世平、王世英、马成贵、马彦林、孙长青、魏文山、南会民、杨山七、马彦秀、魏德富、李长元、王长贵、王东浩、马德云、魏文举、杨学森、马根成、马盛富、老苑等19人为骨干,在五顷塬乡龙咀子村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回民武装——陕甘回民游击队,王世平任队长,王世英为指导员。翌年,被改编为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第三路总指挥部第十六支队。1935年9月,编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团。1941年3月,被改编为关中回民支队,队长马全德,指导员先后为卢文秀、郑一、马全普。1942年4月,编入新正县保安大队。1944年1月,成为新正县保安大队一中队。1947年2月,改编为新正县独立营八连,连长马全德,指导员马全普。次年2月,复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一旅二十一团二营六连,马全

德任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指导员马全普。1949年1月17日,在张洪坡遭遇战中,遭国民党马继援八十二师骑兵团袭击,除13人突围外,马全德、马全普等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该部从19人的游击队发展为200多人的正规军,虽几经改编,但当地群众习称其为回民支队。队伍打破回汉界限,消除民族隔阂,与正规部队协同作战,共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著名的有庙梁伏击战、解家川战斗、永和战斗、巩家斜、梁家沟圈阻击战、岷岷伏击战、皮坊店设伏战等。涌现出王世英、马全德、马全普等知名英雄,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 七、甘肃省成立最早的乡级革命政权—1934年7月在正宁县五顷塬乡五顷塬村成立的五顷塬乡革命委员会。

1934年7月,五顷塬乡革命委员会建立于今孟河村五顷塬组,为甘肃省建立的第一个乡级红色政权。郭自发任主席,何正兴任副主席,范新发任财粮委员,左怀玉任军事委员,宋开成任土地委员,范居成任贫农委员,巩思祥任青年委员,刘桂英任妇女委员。翌年5月,改称南邑乡革命委员会。五顷塬乡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开辟了共产党人创建乡级红色政权的先河,为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积累了经验,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 八、甘肃省成立最早的县级党的委员会—1935年8月在正宁县湫头乡成立的新正县委。

1934年2月,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政委张仲良来到五顷塬乡孟家河一带,建立党的组织,开辟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展4名中共党员。7月下旬,在湫头乡成立党小组。10月,由张仲良主持,在五顷塬乡西头村秦善合家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成立正宁县第一个党支部,郭存信任支部书记。之后,陆续在南邑、湫头等地发展党员70多名。1935年8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以正宁县和陕西枸邑、邠县接壤地区各一部设置新正县。同月,在五顷塬乡岷子村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中国共产党新正县委员会,卢永财任书记,李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赵澄璧任宣传部

长,郭廷藩任统战部长,高德发任妇女部长。县委下辖6个区委。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境内成立最早的机构健全的县委组织。

#### 九、诞生于正宁的最红的民歌之一——1944年新正县农民汪庭有创编的民歌《绣金匾》。

汪庭有,祖籍陕西商南,1916年生。1918年起,随全家逃荒流浪。长大后,靠给人放牛羊、拉长工、打短工谋生。还被国民党部队拉壮丁关押3天,后伺机逃脱。1936年,流落至新正县马栏区三乡——杨家店子落户定居,开荒种地,学做木匠活,逐渐成为方圆一带小有名气的“巧木匠”。汪庭有从未念过书,但很喜欢当地留传的《五更道情》《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谣。因感受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边区的种种新气象,他在挥动锯子和刨子的间隙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歌来。他先后创编出《表顽固》《防汉奸》《绣金匾》等多首优秀民歌。1944年获“陕甘宁边区甲等艺术英雄”,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他创作的民歌中,最著名的是歌颂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翻身过上好日子的《绣金匾》。此歌一经传唱,很快唱

红陕甘宁边区,唱红全中国,成为陇东民歌的代表作。

#### 十、甘肃省最早拍摄的以革命斗争为主题的彩色电影——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以赵德荣事迹为原型摄制的战斗故事片《红河激浪》。

赵铁娃又名赵德荣,1913年生于正宁县三嘉乡锦章村一个贫农家庭。1932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历任红二十六军战士、关中分区第四游击大队大队长、新正县一区游击队长、关中警一旅二团武工队长、新正县游击大队长、警一旅四团二连连长等职。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屡建战功,受到中共关中特委表彰奖励两次,立大功两次。其英雄事迹一直为陕、甘边界地区人民所传颂。1963年秋,以他为原型的电影《红河激浪》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竣公映。“文化大革命”中,《红河激浪》被打成“毒草”受到批判,因受迫害,赵德荣于1966年7月25日不幸辞世,享年53岁。1978年7月,中共正宁县委为其平反昭雪;9月,中共甘肃省委为电影《红河激浪》平反。



(上接第5页)

作完成后,应当依法移交市档案馆或者方志馆保存、管理,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出售、出让和转借。

**第十九条** 以嘉峪关市冠名的地方志属职务作品,其著作权由组织编纂的市志办公室享有,参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

**第二十条**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对地方志编纂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一条** 地方志工作要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市志办公室应当将收藏陈列的地方志向社会开放。

加强地方志工作信息化建设,通过建设资料库、方志馆、互联网站等方式,为社会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

**第二十二条** 市属各部门、各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组织编纂专业志书、专业年鉴的地情资料收集工作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依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从2015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 甘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黄杰

2004年,国家文化部、财政部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系统保护工程和保护制度,这在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2005年甘州区文化馆根据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和全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会议精神,组织人力对全区18个乡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普查和摸底工作,2007年挖掘整理上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2项:甘州方言、河西宝卷、甘州小调、甘州地蹦子、乌江镇狮子上缆绳、甘浚闹春牛、张掖剪纸、张掖刺绣、甘州搓鱼子、甘州婚俗、碱滩黄河灯阵、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同年张掖市人民政府[2010]89号文件公布的《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名单》中,甘州区有5项:河西宝卷、甘州小调、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狮子上缆绳、黄河灯阵。

2008年甘肃省人民政府[2008]43号文件公布的《第二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甘州区的甘州小调和邵家班子木偶戏榜上有名。

现将甘州区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介如下:

**河西宝卷:**河西宝卷存活于河西走廊中部地区,是为河西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间俗文学,继敦煌“变文”之后出现的民间讲念文学,明清时期较为盛行,民国时期成为河西农村较为流行的文化活动现象。河西三地区均有宝卷流行,其中甘州区沿祁连山地区的安阳、花寨、龙渠、大满、小满等乡镇流行较广。宝卷的来源,是由变文演变而来,内容有神话传说、历史民间故事、寓言故事三大类。除“祖传”外,很大一部分是民间艺人新编的,题材取自各朝的历史文化作品,如《三国演义》《西厢记》《三言二拍》《包公案》等,流传至今的宝卷有

40多种,内容涉及爱国、爱家、婚姻家庭、劝世、忠孝、历史、寓言等,其中的《仙姑宝卷》,是明清时期张掖人根据本地素材所创,内容是黑河岸边的柳仙姑在黑河上修桥的传说故事,极具张掖地方特色。宝卷的传播方式有文字和口头两种形式,文字传播以手抄宝卷为主。它是介于讲故事和独角戏之间的一种传统民间讲念文学,基本形式有韵白结合、开头、结尾、调子几项基本内容。目前,各种宝卷散落民间,念卷者后继无人,作为本土曾经兴盛一时的民间文学现象,濒临消亡,急待加以保护。

**甘州小调:**甘州小调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音乐,是甘州民间喜闻乐见的音乐演唱形式,由曲牌和曲子组成。甘州小调名目庞大,数目繁多,自成体系,既有对古代音乐的继承,也有对民歌、时令小调的广泛吸收,同时,还将本土乐曲、外来乐曲相互融和,其特点是语言朴素、恢谐、幽默、逗趣,易于上口,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甘州小调演唱时通常由乐队伴奏,多人演唱,可以走乡串村、沿街就地演唱,也可以由一人弹唱。在节拍方面,大多以2/4拍为主。在音调的声降方面,“4”和“7”两个音表现特殊,在不少歌曲中,可以听到“4”比“#4”稍低,“7”比“b7”稍高的唱法,目前已挖掘、收集和整理的词谱多达200余首。

**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据相关史料记载,根植于甘州区党寨镇上寨村邵家班子的杖头木偶,是明代由陕西传入,至清代以后,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流传范围广,而且演出的剧目和戏班也逐渐增多,木偶戏班遍及城乡,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不少庆典、庙会、祝寿、开业等民俗活动常常邀请木偶戏班前往演出助兴。木偶戏古称“托偶”或者“托戏”,俗称“三根棒”或是“三根棍”,张掖民间也称

作“肘娃娃”或“肘偶”，是用三根木棒操纵，其中一根支撑木偶头部，称为主棒或面棒，耳、眼、鼻、嘴均能闭合张开，眼珠转动，头颈上下左右扭转；另两根棒操纵木偶人的双手。表演时，演者两手能运用自如、灵活准确地把握手中的各种道具，因而又被称为手挑子或手扞子。党寨镇上寨村邵家班子的杖头木偶全长有一公尺左右，比一般同类木偶大，平底没有腿，如果需要表演腿部动作，另制作双腿由演员配合操纵，称之为“配腿”或“配脚”。邵家班子木偶戏在木偶造型上，十分注重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它既借鉴了民间神像、古代彩塑、雕刻等的造型和技法，也吸收了戏曲脸谱的表现手法。木偶戏唱腔以西秦腔为基础，内容多取自历史演义、民间传奇、神话故事，现留存的传统剧目有包公系列、杨家将系列、三国系列等，多达几十种，所演人物忠奸、善恶分明，木偶在艺人的操纵下可以表现喷烟喷火、杀头、开扇、搬物等高难度动作。木偶艺人集唱、做、念、打和奏乐于一身，是一门融会了美术、服装、表演、剧本、音乐诸元素的民间戏曲艺术，体现了公众艺术的特色。

**狮子上缆绳、上板凳：**舞狮是中国人傲于世界的文化遗产之一，舞狮文献最早于唐朝，诗人白居易曾赋诗“假面胡人假面狮，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作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长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由此可证明舞狮在中国的历史渊源。甘州区乌江镇安镇村的舞狮项目狮子上缆绳、上板凳是由河南籍药商张海东在清代光绪年间传入的。缆绳粗 8 公分，长 25 米，绳距地面 3 米。表演时，引狮人持绣球从引绳处快步上支架，逗引狮子从引绳缓慢上绳。引狮人在绳上的动作类似于杂技，跳跃翻滚，技艺精湛，狮子上缆绳后首尾相引合、步法整齐合一，融成一体，难度最大的则属狮子在缆绳上的直立行走，整个过程主要表现了狮子的善良与灵巧的特征。另外，还有狮子上板凳，在引狮人的引领下，狮子按乐声起舞，一层层逐渐登高，时而跳跃、时而直立，动作敏捷矫健，头尾舞姿协调，主要表现了狮子雄健勇猛。安镇村的狮子上缆绳是南、北舞狮技巧完美的结合，有着较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曾多次荣获市、区社

火调演一等奖，它对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群众身体素质，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黄河灯阵：**黄河灯阵是春节期间在甘州区碱滩镇古城村流行的一种由民间祭祀演变而来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相传，在宋末元初，碱滩镇古城村一带，瘟疫盛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于是拜佛烧香，祈求神灵庇佑。后佛祖显灵，特降法旨，命三笑娘娘降临该地，传此黄河灯阵图。该阵占地面积 400 平方米左右，由 365 棵松树和 365 盏灯组成，正中设有 6 张香案，主要用于祭奠神灵，灯悬挂于松树下，每盏灯代表一个神灵，该阵只设有一个进口和出口，整个灯阵的布局类似“迷宫”。每逢正月十三至正月十六，古城村及周边乡镇的村民纷纷前来游阵，并可根据自己所祈祷的愿望将松树上悬挂的相对应的神灵灯悄悄摘走，以此避邪、避难，所空之处的灯由布阵者填补悬挂。后经若干年，该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一原始的祭祀活动渐渐演变成一种春节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整个活动期间游阵人数可达万人左右。

2009 年张掖市人民政府又公布了《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名单》中甘州区又有 4 项：甘州社火、甘州方言、甘州剪纸、甘州刺绣。

甘州区文化馆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除整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外，将征集的上百件民间手工精品陈列展出。同时注重对非遗工作的宣传，积极配合省市区举办的各种展览。1997 年张掖市举办第四届民间艺术品展；此后甘州区文化馆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的收集保护。2006 年甘肃省在张掖举办的全省民间民俗工艺品展；甘州区文化馆收集作品 500 余件，内容涉及剪纸、刺绣、银雕、木雕、沙画、布贴画、堆画、石画、陶艺、面塑、石艺、蛋画、香包等十三个种类。2008 年甘州区又举办了“魅力甘州”民间民俗工艺品展；吸引了甘州区 18 个乡镇和 5 个街道参加了展出。并邀请了张掖市其他六县区的加盟。此展推荐出 100 多位不同门类的民间艺人，在甘州区电视台进行了才艺展示。同年张掖市宣

传部在市宣传文化中心举办六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甘州区文化馆共展出作品 14 个门类 162 件。2009 年甘州区文化馆组织作品 89 件参加了甘肃省第四届文博会。2010 年甘州区文化馆又

派专人携带作品 61 件，参加了第五届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

(作者系张掖市甘州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 岷州火神庙里的火神爷小考

潘硕珍

岷州卫城建于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年)，由马烨主持建筑，附属设施有文庙、三官庙、城隍庙、火神庙、天爷庙等建筑。岷县学者宋志贤写道：“(正月)二十九日，俗谓火神之生辰。县民在大南门月城内的火神庙，进行祭祀活动。演戏三日，入夜燃放烟花爆竹，城民焚香拜祝，一片至诚。”(《岷县民俗》)岷县学者指出：“按五行的说法，南方属火，南门为火门，所以原大南门瓮城内有火神庙和戏楼。”(《岷州旧事》)岷州火神庙在大南门的瓮城内，建有坐西向东的五间彩绘大殿，“庙内塑有一尊三头六臂的‘火神爷’坐像，高约一丈有余，是岷县最大、最高的一尊泥塑神像。神像遍体通红，海口怒目，手执火旗、火剑、火铃、火圈等，两面各侍立一善一恶供养神，一红脸怒目，一白净慈祥，也手执火器。庙外街道的对面是戏台，每年正月二十九日，要在此唱会戏三天。据说所有建筑都是明代旧物，是不可多得的造型精品。”(李珍《新中国成立前的县城庙宇与古建筑》)

原始社会的居民过群居生活时，那堆不熄灭的火即是他们的灶，所以原始人的火神和灶神是一致的。在鲁、豫、皖、苏四省交界的地区至今流传着正月初七祭火神的汉族民俗，火神，汉族民间称之为“火德真君”，或直称“火神”。相传远古时期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使人类以熟食为生，为了纪念他，人们尊称他为“火神”，把农历正月初七定为他的生日，这便是正月初七祭火神的由来。汉族民间有组织“火神会”的风俗，除去火神庙朝拜外，一般当天晚上都有烟火晚会。此后，火神的角色发生了

变换。据《左传》记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淮南子·汜论篇》也说：“炎帝作火，死而为灶。”也有说火神(灶神)为祝融的：“在一些古老的城市，有的还建有火神庙，祀奉火神祝融。”传说祝融为远古著名火正，“颡项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周礼》)祝融，名重黎(简称黎)，又称祝诵，祝和。相传帝喾高辛氏时，他在有熊氏之墟(今新郑)担任火正之官，能昭显天地之光明，生柔五谷材木，以火施化，为民造福。帝喾命曰祝融，后世尊为火神。

在民间传说中，还有火神是蚩尤的说法。明代佚名(姓名和生卒年不可考)在其长篇历史小说《大明英烈传》中写道：“(鹤鸣山)谷里相传有一个火神庙，甚是厉害。若有人在谷中略有响动，惊动了火神，就是青天白日之下，他放出火骡、火马、火龙、火鼠、火犬、火牛，不论你多少人，俱登时烈火奔腾，活烧熟来吃了。”在朱元璋部下朱亮祖眼里，此火神爷的形象是：“中间拥着一个绁袍、金冠、红发、赤脸的神，骑着一条火龙。”作者最后交待此火神的大名：“又约有半里地面，却又是三间大一个亭子，四周用砖子封砌，匾额上题着‘蚩尤’二字。”

岷州火神庙里供奉的火神爷是谁？笔者以为既不是炎帝、祝融，也不是蚩尤，而是《封神演义》里的哪吒：火神形象相貌凶狠，三头六臂，并有风火轮、火葫芦、火印、火剑、火弓等火器配备，酷似神话传说中“哪吒”的变态。

(作者单位：甘肃岷县二中)

# 浅议崇信县地方饮食习俗

张涛

“民以食为天”，饮食作为人类物质文化的基础，随着地域不同各有特色。一个地方的饮食习俗反映了这个地区人们的传统文化底蕴，饮食习俗往往与传统节日、地方特产、生产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不断传承地域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崇信人饮食习俗也不断发生改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物质极大丰富，饮食习俗发生很大变化，与现代旅游、时尚养生等新生事物有机结合，体现出崇信人民的厚道诚信。

## 一、传统饮食习俗继续保持

崇信县地方饮食以陇东地区风味为主，味喜酸辣，粮多菜少，以饱为度，节俭为荣。主食以小麦面为主，杂粮兼食。小麦面以蒸、烙、炸、煮为主，有馒头、花卷、酥饼、油饼、面条、饸饹面等。饸饹面在南北二塬上最为盛行，是招待来客首选的饮食，长而富有筋力，嚼食劲而又味，为待客之上餐，尤其农村遇红白喜事也摆上餐桌先吃为快。杂粮以玉米、糜子、谷子、荞麦、豆类为主。玉米磨成珍（粒），糜子、谷子碾成米，可煮为米汤、稀饭、米饭，以甜香见长。玉米、荞麦磨而掺少许小麦面，搅搅团、压饸饹、做凉粉，别具风味。豆子可做豆腐、豆腐脑，餐桌上也不可缺少。尤其是用燕麦煮熟、发酵做酒醅，酒味中带有甘甜，消暑清热，独具特色，为传统风味小吃。上世纪90年代，大米也摆上农家餐桌，米饭逐渐增多，也成为家常便饭。进入新世纪，蔬菜和肉食用量逐年增多，普通家庭每餐均有2个以上的凉热菜，食用油量也随着增加，年老体弱及儿童喝上牛奶，餐桌营养逐渐丰富。

崇信人非常注重将传统饮食与节日紧密结合，有“送节”习俗，每逢节日，做好精美食品，领上

孩子，带上媳妇，就去拜老丈人，随后去舅、姑、姨、叔等亲戚挨门看望，尤其是每年春节，要将所有的亲戚看望一遍，送去祝福，互问平安，交流情感。近年来，人们普遍都在超市购买相应的食品礼盒，最讲究的是“四色礼”，即茶叶、香烟、酒和食品共四样，寓意四季平安、事事顺心。凡是喜事还要带上两条肉，表示双喜临门，以示尊重。以前，农村人过春节都要做醅食，即将面蒸熟加糖精，用模子压成印有图案、长宽高各5厘米左右的正方体，招待来客。同时也做些小动物形状的祭品，除夕晚上供于灶神面前，祝愿新一年家神保佑，有粮食吃，不饿肚子。随着改革开放农民粮食实现自给有余，人们不再做醅食和各种祭品。除夕早餐吃搅团，预示“团结”；晚餐吃饺子或长面，预示“合家团圆”，这一习俗没变。农历正月十五蒸包子、做凉粉的习惯由来已久，每逢元宵节，家家户户都要蒸包子，大小各异，应有尽有，有肉、菜、糖、豆类等各种馅，十分丰富，还有人给包子捏个嘴，用黑豆点上眼睛，叫“嘴巴子”，样子好看又可爱，小孩特别爱吃。传说这天只能吃包子，其他食品吃了会对后代生育不利，这是迷信的说法，人们并不在意。

农历二月二俗称龙抬头，人们都炒豆子，吃豆食，叫“咬虫”使其不危害庄稼。现在，还用玉米、大豆、大米等爆米花，压甜杆，节日过得更充实。五月初五也称“端午节”，除家家门上挂艾叶、柳条避邪，小孩佩戴荷包外，还吃粽子、酒醅、油饼、净糕。油饼抹净糕是崇信人传统吃法，将油饼炸好，净糕蒸熟后抹在油饼上，香甜可口，津津有味。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崇信人以核桃仁为馅，配红糖或蜂蜜，用模具烤成各种图案的锅饼，也有

用大枣为馅蒸成枣馍，具有特色的是于家湾的酥盒子远近闻名，晚上将饼子、粽子、水果和酒盛桌摆院称“献月”，全家人围着供桌赏月。农历腊月初八俗称“腊月八”，吃腊八粥，多用黄米、小豆、豇豆、黄豆等料煮成，佐以油、盐、葱、调料及油煎荞面小饼块，叫“雀头饭”，以示麻雀被消灭，来年庄稼无雀侵害。有的群众将“腊八粥”甩洒在门、柴垛、院子等上面，以祭祀五谷之神。近年来，过腊八节祭祀风俗逐渐淡化，有的家庭基本不做，有老年人大多喜欢吃腊八粥。

## 二、地方特色饮食不断发扬光大

古今流传“崇信特产三样奇，芹菜辣子五加皮”。民国《崇信县志》载：“芹，有水芹、旱芹之分。水芹生河边湖畔坡泽之洼，旱芹生平地菜园中”。这充分说明芹菜在崇信种植较早，人们饮食已有数百年历史，受纳河川水光热等自然资源的滋育，崇信芹菜以脆、嫩、鲜著称，干嫩茎空，优于其他品种。2000年以来，种植面积逐年增加，成为全县蔬菜产业的主要品种。辣椒有数种，统称辣子，鸡咀辣椒以辣出名。近年来，引进陇椒、陕椒、航天辣椒等新品种，产量逐年提高，但辣、色、味都不具有传统辣椒的质量。五爪子也称五加皮，具有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等功效，还具有抗肿瘤、抗疲劳、降低全血粘度、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等作用。每年春末夏初，当刺五加枝头绽放出嫩芽时，南部山区

新窑、黄花等地群众成群结队上山采摘，身背肩挑拿到县城来卖，城乡群众抢劫一空，或煮熟食之，或冷藏，或送亲朋好友以享口福，这些都是饮食餐桌上的佳品，深受广大群众青睐。

## 三、时尚养生饮食蓬勃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崇信县个体餐饮业迅速发展，山西刀削面、岐山臊子面，火锅、烧烤、砂锅，云南过桥米线、杨凌蘸水面、新疆拌面等餐饮品种逐步兴起，菜肴品种增多，口味各具特色，地方饮食蓬勃发展。作为养生食品的羊肉泡遍布城乡，烹制精细，料重味醇，肉烂汤清，肥而不腻，营养丰富，香气四溢，食后回味无穷，因它暖胃耐饥，为全县群众所喜爱，外来宾客也争先品尝，以饱口福，并有人题词“闻香止步”。2006年以来，在锦屏镇梁坡民俗村先后开办8家农家乐，以地方菜肴为主，有凉拌五爪、土豆丝、虎皮辣子、韭菜盒子、核桃包子、地软包子、手撕饼、小油饼、酿皮子、凉粉鱼，荞面节节、荞面搅团等地方小吃，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品尝。也有餐馆将狗肉暖锅、一品红牛等养生食品煲汤，集美味与养生于一体，融入现代膳食理论、中药理论、营养保健知识、食疗养生知识，在四季养生原理基础上根据春以养肝、夏应养心、秋以养肺、冬应养肾的理念，开发出营养煲汤20余个品种，推动养生食品持续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崇信县地方志办公室）



## 《金昌市志》（1992—2010）评审会召开

2014年12月9日，金昌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金昌市志》（1992—2010）评审会。会议邀请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钱旭及省、市、县（区）史志专家、学者，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共60余人对《金昌市志》稿进行了评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春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永瑞，市政协副主席任斌相出席评审会。

《金昌市志》（1992—2010）于2011年正式启动编纂，全志约160万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92年至2010年金昌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评审会上，省、市专家对《金昌市志》稿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指导思想正确、结构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地方特色突出，符合志书的要求。同时，就志书在体例结构、内容、资料、文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自2007年正式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以来，金昌市地方志事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二轮《永昌县志》、《金川区志》已分别于2009年11月、2014年4月出版。二轮《金昌市志》经过此次评审后，可望在2015年年底出版发行。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春江出席会议



省史志办副主任、党组成员钱旭出席会议



张志杰书法作品

